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双月刊·2023 年第 6 期(第 34 卷)

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任：罗日新

副主任：邓路遥 梁经成 黄龙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路遥 农祖荣 许立坤 吴红博 吴强 何文钜 何绍红

罗日新 岳劲 黄龙杰 梁经成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

双月刊

(1996年创刊)

第34卷 第6期

2023年12月18日出版

主管、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主 编:梁经成

副 主 编:何文钜

编辑部主任:杨绪强

地 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村大道6号

邮政编码:530007

电子信箱:GXSYXB@163.com

访问网址:<http://www.gxsy.org>

电 话:0771-2381657,389162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033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250/D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 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印刷单位:广西汇望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10.00元

目

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

“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三维探析:理论、历史和价值

..... 陈德山,王彦龙(5)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 耿文建,袁伟华(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革命的路径生成及其启示意义研究

..... 刘玉东(23)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伦理意涵与伦理路径

..... 廖仁郎,欧阳辉纯(32)

统战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

学理哲理道理

..... 盛寿河,江晨颖(39)

论人民政协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逻辑——坚持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 瞿 磊(49)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

..... 李承儒(56)

录

政党制度研究

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农工民主政党自觉及经验研究

..... 陈 红(65)

民族研究

铜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二

..... 覃彩銮(73)

回顾、评价与展望：广西民族互嵌研究

..... 马俊勇(80)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中老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 潘 岳,冯羽鑫,刘 蓬(87)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角下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 秦雅静(93)

观察与思考

需求溢出理论视角下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服务需求分析

——以柳州市 L 区为例

..... 罗树杰,李 霖,王 杨(99)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年总目录 (110)

本期执行编辑:何文钜

封面设计:梁新建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started in 1996)

Vol.34 No.6

Published on Dec. 18th 2023

Administrator and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LIANG Jing-cheng

Deputy Editor-in Chief: HE Wen-ju

Editorial Director: YANG Xu-qiang

Add: 6 Xincun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P.C.: 530007

E-mail: GXSYXB@163.com

URL: <http://www.gxsy.org>

Tel: (0771)2381657,3891622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Distribution Area: P.R.China

Distributo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Guangxi Huiwang Fenghuang
Printing Co.Ltd

Price: ¥10.00



英文翻译:陆姝彤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Main Contents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One Combination” to “Two Combinations” :Theory, History and Value	CHEN De-shan, WANG Yan-long(5)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cro-history View	GENG Wen-jian, YUAN Wei-hua(13)
Study on the Path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s	LIU Yu-dong(23)
The Ethical Implication and Ethical Path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LIAO Ren-lang, OUYANG Hui-chun(32)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n the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f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SHENG Shou-he, JIANG Chen-ying(39)
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CPPCC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Enhancing Unity: Adhere to the Organic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United Front,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QU Lei(49)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over the Western Style Democracy	LI Cheng-ru(56)
Study on the Party Consciousness and Experience of Chinese Peasant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Par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CHEN Hong(65)
Bronze Drum: the Historical Witness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the Second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in Guangxi	QIN Cai-luan(73)
Review, Evaluation and Prospect: a Study on Ethnic Integration in Guangxi	MA Jun-yong(80)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Laos	PAN Yue, FENG Yu-xin, LIU Peng(87)
China-ASEAN Commerci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based Business Environment	QIN Ya-jing(93)
Demand Analysis of Social Assistance Services for Urban Needy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Spillover Theory: a Case Study of L-District in Liuzhou	LUO Shu-jie, LI Lin, WANG Yang(99)
Total Contents 2023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110)

“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三维探析：理论、历史和价值

陈德山,王彦龙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 130024)

摘要:习近平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自觉,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发展规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认知达到新的高度。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发展是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具有深厚的学理支撑、历史深度和价值意蕴,这主要体现为:在理论维度,“两个结合”揭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在历史维度,“两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历史脉络的高度凝练;在价值维度,“两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1

[中图分类号]D61;A8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05-0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以下简称“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这一重大论断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新认知。深入理解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必然和价值意蕴,有助于正确把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更好地回答新时代如何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命题。

一、理论维度:“两个结合”揭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发展过程,从理论优势、理论特质和理论联系三个方面展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

(一)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禀赋

只有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发挥其真理指导作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于

收稿日期:2023-10-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20JD710007);东北师范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项目(2022014)。作者简介:陈德山,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政党建设;王彦龙,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政党建设。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暴露的矛盾和弊端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其时空背景和理论基础与近现代中国的实际国情有着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探索,但是没有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遇到的难题以及潜在的风险挑战给出详细明确的解决方案。恩格斯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2]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视野,能够吸收与借鉴世界范围内积极有益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根据时代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变化完善发展自身理论体系,从而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解答时代发展提出的现实命题。

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是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当今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全球性难题此起彼伏,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传统美德、思想观念,能够为破解困扰世界发展的全球性难题、帮助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等提供智慧和力量。为此,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符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等相符合,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两个结合”的出场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必然性,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到内在特征结合的层次递进,生动展现科学理论的蓬勃生机和与时俱进的理论优势。

(二)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

“两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

时代要求。“两个结合”聚焦新时代新征程的现实挑战和深层次要求,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和总结“第一个结合”的实践活动,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活力的重要引擎,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变化积极推进理论创新的自觉与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现实指向和新的理论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深度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战略支撑作用愈发凸显。只有不断地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物质和丰富养料,才能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滋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沃土。“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聚焦国情变化、适应时代发展不断探索的结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次理解,凸显出自身拥有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第二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五千年文化传统浸润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规守与价值理念相适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同,从而更好地凝聚人心、整合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柱。“两个结合”一方面强调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新的理念,获得具有民族特色的传播形式、话语体系,从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与运用;另一方面强调在结合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去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去除糟粕,强化指导思想的本土气息,从而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结合”的出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要求,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理论联系:“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关系

“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基础。在历史基础方面,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根据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结果,前者以历史的实践对后者提出时代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于“第一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之中,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是广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情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愈发突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相结合成为党在理论层面必须厘清的关键性问题。在理论基础方面,“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总原则,“第二个结合”则是在此基础上呈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与文明性。“两个结合”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在继承“第一个结合”的实践成就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华文明为底色,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将二者紧密联系,融会贯通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

“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拓展。在内容上,“第一个结合”聚焦于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实际问题,针对的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问题。“第二个结合”则是紧扣让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融入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针对的是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关系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示出强大生命力。前者具有总体指导作用,后者具有重点强调作用。“两个结合”不是“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新形势下赋予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创造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提出的新命题。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第二个结合”突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时代价值和重要地位,是“第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理论升华。在方法上,“第一个结合”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科学理论武装人民头脑,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以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展;“第二个结合”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使理论转化成现实中的自觉行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发挥科学指导作用提供文化支撑。

“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共同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二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和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一切斗争的最终归宿,两者是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同一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体现。“第一个结合”强调的是避免教条化和僵化应用科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武器。“第二个结合”则是党在正确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历史维度:“两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历史脉络的高度凝练

(一)“形式”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结合”的探索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基于西工业生产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对内容和形式进行一系列的转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实

现的。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并未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没有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规律,在理论方面还不够成熟。部分人不顾及中外国情的区别和时空差异,将马克思主义“本本”机械照抄照搬到中国革命中,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奉为圭臬,再加上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冒险主义与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教条主义,以文本为出发点,无视中国实际,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痛定思痛,逐渐意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开始思考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问题,尝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来,探寻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是思考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行者,他在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结合”的科学论断。“第一个结合”在党的理论创新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明确地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的实际环境之中,是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大突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历程。

(二)“内容”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毛泽东强调要立足国情进行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在理论方面,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系统深入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实践方面,毛泽东基于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对历史的深刻认知进行艰苦的探索,找到了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毛泽东在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问题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精神武器,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彰显其对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这句话的前半句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适应,并随着实践变化进行理论创新;后半句指的则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风土人情相结合,以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语言文字来阐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阐述党的理论与路线,如用“枪杆子里出政权”来强调武装斗争和军队的重要性,将“三大法宝”比作元始天尊赠送给姜子牙的打神鞭、四不像和杏黄旗,以“曹刿论战”的典故来说明中国革命怎样以弱胜强,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交相辉映,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对“两个结合”的一种特色表达。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思想智慧,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中华民族韵味和时代气息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如将《礼记》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二字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理念;将“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和合”思想融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使党的社会建设更具人文关怀;借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中的与时俱进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创新发展的新命题;吸纳“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中的政治智慧,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等等。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的精辟阐释和凝练表达,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集大成者。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与民族独立性,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大的文化感召

力,在历史交互的关键节点上实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新飞跃。习近平指出,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6]。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对指导思想进行守正创新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最新成果,不但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而且提供了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遵循。这一思想彰显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性意义和实践的根脉性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指导思想体系的文化深度和实践广度;将其融入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如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基础上传承“敬德保民”等爱民重民思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吸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汲取“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等哲学智慧,提出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诸多科学思想方法;等等。

(三)“本质”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验的科学凝练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7]例如,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在社会发展目标的价值主张上相通,二者都代表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所憧憬的未来社会都是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物质与精神的极大丰富,消灭矛盾与冲突,建立人人平等、人人友爱互助的新社会。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理论品质上贯通,以“气一元论”为代表的朴素唯物论虽然带着鲜明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但仍然肯定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而不是意识;以“阴阳学说”为代表的朴素辩证

法虽然缺乏实践基础,但力求通过“阴”“阳”的对立转换说明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实践精神与知行合一在内容方法上共通,知行合一与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是对日常生活中知与行关系的思考,都强调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努力做到“以知促行,以行求知”,追求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人民性与以民为本在价值立场上融通。民本思想强调“民为邦本”“以民为重”,尽管它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的,但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始终贯彻在中国治国实践之中,被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具有契合性,二者都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人民立场和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深入结合的光辉典范。

“两个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概念上的表面交叉,也不是数量上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在自身文化本质层面和内在价值层面的深度融合,这是超越话语表达形式结合与内容创造的更为基础和深层的内在逻辑。强调“本质”层面的契合不是对“形式”与“内容”层面结合的否定,而是在继承二者基础上的深层次结合。这表明党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进入新境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更好地发挥其解决实际问题、指导实践的价值作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扎根中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究其根本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具有同构性,二者经过“两个结合”的赋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属于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向现代。

三、价值维度:“两个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一)“两个结合”承载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与历史主动

文化事业是关乎国家富强的重要因素,是代表

政党发展进步的精神旗帜。文化自信作为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最为深沉、最为持久的精神力量,对于支撑党的战略部署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国,中华民族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面临着列强文化入侵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岌岌可危。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虚弱的中华民族注入一针“强心剂”,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全新的科学方法和强大的思想武器。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开展,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发展,文化创新高潮迭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朝气和活力。作为中华文明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捍卫者,中国共产党人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与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性互动,实现二者深度融合,形成对推动中国社会实践向前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形态,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与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这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创新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明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主动在新时代达到新高度。作为推进“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了对“一个结合”的认识飞跃,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推动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两个结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领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度自信。

(二)“两个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需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地

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科学的指导思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证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道路顺利进行。“两个结合”要求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习近平强调:“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8]“两个结合”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视野,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化根基,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丰沛的精神动力,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眼于实际变化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表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

“两个结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首先,“两个结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化时代化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锻造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使党对主流价值观念的宣传更加通俗易懂、更易深入人心,形成更具凝聚力和说服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次,“两个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解决,推动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鲜活的中国理论来回答“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最后,“两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方向,既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实践发展基础上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又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创新和拓宽文化传播的方式与途径,增强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社会公民的自觉行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各民族灵魂与内

心深处。

(三)“两个结合”彰显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思想

“两个结合”的终极旨趣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回答“人民之问”为切入点,满足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中产生的新需要,是推动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两个结合”,能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与文化获得感,为广人民提供价值指引,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人民对精神文化需求显著上升,对生活品质提出更高要求。“两个结合”能够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魅力的人文精神和特质,以其特有的价值引导和思维方式来满足人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滋润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价值底色,成为“两个结合”的价值指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9]。“两个结合”是造福中国人民与普惠世界人民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两个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支撑,从研究和解决阻碍社会进步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入手,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难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以和为贵”等思想结晶,以“天下一家”的宏大视野把握世界局势,构建“世界大同”发展蓝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两个结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体性向度,坚持人民至上,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将为人民守初心担使命的价值指向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形成的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历史首创精神,实现了文明发展形态从资本逻辑向人民逻辑的历史性变革。人民

群众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关乎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现实民生问题理所应当成为理论发展成果观照的核心对象。只有坚持人民利益的价值导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使党的根基与血脉扎根于人民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民群众积极主动进行理论创造,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强化人民群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社会认同,在共同理想信念下凝聚人心,从而真正实现“两个结合”。

(四)“两个结合”铸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辉煌

文明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和标识。习近平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0]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迄今为止唯一经过历史长河冲刷洗礼而绵延不断传承至今,并且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伟大文明,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多元思潮激荡中屹立不倒的精神根基,成为党和国家在国际领域的独特优势。“两个结合”为传统形态的中华文明飞跃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力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命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在指导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以自身实践性和发展性激活中华民族的主体创造意识和本体价值意识,使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历史担当推动现代文明建设。在思想路线方面,坚持实事求是,认清变化发展着的实际情况,正确把握时代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与理论创新要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在文化立场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文化根基和价值引领,以厚植本体向度来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统一性,以主体精神推动文明演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两个结合”。首先,“两个结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提供文化资源。“两个结合”在否定盲目复古和全盘西化

两种极端的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共通的先进文化因子,这表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是与古老文明割裂的,而是在遵循文明发展规律中脱胎于古老文明的新产物,体现了新旧文明之间的贯通性。其次,“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文化根基,从历史沉淀转向现实观照和未来憧憬,不断培育和创造契合新时代的先进文化,突破现代文明同质化的桎梏,以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丰富拓展世界文明宝库。最后,“两个结合”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要求,否定简单“代替”和武断“截取”,扎实开展对传统文化的学理研究,回答时代课题,增强自我批判意识、借鉴外来文化,以服务当下、面向未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价值追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文明土壤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4.
- [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 [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 [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每日电讯,2023-09-01(1).
-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
-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10]张贺,王珏,郑海鸥,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7-27(18).

责任编辑:祝远娟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耿文建,袁伟华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300387)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历史观。只有秉持整体化的文明思维和历史意识,才能在悠长深厚的人类社会演进与思潮变迁脉络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必然。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世界历史;大历史观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2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13-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战略步骤,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从大历史观出发,秉持文明思维和历史意识,可以更好地在悠长深厚的人类社会演进与思潮变迁中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文化根基和历史脉络,科学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大历史观就是运用历史思维,从文明长河中看问题,整体分析事物的来龙去脉,以往昔观照现在、以过去开创未来。习近平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

性、创造性。”^[1]基于此,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理解,有助于增强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一、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世界是中国在场的世界。分析中国问题,应有世界视野。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2]世界历史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现代化而言,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并

收稿日期:2023-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21)。

作者简介:耿文建,男,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伟华,男,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非现代化的固定模式和发展终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视角准确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阶段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生产方式不断演进的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592} 马克思揭示出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单向度的,而是具有一元多线的历史脉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化内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历史具有“人造性”,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革命的力量。正是在继承传统农耕文明成果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得以萌芽与发展。马克思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4]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现代化呈现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不断推动商业革命发展,由此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形成世界市场,开启世界历史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论述了“世界历史”的概念。第一,从时间维度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196},世界历史是人类史的整体发展过程。第二,从空间维度看,各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流联系日益密切,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性存在。随着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改进,个人的活动拓展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促进新兴资产阶级发展壮大,而且掀开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6]171}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思想,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540-541}。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不是自

然发生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生产和消费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业化发展打破了世界各国孤立状态,各国交往联系日益密切,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时代。大工业造就了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时代,使得人们“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5]541}。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566}。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发展不仅把人类带入世界历史,而且加速了人类现代化文明进程。“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5]680} 大工业不只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类社会,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

大工业不仅极大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加速了世界历史的演进。在大工业扩张下,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向全世界范围内拓展,现代化交通发展加速他们走向世界性联合。“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3]40} 世界市场所产生的聚合效应一方面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无产阶级遭受世界市场的奴役。“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5]567}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只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无产阶级才能完全摆脱压迫,共产主义事业才有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5]539}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指出,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成果属于全人类。这就为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指引了光明前景。

(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既阐明大工业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进程,又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危机愈演愈烈,西方社会民本性的丧失、贫富差距拉大、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盛行、自然环境恶化、战争与冲突频繁发生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制约和危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作为曾经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进步力量,逐渐演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后退力量。

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化,而私有化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在资本逐利之下,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剥削压榨工人,这导致财富积累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与其相对的是工人只能靠着微薄的工资勉强度日。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者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钱袋。”^[5439]在文化层面,资产阶级受物化逻辑控制,推崇资本至上,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由于物化逻辑支配整个社会成为一种常态,人们沉溺于在财富占有、物质膨胀中,迷失自我。马克思指出:“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594]正是在这种极度追求物欲的思潮下,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缺乏内在价值的追求,精神被抽离,人被物化、异化。

在社会层面,资产阶级一味追求财富,忽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无产阶级成为大工业发展的牺牲品,连最基本的健康条件都不能满足,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5411]西方工业化愈是发展,给普通工人生命和健康造成的伤害愈大。

在生态层面,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而破坏自然的行为进行过严厉批判,指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

我们进行报复”^[7]。

在对外关系层面,资本主义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和发战争横财,肆意挑起战争,破坏世界的和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871]资本主义发展是“海盗式”掠夺,以损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其资本积累过程充满着血腥与暴力。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和战争的方式来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苦难,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是人类希望所在。在资本逻辑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导致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异化”,劳动者受到资本的支配,资本家同样被资本所驱使。为此,马克思讽刺地指出:“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5119]马克思在反思资本主义给人带来苦难的同时,明确了这一发展不具有普世性,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社会。他认为,从资本逻辑看,西方资本主义的内源性现代化道路“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8583]。马克思通过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发现一种新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由此提出“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一些国家可以不走资本主义发展老路来实现自身快速发展。马克思详细考察了俄国农村公社,认为“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8576]。“卡夫丁峡谷”理论虽然是以俄国为对象提出的,但它不仅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为那些不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不曾断裂。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9]22-23}。这五个特征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民惟邦本”“天下大同”“先义后利”“天人合一”以及崇尚“和合”思想始终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史。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当代赓续。

(一)“民惟邦本”的民本观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特征。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现代化为归宿,充分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9]19}。人民至上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当代发展。

《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0],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统治者多奉为圭臬。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趋于成熟。先秦诸子百家虽然思想交锋激烈,但都不离民本思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民本思想有独特见解,他以“仁”作为社会伦理道德核心,向执政者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1],要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爱护人民。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仁政”学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民本思想逐渐成为统治者的信条,将重视民生与巩固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北魏时期,统治者提出“七十已上一子不从役”^[12],主张通过免除老人子孙徭役减轻民众负担。唐朝时期,李世民从农民起义中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引隋为戒,要求为官者“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13]。到了宋朝,统治者进一步完善民生建设,建立义仓制、乡约制、义庄制,以备在灾荒之时为民提供帮助。这些民生保障制度,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

明末清初时期,民本思想有了新发展。这一时期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败,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加之资本主义萌芽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批有志之士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抨击。民本思想代表人物黄宗羲、顾

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萌发了中国民主思想。黄宗羲从君与臣、君与民的关系分析,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14],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以达到限制君权、维护民权的目的。王夫之提出“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等思想^[15],认为君主要以百姓为根基,强调民众的重要性。

近代以来,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受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理性主义的双重影响,倡导民权、限制君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丰富了黄宗羲“君为客”思想,提出“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16],进一步阐释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17]586},这对民众的思想解放和往后的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早期的民为邦本,延至三民主义,民本观中的人民主体性日益显现。

(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同”“小康”社会构想映射出中国先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成为共同富裕的传统思想根基。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对“小康”词汇的表述。《诗经·大雅·民劳》中写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18]“小康”原意为相对安宁,表达了先民对安定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百家各述共同富裕社会图景。儒家倡导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9],擘画了天下为大家所共有,人人讲究诚信,老弱病残皆受到社会照顾的大同社会。道家崇尚“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20]80},描绘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理想化的原始乐园。

经历战乱的汉朝,为恢复国力、巩固皇权,推崇“无为而治”,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汉武帝时期,董仲

舒主张“调均”，即“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21]，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目的。唐朝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反映了朴素的平均思想。及至均田被破坏，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突出，北宋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法，张载主张恢复井田制，意以均平价值理念推行改革、解决政弊。南宋朱熹倡议“随产均税”，强调社会共有来维护社会秩序。明朝的“一条鞭法”开始以土地大小为标准进行征税，一定程度上利于无地贫民。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以及清政府腐败无能，欲改变当时中国之状，构想出“大同”理想社会，并体现在所著的《大同书》中。他在书中详细描绘了“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理想社会^[22]。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7]832}，体现出他对共同富裕理想型社会的期望。中国古人“小康”“大同”社会思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文化源泉。

（三）“先义后利”的价值观

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益暴露出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等诟病，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盛行。马克思犀利地批评西方资本逐利的弊端，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6]209}。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来强调“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强调重义轻利。孔子多次推崇“义”，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4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2}。孔子把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视为小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在此基础上提出“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荀子义利观继承了孔孟儒家思想，又受其他学说的影响，主张“以义制利”，强调从物质利益出发来阐释道德在调节人们物质利益关系中的作用。

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在继承孔

孟义利观的基础上，董仲舒把“义”与“利”的关系割裂，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3]，认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宋明理学的兴起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的义利观。以朱熹和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把孔孟的义利观上升到新的高度，强调追求道义的至高无上性。朱熹提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24]，把义与利的对立转化成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存天理，灭人欲”价值理念虽有失偏颇，但道义追求仍有时代价值。陆王心学作为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义利问题探究上有共同之处，“致良知”的义利观，更加注重人的心性培养和道德品质的塑造，坚持将义置于利前。

明清时期，王夫之把义和利辩证统一起来，指出“夫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仁义未尝不利也”^[25]。王夫之对君臣之义作了进一步阐发，在君主专制发展到顶点之际，强调将维护人民之义、民族之义置于最高地位。重义轻利的思想一直占据封建王朝的主流地位，其义利观的价值取向涵养了中华民族崇尚道义、重视品德的优良传统，思想精华成为当代思想发展重要的价值源泉。

（四）“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重要特征。中华民族向来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为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难题提供了智慧与思想，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习近平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26]

先秦的儒道学说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131}，意指即使天不说话，四季也要更替，万物依旧生长，自然规律客观存在。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讲道：“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2]772-73} 孟子认为伦理、规律都普遍存在于社会规范与自然界之中，强

调人们要遵循天时。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25}自然是万物之本,人地天在遵循自然规律中实现了合一。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8],强调人与世界万物不应分离,要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合一。

秦汉时期,统治者专门设立虞衡制度对生态环境进行管理与保护。虞衡制度通过设置林官、湖官、苑官等具体官职达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重视自然的保护与修复,颁布植树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29]到了宋代,宋太祖颁布了《禁采捕诏》法令,要求人们在鸟兽虫鱼繁殖季节禁止捕捞,推动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宋人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即“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30],认为天性和人性是相通的,只有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才能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明朝时期,王阳明指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31],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于人心,强调人要有热爱自然的本心。“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一直流传于世、影响至今。

(五)“和合”的民族基因

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尚“和合”精神追求,又顺应了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利益、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深刻认识到战争对民众造成的苦难,倡导“和合”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11]5},认为礼的推行和应用都要以和谐为条件。看到诸侯争霸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736}。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用“兼爱”建立太平社会,他在《墨子·兼爱上》中提到“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32],认为天下有序治理的关键在于人人得以“兼爱”。

“和合”思想在中外交往中得到践行。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国家间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缘起。唐朝是丝绸之路交往的繁荣鼎盛时期,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取得重大成果,从广州或泉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可到达波斯湾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广为借鉴,丝织品、瓷器深受海外市场青睐,玄奘、鉴真海外学习交流,外国商品齐聚长安,各国青年赴华留学,异域宗教在华传播,等等,无不加强了中外往来。两宋时期,工商业发达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统治者鼓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主要商品瓷器远销欧洲,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外的和平友好往来。

明朝之后,对外关系有了新的进展。明太祖朱元璋主张对外和平交往,曾颁诏表明对其他国家来访平等相待。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给沿线的亚非国家带去了茶叶、丝绸、陶器等产品,未曾侵占他国一寸土地,充分反映出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加强交流合作的诚意。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寻富求强之路只为避免“亡国灭种”,而非求强图霸。民国时期,孙中山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强权政治,倡导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认为“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17]710}。“和为贵”“兼爱”等崇尚和平、追求和谐的“和合”理念,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历史,指引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三、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21}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看,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西方国家掀起科技革命,率先进入工业时代。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西方国家向中国销售鸦片,挑起战争,打破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36]为了挽救中国危亡,中国社会各阶级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地主阶级先进分子掀起了学习西方工业技术的热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实现救国目的。然而,无论是技术救国还是维新变法都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的共和制度,他们从维新变法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改变专制制度,只通过自上而下改革是行不通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才能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武装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西方民主制度并不适应中国国情,辛亥革命依然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器物 and 制度,但都未成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仁人志士开始对西方现代化产生了怀疑和失望。梁启超目睹欧洲景况之后,在《欧游心影录》中写下了“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33]。在中国先进分子探索现代化道路陷入迷茫徘徊之际,十月革命胜利的曙光让中国人民真正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其政治前提和条件就是要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现代化道路

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为巩固国家政权和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我国实行“一五”计划,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四个现代化”轮廓设计逐渐显现。1957年,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4]。随着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毛泽东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即“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35]。这体现了毛泽东现代化思想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与时俱进。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36]。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37]¹⁴,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以往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把现代化建设放在关键地位。为此,党中央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在对我国国情考察基础上,指出“现代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8]¹⁶³。他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38]¹⁹⁴这表明“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新表述,是符合具体国情的现代化。邓小平具体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总体目标和基本内容,即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在经济建设方面,党提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建设方面,党提出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38][46]}在文化建设方面,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8][208]}。在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方面,邓小平在深刻把握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三步走”战略安排,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中央基于国情、党情、世情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39]。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40]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关于“三步走”战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步骤,成为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的行动纲领。党的十七大明确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现代化建设布局由“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37][22]}。

(三)新时代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中国式现代化围绕“中国如何走现代化道路”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解答,是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习近平强调:“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41]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如何走现代化道路”这一问题提供参考,展现出作为负责的大国因应全球现

代化问题的责任与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高度。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拓展为“五位一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三步走”战略目标中所设定的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15年完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步步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奋力前进。新时代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领导,根本上要回答和解决“党的长期执政”这一根本问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42]。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确保现代化建设朝着既定目标前进,不偏航、不迷路。

“富强”即国富民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中国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军事、科技、外交等领域实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寻求富强之路与世界发展同向同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41]中国的发展是位于世界环境中的发展,本身就是对

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经济帮助和技术援助;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唯如此,中国还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习近平强调:“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大方向,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3]世界现代化道路多元、发展水平不一、文明形态多样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始终坚持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一律对待,尊重各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习近平指出:“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44]中国坚决反对文明“优越论”,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主动在多样文明之间架设交流的桥梁,积极开展国家间以及民间文化交流对话活动,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文明之间的美美与共。“全球文明倡议”成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旨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和谐”即实现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实现和谐就要避免资本主导、两极分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中国的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智慧与方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44]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推进国际合作和共享发展成果,实施基础设施合作、技术援助项目,设立专项资金,分享减贫经验等,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美丽”即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4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大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越来越显著。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幸福地生活,同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当前,全球环境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三大挑战。中国坚持绿色发展,力争最大限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坚持系统观念,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进全球环境治理。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
- [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0]冀昀.先秦元典:尚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7:52.
- [11]罗安宪.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文本:论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北齐]魏收.魏书1卷1-21:上[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99.
- [13][唐]吴兢.贞观政要[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94.
- [14][明·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李伟,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6:7.
- [15][明·清]王夫之.周易外传[M].李一忻,点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98.
- [16][清]康有为.孟子微[M].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20-21.
- [17]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8]佚名.诗经[M].梁锡锋,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25.
- [19][西汉]戴圣.礼记[M].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75.
- [20]罗安宪.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文本:老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1][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曾振宇,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229.
- [22][清]康有为.大同书[M].陈得媛,李传印,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5.
- [23][东汉]班固.汉书:下[M].长沙:岳麓书社,1993:1108.
- [24][宋]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35.
- [25][明·清]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M].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1095.
- [26]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4-23(2).
- [27][战国]孟轲.孟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 [28][战国]庄子.庄子[M].曹础基,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04.
- [29][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注译[M].袁文兴,袁超,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373.
- [30]王云五.正蒙会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65.
- [31]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43.
- [32][战国]墨翟.墨子[M].徐翠兰,王涛,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75.
- [33]王德峰.梁启超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200.
- [3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7.
-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92.
-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 [3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
- [40]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19.
- [41]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2).
- [4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43]习近平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N].人民日报,2021-12-06(1).
- [44]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10-17(2).
- [45]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01(3).

责任编辑:祝远娟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革命的路径生成及其启示意义研究

刘玉东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独特的社会革命实践路径,即坚持以人民立场作为社会革命路径选择的价值原则,充分实现公民权利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大价值;坚持以党内外严密的组织衔接作为社会革命路径的建构方式,将党的影响力广泛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从而有效地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国家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革命的路径生成启示我们:人民立场、组织衔接、自我革命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是党领导新中国社会革命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社会革命;人民立场;组织衔接;自我革命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3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23-09

社会革命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变革,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恩格斯指出,“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1][27]},揭示了社会革命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秩序的路径特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进一步揭示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革命路径选择的关系。经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式建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仅使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改变,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发生转变,文化观念不断更新,也探索了实现社会革命的路径,对新

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革命路径的生成轨迹及其经验,有助于深刻理解社会革命的路径及其优势。

一、社会革命路径选择的价值观原则分析

社会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长远的视角和规划,也需要分阶段推进,从而避免盲目冒进或过于保守。因此,领导者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和目标,制定适当的策略和行动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社会革命的主题及其实施方案。

(一)社会革命以坚持人民民主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

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问题异常复杂,既要解决

收稿日期:2023-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XZZ003)。

作者简介:刘玉东,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中国政治。

军事管制委员会向人民政府移交权力、旧政府工作人员去留等具体问题,也要着眼于破除旧的政治影响,建立新的政治生活等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社会革命的政治主题涉及对革命目标的明晰设定,需要建立新的领导制度与决策机制,以保持对革命方向和进程的控制。党的领导必须反映人民广泛的需求与期望,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政治活动,并获得人民的政治支持。

1. 社会革命以实现人民民主为政治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对政治体制的预期,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3239]。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中国化的代表著作,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政权的政治主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包含了工农大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等群体的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40]。《共同纲领》中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主张,从根本政治制度层面明确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原则。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原则纳入宪法,清楚地阐明了社会革命必须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主题。

2. 人民民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现代政治不仅要回答权力归属问题,还需因政治的复杂性,将一定的政治权力委托给专业政治家,从而逐步发展出政党政治。马克思指出,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最具资格和能力的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治上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4]。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应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9]。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成为新中国首要的政治问题。《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政治原则。1956年,周恩来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6],清晰地总结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关系。

(二) 社会革命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保证人民的经济权利

新中国成立前后,不仅面临恢复生产的问题,还要解决劳资矛盾、地主与农民矛盾等深层次问题。这些矛盾与旧社会积弊交织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社会革命需要识别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建立新的、更公平且有效的经济模式,以调整改善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解决可能的经济冲突和困难。由此,人民的劳动权利成为保证经济建设可持续性的条件。

1. 社会革命以建立计划体制保障人民参加劳动的权利。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理想的生产方式应是“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330]。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着眼于建立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管理体制。在实践层面,全民占有生产资料是一个整体概念,个体并不能以所有者的身份任意支配。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计划地利用”“人人都必须劳动”,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只能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人民来支配生产资料,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组织实现这种生产关系下的社会分配。中共中央于1953年2月颁布《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提出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统计机构,要求各级党组织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保证人民充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保护和发展工业,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建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体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启动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中国建设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7]。

2. 社会革命以建立公有制保障人民公平获得劳

动权益。要实现恩格斯的“同等的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就必须限制资本的剥削,建立全民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水平下,各个国家有着具体的实现方式。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人民自主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即便集体所有制代表的是全社会局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也不是个体的私人利益。为化解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借鉴了苏联经验,在《共同纲领》中规定所有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一步明确了依据这一原则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规范。1953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这就是经济领域“一化三改”的社会革命。毛泽东指出,“党的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9],再次强调了这一社会革命主题的重要性。

(三)社会革命以推进社会组织化保证人民的社会权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管理较为粗放,一些地痞流氓混入保甲组织,个别保甲长甚至是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封建家庭伦理关系和不良习俗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一贯道、宗族组织、同乡会馆等组织存在藏污纳垢现象。这一领域的社会革命,就是要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通过鼓励和提高公民的参与和合作,推动社会生活向更公平、人民更满意的方向发展。

1. 社会革命以建立高度组织化的公共生活保障人民的权利。社会建设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均为偶然之物,“单个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13]20}。恩格斯在《共产主

义原理》中也指出:“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13]240} 这些论断强调了基于国家公共责任,用有组织的方式解决公民生活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生活中的公共责任,必须提高社会建设的组织化程度。1949年,毛泽东亲自参与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提出,“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10],以提高社会组织化水平。此后,毛泽东多次发表提高组织性的讲话,将其作为社会建设的导向。在“三大改造”完成后,资本家和地主作为阶级被消灭,城镇居民大多成为机关、学校、国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单位的职工。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转变,每个人都被纳入特定的单位,形成大范围的分工合作,从而摒弃小农社会分散个体与扩大社会合作相矛盾的社会结构。人民在这种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公共生活中,获得工作以及相关的工资、医疗等福利保障。

2. 党组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着凝聚人民群众力量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对于促成社会成员共同的追求目标与价值观,以及协同行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提高党在社会建设活动中的领导与组织能力,基层党组织需要深入各类社会单位,履行联系与组织群众的职责。1950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否定了部分地区实行的“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明确了以“公开建党”代替“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工作原则,以加强党的领导。“公开建党”要求基层党组织从“地下工作”向“地上工作”转变,推进各行业党组织建设,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公开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觉悟。该指示还强调党组织应全面参与社会治理,坚定地将贯彻群众路线作为基本工作原则,以防止出现忽视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的偏差。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党组织作为联系社会各方的纽带,保证新的社会整合与治理合作得以实现的策略。

(四)社会革命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保证人民的文化权利

尽管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化,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以革命和

解放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以经世致用和博雅为特色的传统文化以及以民主和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之间缺乏有效融合,导致价值共识度降低。社会革命同样要针对文化建设中的问题,打破传统束缚,塑造新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在此过程中,教育和思想工作都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的文化经验和表达权利,增强其文化建设的参与度。

1. 社会革命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张,在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并强调“一旦理论掌握了群众,它就会变成物质力量”^[39]。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有深刻的理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易于民众理解和接受。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性阐释具有代表性,即让干部职工“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46],从而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广泛传播党的理论是引导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党中央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都必须“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并要“向一切反动的和错误的思想与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40]。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整合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塑造主流文化和社会的根本价值理念,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2. 社会革命以服务人民的文化建设为国民教育的目标。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857},后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12]1012},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明确了文化发展方向。马克思主张普及教育,并强调这种教育应当是义务性的,以确保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3]从国民教育的内容来看,必须是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从教育的主体来讲,必须是为人民办教育。这样,人民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导向才能得到普遍的改革。毛泽东在《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思想教育”和“全面教育”的概念,统一了国民教育问题上的认识。社会革命在这个过程,也是围绕着一一种共享的意识形态展开的,这种意识形态为革命提供了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经验表明,这种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在社会中推广。

总之,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社会革命的主题和提出国家发展战略蓝图的实践原则。从本质上看,从人民立场出发制定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中国的运用,就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联系”^[44]。社会革命是新秩序对旧秩序的替代,而建立新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体制以及文化教育体制,还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基础,这是社会革命必须解决的又一问题。

二、社会革命路径演变中的组织结构构建分析

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建立一个稳定且可以持续推动国家发展的路径。列宁为这个过程确立的政治原则,是要求共产党对“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政策实行总的领导与指导”^[51]。新中国党的组织体系的发展为党领导社会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的政策制定、执行以及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组织的角度去研究党如何领导社会革命,是深入理解中国社会革命成功之道的重要视角。

(一) 党在政治领域领导社会革命的组织衔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发展聚焦于政治体制和党的执政体系建设,确定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机构的关系是建立党领导社会革命路径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在政治领域推进社会革命的基本路径,即建立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政权机构,并确保党对一切政权机构的领导。首先,推行党委制、党组制,规范党组织与党外组织之间的领

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建立了一党执政框架下的党团制,其核心理念是在党外机关中建立党团,党团接受党委会的领导,党委通过党团实现对所有政权机关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借鉴了这套制度经验,党的七大以后正式将党团改为党组,发展出党委制和党组制,要求党中央关于政府工作的一切决定由政府中的党组执行,从而强化党对各级政权机构的领导,确保党的政治理念和方针政策贯彻落实。1949年11月,《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规范了新中国党和政权机关的基本关系,此后推行到各个层级的地方机关,形成了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其次,通过制度的创建与完善,细化党政关系的组织规范。这一时期,党还陆续制定和完善了党政机构之间的请示报告制,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党管干部制、分口领导和双重领导制度。党的组织体系与国家政权体系上下贯通,形成了以党委为核心的政治格局。最后,统一培养、训练和调配干部。为保证制度路径畅通,1953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开始对干部进行统一培养、训练和调配,从干部人事组织建设上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政权体系的领导,使得党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党政关系更加紧密。总之,党的组织体系与国家政权体系衔接,保证了党对政权机构的领导,凸显了党在社会革命中的核心作用,为党领导社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组织保障。

(二)党在经济领域领导社会革命的组织衔接

为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管理体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层面设立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从中央到省、区、市各级计划管理机构,在国家计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在省、区、市层面,设立企业工委以在国家计划的宏观框架下领导地方工厂、企业开展工作。在生产单位的微观层面,全国范围内的厂矿、交通等企业展开民主改革。各级党委大量抽调干部到企业,训练工人中的积极分子,

选拔一批职工进入管理岗位掌握企业领导权,并建立工会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以联系普通职员和工人。因此,党的组织体系成为经济建设体系的骨干,保证了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性变革。

党的政治领导保证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首先,没收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本,掌握国家经济主权。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允许外国企业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但在华外资企业逐渐采取自动歇业、转让出售或出租等形式放弃经营。1950年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封锁后,中国陆续接收了这些企业。其次,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到1949年底,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达2858个,涉及产业工人75万多人。此后,进一步对企业中公股公产进行清理,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扩大国有经济占比。最后,实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整个土地改革中,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6]。此后,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是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同时,在城市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组织体系与生产管理体系的衔接,形成了引领经济领域重大变革的途径。计划管理体制和地方企业工委的建立、生产单位的改革以及所有制的改造,进一步强化了党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地位,从而确保党能够有序推进社会化大生产。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石,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党在社会领域领导社会革命的组织衔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的组织体系为骨干,构建社会治理架构,将人民群众组织到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之中,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为引领社会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首先,建立街居制的社会治理系统。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探索居民委员会、街人民代表会议等基层组织形式,以替代保甲制治理功能。居委会与街道职能有效对接,成为党和

政府政策的有力推动者。其次,建立行政村制的社会治理系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或农民代表会议既参与选举乡政府委员会,成立乡人民政府,也协助政府工作,逐步发展出农村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紧密联系的组织关系,行政村成为社会合作治理的基本单元。再次,建立户籍制的社会治理系统。1950年,公安部提出有步骤地建立全国性户籍制度,于1951年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此后,民政、街道等行政单位将社会福利与户口挂钩,使户籍制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建立单位制的社会治理系统。单位提供职工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一些单位还为职工建设住宅,并组织家委会进行管理。从整个社会来看,农民由农业部门管理,通过劳动部门申请办理招工(就业)手续后成为工人;工人受劳动局管理,通过人事组织部门办理吸收、录用手续后成为干部;干部由人事局管理,包括干部的工资福利、人事变动等。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确保了党领导的社会治理体系在社会领域变革的顺利进行。

此外,零散的社会组织也被整合起来。一方面,主张积极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因为“各种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立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7];另一方面,主张强化管理,对社会团体重新登记,同时重视加强工会、农会、青年团组织工作。党既要依靠这些群众团体完成社会治理任务,也要借助这些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并强调这是党的组织工作方针之一。为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各级党委分配干部到这些组织兼任职务,进一步增强了党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组织。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衔接,形成了引领社会变革的路径。党通过建立街居制、行政村制、户籍制和单位制等社会治理体系,引领社会革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种高度组织化、有序化的社会结构,为党的领导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党在文化领域领导社会革命的组织衔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以人民为服务对象的国民教育,构建

了引领文化领域社会革命的路径。党一直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工作,很早就设立中宣部专门负责意识形态、新闻出版和教育方针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相继设立了负责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政府机构,如文化部、教育部等。在党组织领导下,这些机构与中央、各级宣传部共同制定党的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政策。为了传播党的思想文化,党还建立了众多教育机构并组织培训活动。例如,普遍建立党校系统、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培训机构和开设各类训练班、学习班,以增强党组织传播思想观念的能力;在城市中按区域或系统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党员及党外干部的政治学习;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中等学校开设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内容;运用广播、报纸、出版物和各类文教工具向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所有的“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468]。

党的组织体系与宣传教育体系的衔接为文化建设提供了路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1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指出“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469]。此后,全国范围内大中小学教职工和高中以上的学生推动思想改造。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使这些群体成为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同时,文化建设更加关注普通工农大众,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470]。学校向工农敞开大门,各地大力发展工农教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等。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宣传教育体系,不仅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也塑造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共识和价值认同。

总之,党的组织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同构,构建了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领导

社会革命的组织基础,由此党自我革命所形成的变化,必然会通过一定的组织渠道对社会革命产生深刻影响。

三、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路径特征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起到了把方向、保落实的领导核心作用。这种客观作用使党能够以持续的内部改革和自我优化,为社会革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国情的中国道路,是社会革命的重要任务。正如列宁所指出,国家发展必须依靠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9]。政治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从政治高度上对党和国家发展进行正确决策、管理和指导的方式。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包括领导干部对于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意识的增强,政治大局的洞察和判断,政治方向的准确把握,负责任的决策和执行,以及遵守政治纪律等方面。

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政治领导能力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为党把握社会革命的本质问题,为中国道路的探索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主张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提供保证。党组织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领导核心,党的自我革命成效必然会反映到国家机构建设中,彰显国家机构的政治属性,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导向,发挥群团组织的政治作用,将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各类组织和个人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党的政治追求贯穿于国家机构工作的任何环节,党的政治底线是任何国家治理机构必须恪守的原则。习近平强调:“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20]党的领导的重要形式是,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治理的制度规范。正是由于党的自我革命不断为社会革命提供新的发展理念、行为动力和行动规范,确保了国家建设的正确方向。

(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形成积极的文化共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塑造中国精神是社会革命的又一重要内容。其内涵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也必须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本土的精神面貌。思想领导是党通过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方式,具体表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通过理论武装、组织引领和文化引导等方式,加强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巩固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动力。新中国成立后,党重视加强思想文化工作。一方面,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学习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克服旧思想、旧作风,形成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思想、新理念;另一方面,有效培育全社会的集体记忆和观念共识。由此,党内的思想建设与全社会的文化建设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

党的自我革命提高思想文化领导能力的价值,体现在能更好地以党的理论和观念引领文化建设,塑造中国精神,从而凝聚社会革命的价值共识。首先,树立共同愿景,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人民朝这个方向努力。其次,树立共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再次,树立共同价值观,即提出人民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标准,如1949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提出的培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只有不断提高正确理解文化本质问题的思想文化领导能力,才能真正把握塑造什么样的中国精神和怎样塑造中国精神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提高思想文化领导能力的价值在于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即通过社会革命塑造中国精神,将人民的远景追求、乡规民约、道德公约和文明公约的行为准则等与当下的使命担当结合起来,不断塑造人民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认同。

(三)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实现高效的治理活动

社会革命是国家结构性变革,必须以党的组织创新为基础。组织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选拔任用干部形成执政团队,并通过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治理国家,带领人民群众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实现党的任务和主张。组织领导能力是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文化领导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自我革命对组织领导能力的提升,就是以政治生态的自我净化,严明纪律作风;以制度的自我完善,优化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组织优势;以组织建设的自我革新,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组织能力的自我提升,维护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实现党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执行力。

自我革命提高组织领导能力的价值在于,保证有合格的体制机制、人员队伍和组织方式,使社会革命各事项得到有效落实。从体制机制变革的角度来看,党的组织体系就像一张张开的网,将各领域的治理主体联系到一起,保证上下级、体制内外的治理活动的有效衔接和联动变革。从人员队伍变革的角度来看,党既吸收治理活动的骨干分子入党,也推荐党员干部到重要岗位任职,以保证党在社会革命中有足够的人才支持。从组织方式变革的角度来看,党组织联系基层、党员联系群众的组织方式,使自我革命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党自身的正确性,更让人民深刻体验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加入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实践。由此,党的组织体系让治理主体普遍形成高效的合作,使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同向发力,催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结构性变革。

四、新中国社会革命路径的实践逻辑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关键因素,就是坚守人民立场,通过保护和激发公民的表达和参与权利,使公民成为社会革命的推动者;基于党的组织建设,通过强化党内外组织衔接,使党的影响力广泛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坚持自我革命,通过焕发党的生机活力,使党有效应对和解决国家兴衰中的难题,引领

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一)国家兴衰作为历史的重要主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层次问题,社会革命基于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国家发展中的难题

破解国家发展中的难题,需要深刻的改革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正是这种改革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这种自我革命不仅对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更从根本上决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主动和深刻的自我变革过程。它要求党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完善,以提高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为人民和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自我革命强调自我批评的原则,严格审查和评估党的工作和行为,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和不足,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增强服务质量,激发党组织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社会革命要实现的深刻变革,需要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引擎。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价值观念等基本元素根本性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对执政理念、策略、组织和行为的全面检查和改革,从而使党能够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难题,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与以往相比,同样要进行政治和经济变革,也同样要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组织重塑,在这个过程中党内的组织衔接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社会革命就是基于党的组织建设优化国家治理体系

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一要强化党内的组织衔接。组织衔接是一种结构关系,涉及党内外组织的信息交流、决策协同、资源共享等方面。通过加强这种衔接,党的领导可以更深入社会组织,推动社会革命的实施。从组织学理论的角度看,这种衔接可以看作是一种“嵌入性”的体现,使得党的影响力能够通过社会组织的网络传递开来,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二要以党组织建设促进党内外组织的建设。组织同构增强了党内外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似性,党的组织优化和改革可以借此传导到其他组织,推动组织优化和效率提升。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看,这

种同构性可以看作是一种“模仿”或“模式复制”,各种组织通过借鉴党的组织优化措施,实现自身的改革,更好地适应变革的需要,从而提高社会革命的效率。

(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革命过程中人民主体性的坚守,以及在这一框架下对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关系的认识,决定了社会革命必须基于探索公民权利的实现而体现自身价值

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表达权利和参与权利,又以言行的基本形式践行了人民主体性的政治原则。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一要完善维护公民表达权利的渠道。公民的表达权利使公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成为社会革命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因此,维护公民的表达权利,为公民提供实现个人自由和发挥社会作用的途径,是社会革命践行人民民主政治原则的必然要求。二要搭建维护公民参与权利的平台。公民的参与权利不仅是一个政治权利,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使公民能够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策制定、生产分配、社会服务等。这种权利的实现,使得公民不仅是社会革命的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和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参与权利是实现人民主体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社会革命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充分实现公民权利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4.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5]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04.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32.
-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00-701.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1.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87.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
-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
-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3.
-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00.
- [17]浦增元.中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4.
-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405.
- [19]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5-246.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5-76.

责任编辑:陆姝彤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伦理意涵与伦理路径

廖仁郎¹, 欧阳辉纯²

(1.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南宁 530021, 2.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创造和实现美好生活,应推动人们把个人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解决好中国“富起来”的治理伦理难题,积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应把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加强政府伦理矫正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将生态经济伦理融入新时代伦理体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美好生活的生态屏障;把满足国内需要和国外需要相结合,构建“双循环”共享伦理发展新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美好生活;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4

[中图分类号]D616;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32-0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对“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重大课题的时代回答。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1]。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更事关党的初心使命,需要将其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并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新时代新征程,在高质量发展中协调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需要科学研判和系统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内涵

及其实践要求。

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伦理意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动态递增的^[5],本质上是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与升华,让人的主体性获得超验和超越。当前,在“富起来”的基础上探寻实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实践路径,需要把握好民生需求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的新转向,着力解决人民生活中物质丰富与精神不足并存的悖论。

(一)从供给型伦理主导到消费型伦理主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进入新时

收稿日期:2023-08-25

作者简介:廖仁郎,男,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欧阳辉纯,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

代,美好生活需要逐渐向广泛化、多领域、多层次提升,基础的物质生产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对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宽领域高层次地迈进^[6]。当“富起来”已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进步和生活富足促使人们对物质资料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生产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好不好”问题。顺应这一积极转向,需要加强对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价值引导,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推动消费升级,积极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流通改革,平衡好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之间的伦理张力。

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增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加重视促消费、扩内需的主引擎作用,解决好人民群众“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的问题。持续释放国内消费需求潜力,不仅是一道经济命题,也是一道伦理命题,因为“消费不足,不利于拉动内需,将制约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而消费过度,将对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道德风尚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时不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是对美好生活的误读”^[7]。释放人们的消费潜力,需要有辩证思维和发展眼光。当前,人们通过消费追求某种所谓“社会意义”的心理比以往更加明显,应该充分发挥消费伦理在刺激消费、塑造美好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满足人们对“意义的消费”的心理需要,既要通过织牢社会保障这张大网来提升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乐观性,制度性解决有钱不敢花的后顾之忧;也要通过政策杠杆引导资本市场积极构建文明、健康、绿色的消费方式,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人民持续增加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二)从关注生存伦理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物质基础支撑的美好生活,将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基于“富起来”的价值诉求,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发展主要偏重于物质资本积累,强调资源、资本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时甚至把资源、资本当成决定性因素。这种“重物轻人”的发展逻辑,缺乏可持续性。美好生活既是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一种主观建构。当人的发展性需求超越生存性需求时,人们会更加重视

可物化之外的价值性指标,更强调人的主体属性和主体能力的丰富和发展。总体上看,“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8]。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在确证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中释放人之潜能、提升人之素质、充盈人之精神、推动人之发展^[9]。

说到底,美好生活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体验^[10]。相比以往,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更突出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内涵,旨在让人有质量、有价值、有尊严地生存和生活^[11]。人作为美好生活的实践主体,要在奋斗中实现从物质充足到精神充实的提升,关键在教育。习近平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1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美好生活所需的价值元素,主要源于市场供给。这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在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价值优先性。确切地说,市场在给予人们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人们生活的竞争性,因此,唯有重视教育才能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对于个体而言,教育更是让生活超越有限和世俗,推动人从自我走向他人、走向社会、走向自然,最终实现安身立命的伦理路径。把握好这一点,就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推动教育资源走向均衡化,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人生出彩的机会。

(三)从全面小康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为了解决全体人民温饱问题,以物质生产为核心是完全正确的^[12]。时移世易,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是“发展的问题”,那么当下我们面临的则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我们应当瞄准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解决好“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问题。注重在经

济正义基础上确证人民的主体地位, 为人实现自身潜能创造条件, 推动中国在更高起点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中开创美好生活, 需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重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积极弘扬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精神, 把“为己”与“利他”圆融起来, 开创人我兼顾、己他两利的价值风尚。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可以说,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3]。唯有促进社会发展成果创造者与享有者相统一, 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才能有效地将经济绩效转化为巩固党执政地位、提升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坚实基础。把握好这一点, 就要“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14], 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在“富起来”基础上创造美好生活,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需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伦理意涵要求全方位扎牢制度的笼子,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努力做到“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 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15]。处理好民生与民主的关系, 让党的政治关怀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积极改善和提升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整体质态。同时, 鉴于“人权是已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6], 也要有意识地将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有机结合, 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 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拓展党执政的合理性要素。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蕴含着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追求

美好生活是人的生活超越性的体现。“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活动, 不仅要求在实践中变革社会现实, 而且要求变革人的思想观念”^[16], 增强满足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高质量需求的能

力。

(一) 个人发展与民族复兴密切相关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创造美好生活, 从小的方面看是靠自我奋斗, 从大的方面看则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诚如习近平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17]因此,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18]。以此为引领, 努力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答卷, 需要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依托制度优势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引导人们将美好生活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特别是当前,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要创造美好生活更要保持政治定力。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握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辩证统一性, 积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巩固扩大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正确理解“美好生活”, 还需要弘扬伟大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通过奋斗把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目标变成现实。

历史地看, 没有国家繁荣发展, 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要注重以家国情怀引导劳动者、企业家, 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中国式美好生活倡导的是小我与大我、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共建共享,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规范, 推动人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 越是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越需要补足精神上的“钙”, 让人们牢记中国“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在多元价值碰撞中守护好精神家园, 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 用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能量。

(二) 市场伦理失范与政府伦理矫正

民以食为天, 生活以物质为基础。美好生活的实现, 离不开市场的价值供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的个性在得以解放与张扬时, 也容易陷入“物的依赖

性关系”之中,引发一系列诸如人的异化、权力寻租等社会治理问题。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社会物资匮乏引发的“习惯性饥渴”造成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致使物质成为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这说明“物质的丰富不能使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相反会推动人们产生更多的需求和渴望”^[19]。因此,只有物质上的富裕,没有精神上的充实很难称得上是美好生活。在物质主义潮流之中重塑人们的精神信仰,规范权力运行,就成为当下创造美好生活的题中之意。唯有重视美好生活的道德维度,有效满足人们的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及时对社会发展观念进行伦理矫正,才能推动社会发展以“人的尺度”超越“物的尺度”。

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总要创造文化、追寻意义。因此,人的精神面貌标示着物质进步的方向^[20]。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自然需要人文精神的介入。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将深刻地形塑中国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与样态^[21]。新时代赋予美好生活更多的人文期待和自由空间,需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通过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引领净化社会风气,让党始终引领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22]。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越是和平时期,我们就越要保持政治清醒和自我革命意识,在吐故纳新中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使广大党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员干部要通过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意涵,积极克服“唯GDP论”“见物不见人”等思维惯性,在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础上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

(三) 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协调共进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对自然具有“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伦理责任。如果人类沉醉于自我贪婪的欲望之中,肆无忌惮地破坏和谐美丽的自然生态系统,那么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资与资源时,应当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自觉服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正义的道德法

则,将开发自然的力度控制在自然生态阈值的可控范围之内。我们对国内外生态环境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应从聚焦于“问题”“危机”的应对,提升至“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加以审视和把握,凝聚全球最大公约数,合力修复工业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应当把生态治理能力纳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特别指出:“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23]可以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24]。摆正人与自然的的关系,需要将自然生态环境视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竭力降低人对自然生命力的无端损耗。补齐生态环境这块突出的民生短板,关键在于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积极依托市场杠杆和政策杠杆把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不断赋予人与自然关系新的时代内涵。我们既要肯定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又要尊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引导人们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近年来,国内生态旅游持续升温,就说明在创造美好生活中追求绿色生态不仅是一种时髦的消费观念,而且正在转化为一种新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

三、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美好生活的伦理价值路径

习近平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25]创造美好生活,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要在实践中变革社会现实,革新人的思想观念,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一) 解决中国“富起来”的治理伦理难题

治理的背后是利益关系的协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切实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就要在破解治

理难题中加快推进现代化, 包括妥善解决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治理难题等。如果说,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主线是“富起来”, 那么迈入新时代后则应聚焦于解决好富起来以后的问题。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解决好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 重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温度, 让城乡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历史纵向地看, 制度是定国安邦的根本。面对新形势、聚焦新矛盾、回应新诉求, 关键是通过制度安排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一是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聚落, 城市和乡村在美好生活中均扮演着独一无二的价值, 两者相辅相成, 不能牺牲农村发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城乡的背后都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推动城乡人民群众更公平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必须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的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自觉将城市和乡村视为统一的有机整体, 高度重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工差异和价值功能, 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城乡融合模式。通过更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 着力提高城乡参与主体之间的公平性, 充分发挥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魅力, 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加强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后, 人便有了自我实现、超越功利的精神文化需要。特别是当前, “泛娱乐主义”思潮下所产出一批庸俗、媚俗的文化产品, 严重影响和侵扰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理性选择。为此, 要加快优质文化产品供给, 使其起到引领文化消费、提升人们精神追求品质的积极作用。要高质量供给更多弘扬时代精神、延续民族文化的新时代文化产品, 引导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将中华文化精髓用艺术审美、故事情节、商业运作等形式展现好、包装好和诠释好, 注重调整文化产品供给结构, 推动中国文化产品从偏重供给作品向注重供给

功能转变。

三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创造高品质生活,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意味着要让人民拥有更满意的收入, 更高质量的就业, 更加均衡的教育,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显然, 这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 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既要加强顶层设计, 也要讲究因地制宜。当前的关键是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采取多种措施稳岗位保就业, 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结合, 制度性塑造和优化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发展环境,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立足点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二) 将生态经济伦理融入新时代伦理体系

放眼世界, 工业文明在极大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 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破坏。面对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 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下,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筑牢美好生活的生态屏障, 要立足更高远的生态价值视域, 思考、设计和创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路径。将生态经济伦理融入新时代伦理体系和生产力体系, 切实承担起爱护生命、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使命。

一是培育健康消费理念。人因自然而生, 人的衣食住行无不与自然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便有了将人类的伦理关怀对象从人类圈扩展到自然界的内在伦理诉求。一方面, 要强化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 引导企业深入了解人们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心理性的绿色消费需求, 使其在绿色生产中获取可观的生态红利; 另一方面, 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绿色消费教育, 推动绿色环保、动物保护等生态学习常态化, 将绿色理念贯穿生产和消费全过程, 逐渐推动我国商品价值链绿色化。

二是推动绿色发展转型。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空

前强烈,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是当务之急, 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任务。要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并将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

三是坚持义利共生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 道德伦理的背后是利益关切, 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利益关系的折射。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将生态经济伦理融入新时代伦理体系, 让这一事业变得“有利可图”, 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双轮驱动。具体来说, 通过引入市场化手段提高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效率和效果, 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价值诉求。自觉将生态环境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积极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 构建“双循环”共享伦理发展新格局

创造美好生活, 归根到底要立足国内,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力量把美好生活的愿景变成现实。这并不意味着调整对外开放政策, 而是更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把满足国内需要和国外需要相结合, 拓展和提升美好生活的实践向度与温度。

一是更加重视经略周边地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 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塑造互惠格局, 不断将地缘毗邻优势转化为对接合作的发展优势。要提升睦邻外交政策的开放性、惠及性、精准性,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区域联动发展, 不断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

二是深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创造美好生活需要世界眼光。当前, 世界各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依托政策杠杆提振全球经济增长信心, 让全球资本要素逐渐恢复有序自主流动。聚焦中国, 则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要素,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 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此同时, 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 加强跨境制度性合作, 推动我国沿边地区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价值融通和深

度互动, 让各地区人民均能共享扩大开放带来的发展红利。

三是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确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世界各国唯有超越意识形态之争,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国际合作, 才能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 降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负面影响。各国应基于人类健康的共同利益, 重新审视全球化的价值意涵, 将公共卫生安全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 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开放性,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结语

新征程创造美好生活, 涉及方方面面, 其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具体落实到人的具体生活, 即突出人的发展逻辑的中心地位, 让资本更有利于社会 and 人的发展。习近平指出, 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24]。当前, 绿色生态要素在美好生活中的价值比重愈发凸显, 在现代化布局中不容忽视, 应因地制宜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思想观念领域净化消费环境, 应推动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 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绿色的生活样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520.
- [2] 蒋红, 卢俊岚. 始终不渝为人民: 从百年历程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宗旨[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5]尹杰钦,滕茜茜,聂川.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依据、维度及特点[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6]薛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奔赴美好生活的逻辑进阶[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6).
- [7]周中之.用文明健康的消费伦理引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追求[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07-28(1).
- [9]李明.美好生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N].光明日报,2021-07-19(15).
- [10]邹广文.美好生活的价值向度[N].光明日报,2019-01-21(15).
- [11]李泽泉.美好生活与规则意识培育[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5).
- [12]何星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J].人民论坛,2017(S2).
- [13]习近平: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N].人民日报,2021-01-12(1).
- [1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1).
- [15]徐显明.人权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85.
- [16]张孟杰.人民美好生活的本质构成与实现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4).
- [17]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N]. 人民日报,2012-11-30(1).
- [18]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1).
- [19]正视物质潮流中的心灵之惑[N].人民日报,2010-09-09(6).
- [20]邹广文.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N].光明日报,2014-02-19(16).
- [21]陈翔,温潘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伦理意蕴[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 [22]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J].求是,2019(15).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4]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

责任编辑:许立坤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哲理道理

盛寿河,江晨颖

(上饶市社会主义学院,江西上饶 334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学理、哲理、道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着对社会运行逻辑的深刻考察,体现了坚持“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应对统战工作新形势的现实逻辑、汇聚最广泛力量的实践逻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着对历史辩证法哲理发展的深刻阐释,凸显传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法宝地位,彰显主体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最大政治,明确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工作方针,探寻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统战工作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着成功实践之道理,在领导力量上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工作局面上构建齐抓共管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工作方法上处理好统战领域的“四对关系”,在工作重点上着力做好“五项重点工作”。

关键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逻辑体系;历史辩证法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5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39-1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学理、哲理、道理,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

一、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

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为了更全面直观地理解其科学内涵,本文结合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成果,对这一重要思

收稿日期:2023-09-2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院系统2023年重点招标课题(ZDKT2023004)。

作者简介:盛寿河,男,上饶市社会主义学院文史与统战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江西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社会治理;江晨颖,女,上饶市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想主要包含的基于“三个更加重要”的认识论、把握好“四对关系”的方法论、概括为“十二个必须”的核心要义,以表格的形式进行总结梳理(详见表1、表2、表3)^①。

表1 基于“三个更加重要”的认识论

三大变化		三大作用	三大使命
世界之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维护国家利益
历史之变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服务国家治理
时代之变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汇聚磅礴力量

表2 把握好“四对关系”的方法论

四对关系	核心理念	工作目标
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	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夯实团结根基,扩大团结范围,不断增进共识,形成更大的同心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促进五大关系和谐。
潜绩和显绩的关系	坚持正确政绩观,既要做得见的显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解决好等不得的问题;也要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处理好急不得的问题。	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党的统战事业行稳致远。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	拿捏好分寸,把握好尺度,做到宽严不误、亲清分明。
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善于把团结与斗争统一起来,既善于团结,达成有原则、负责任的团结,又善于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表3 “十二个必须”的核心要义

类别	内容	旨向
关系论(为什么)	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传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关系;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类别	内容	旨向
实践论(做什么)	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必须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握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紧抓统战工作的牛鼻子;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扩大统一战线的同心圆;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方法论(怎么做)	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把握和处理“四对关系”;固守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圆心。

近年来,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比如,谌炎从理论意蕴、文化滋养、时代呼唤、实践沉淀四个方面分析了这一重要思想生成的四维逻辑^[1],蒋连华详细分析了这一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2],赵克强从认识角度、工作角度、巩固和发展的角度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了研究^[3],李忠壹等从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三个维度分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系统性和创新性^[4],郭志云研究了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理论特色及其重大理论贡献^[5],冉小毅分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6],史兰详细分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文化底蕴和实践要求^[7]。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这一重要思想后,学界主要集中在生成逻辑、时代背景、内容体系和实践要求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总的来讲,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整体脉络仍需进一步梳理。基于此,本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哲理道理进行探讨。

二、学理:逻辑演绎之理,是对社会运行逻辑的深刻考察

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

^①表1、表2、表3内容参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1版。

规律,主要包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等规律。统一战线是在社会运行中为达成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战略,是基于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政治联合,有其特定的来源、特征和功能。因此,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可以从生成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制度逻辑等维度进行考察。

(一)生成逻辑:坚持“两个结合”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坚持“两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思想建党的根本遵循和基本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党的百余年历史经验,始终把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从新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与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从理论渊源上看,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自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8]以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性地建立和发展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成为党夺取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并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坚持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从文化特征上看,党的统一战线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指出,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9]。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善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贯通于统一战线的实践中,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统一战线大团结大

联合主题,彰显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既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对“两个结合”的百年探索,也离不开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实践的创新。习近平出生于革命家庭,从小家教甚严,父亲习仲勋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杰出楷模,一言一行对他思想影响至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习近平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治国理政实践的凝练,离不开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磨砺,离不开他直面统战领域存在新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最终在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二)现实逻辑:应对统战工作新形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新形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理据。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要不要统一战线、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建设统一战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有着许多原创性贡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统战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0]他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11],并从世界局势、国家民族、社会结构三个维度分析新变化,作出“三个方面作用更加重要”的重大战略判断,明确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和基本任务。

从世界局势看,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重大调整,国际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日益严重,大国博弈、地缘政治日趋激烈,国际统一战线任务愈加繁重。从国内情况看,在统战领域主要体现为所有制形式、社会阶层和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的新形势,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任务愈加繁重;新的职业群体、新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任务愈加繁重;社会文化多样化发展、社会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多元化,文化领域的统战工作任务愈加繁重。

马克思指出,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2]。新时代以来,国际格局和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阶层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群体利益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代统战工作对象呈现出空前的广泛性、鲜明的多样性、显著的社会性、巨大的包容性等特点。新时代统一战线紧紧抓住社会关系的根本,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解决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难题,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

(三)实践逻辑:汇聚最广泛力量

新时代统一战线基于“三个更加重要”的认识论,明确了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国家治理、汇聚磅礴力量的三个使命,为我们指明了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个大事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工作方向,蕴含着“人心往哪里聚、力量向哪里汇”的实践逻辑。

第一,着眼三个逻辑向度。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遵循着三个逻辑向度:一是联合海内外一切积极力量;二是建立阶级阶层联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要求;三是构建政治同盟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以此为基础,便于从宏观层面理解“三个使命任务”历史方位的价值所在。

第二,满足三大现实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的重要论断^[13]。这一“强大法宝”,一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客观需要;二是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三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以此为基础,便于从中观层面理解“三个使命任务”凝心聚力的价值所在。

第三,关乎“两个大局”和“两个基础”。新时代统一战线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全局”和“变局”出发,迫切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新时代统一战线关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这“两个基础”出发,迫切需要党外人士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画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以此为基础,便于从微观层面理解“三个使命任务”同心同向的价值所在。

(四)制度逻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这里的制度逻辑是指统一战线领域中行为模式和组织规范的符号结构,包括由内部条件或内部力量产生的内生性制度逻辑、因外界条件或外部力量激发的外生性制度逻辑,两者之间具有关联性、互补性。面对统战工作新形势,是其外生性制度逻辑的条件;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其内生性制度逻辑的需求。2020年12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将服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这是在原来的三大服务功能基础上新增的一条服务内容,赋予了统一战线新要求新使命,标志着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性制度逻辑正式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着眼治国理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分析研判统一战线各领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先后作出系列重大部署,颁布系列重要法规。2015年5月,首次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经过5年实践和完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于2021年1月正式施行,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十二个必须”的重要论述、重大原则。

统一战线本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其提供制度支撑,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也有统一战线自身制度体系的建构,如《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明确了政治协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了党的统战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体系工作等。统一战线工作制度体系日臻完善,为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哲理:历史辩证之理,是对历史新发展的理论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总结了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的经验,明确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本质要求、工作方针、任务重点、基本要求、根本保证,充分彰显了党对矛盾观、群众观、实践观、发展观等历史辩证发展的规律的理性认知。

(一)法宝地位: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科学理论发展在总体趋势上表现为传承和创新的统一。传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勇于创新思想体系,又善于传承前人成果,才会更好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个开放系统,在时空上有传承性、在内涵上有创新性。在“十二个必须”里,“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位列首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经历了确立、传承与发展的深化过程,坚持传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将统一战线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到新高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重要论断,并将“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14]转化为全党共识,推动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15]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强调:“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16]在21世纪之初,胡锦涛首次提

出了“三个法宝”的论述,即“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7]。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三个法宝”的重要论述。他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18]2020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第三个法宝”表述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地位、任务和作用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转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与时俱进,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19]

这一重要思想为统一战线法宝地位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不仅认为统一战线“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20]。由过去的“重要法宝”表述为“强大法宝”,从“三大法宝”之首到“三个法宝”之效,从“克敌制胜”的利器到“执政兴国”的良方再到“民族复兴”的方略,从“大团结大联合”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凸显了我们党对新时代统一战线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纵观党的百余年统战历史,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考量、全局考量和战略考量,尽管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成员构成、方针政策有所不同,但重要法宝地位不仅没有动摇反而不断增强,体现了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治理、民主治理、全球治理中彰显强大功能作用,发挥更大法宝作用的

主要体现。

(二)最大政治:主体性和主导性的统一

统一战线的政治属性经历了从“最大工作”到“最大政治”的历史辩证上升。毛泽东曾着重强调“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18]351}。习近平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19]人心和力量问题是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凝聚人心是其本质要求,汇聚力量是其根本目标,赢得人心是获得力量的前提和基础。从“最大的工作”到“最大政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力量和作用认识的深化。

从尊重统战对象的主体性维度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习近平强调,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工作对象特殊。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由“现实的人”组成的政治联盟,体现为一种类存在物,具有类本质的规定性和类活动的目的性,目标是联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揭示统战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他们具有“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统战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与智者对话、与贤人交往、与达人交流,必须重视党外人士这支重要力量。

从统战工作的主导性维度来看,人类价值追求的根本旨趣在于实现人的自由,体现为以物质生活、精神文化、价值规范等现实确定性为前提的人的可能性的无限敞开。统一战线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美好愿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旨趣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优势在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人民群众。新时代统一战线作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能够有效增进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三)工作方针: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明确为统战工作方针,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将“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作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汲取党的百年统战工作的重要经验、审视国内外时代大势而形成和发展的,充分彰显了理论、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辩证思维,体现出善于分析、把握和解决主要矛盾的能动性。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性和尊重包容差异的多样性是统一战线的一体两面。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18]358}这明确了统一战线领域底线思维的方向和法治建设的原则。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的矛盾统一体,这里的“同”就是一致性,这里的“异”就是多样性。只有“同”没有“异”,统一战线就没必要建立;只有“异”没有“同”,统一战线就无法建立。首先,一致性和多样性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对立统一、共生并存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源于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性,所有制形式、社会阶层、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是这一矛盾存在的现实依据,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整合多元多样社会资源是这一矛盾转化的现实原因。其次,一致性和多样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发展的。从统一战线的横向结构来看,统战工作范围和对象随着社会历史推进在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从统一战线的纵向结构来看,统一战线政治联盟的层次结构也随着社会历史推进在不断拓展,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四个阶级联盟”到改革开放后以大陆范围的联盟为主体拓展到“四者联盟”,至新时代统一战线已发展为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

者的联盟,统一战线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愈加凸显。“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工作方针的提出,展现出巨大的历史主动,体现出党的思想引领的针对性。可以说,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构成了统一战线的存在基础、运行方式和工作原则,决定着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总体面貌和发展状态。

(四)统战工作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习近平深刻阐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必须把握和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彰显出党对统战工作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人类认识过程是一个由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到特殊的循环往复过程。注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的实践规律,从统战的特殊性中反映普遍性,并推动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精神。这“四对关系”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又讲矛盾的特殊性,既讲工作的两点论又讲工作的重点论,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体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机统一,为党提高把握统一战线的政治性、规律性和策略性的辩证思维能力,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强调的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要求“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圆心,把团结根基铸牢靠,同时要不断增进共识,扩大团结范围,形成更大的同心圆”^[19]。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强调的是长期和短期的关系,要求“坚持正确政绩观,既要做看得见的显绩,更要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解决好等不得的问题,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处理好急不得的问题”^[19]。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强调的是必然和偶然的的关系,要求“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与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稳立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拿捏好分寸,把握好尺度,做到宽严不误”^[19]。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强调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要求“把团结与斗争统一起来,既善于团结,达成有原则、负责任的团结,又善于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19]。要准确理解“四对关系”蕴含的辩证法思维精髓,把握好统一战线工作的

规律,不断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

四、道理:成功实践之理,是被历史证明正确的政治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逻辑、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逻辑及新时代以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逻辑,是党守正创新、坚持团结奋斗的智慧结晶。

(一)领导力量: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统战工作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20]习近平多次强调,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和最核心的问题。因此,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既是开展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则,也是高质量开展统战工作的根本要求。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重要政治原则。政治原则关乎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和思想政治基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凝心聚力的价值取向,实行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协调组织,密切关注党外人士的思想动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引导。

第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关乎奋斗目标、伟大理想和队伍建设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加强统战队伍建设,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对党外人士“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做到诚恳谦和、平等待人、廉洁奉公”^[21],形成以党为中心的“众星拱月”统一战线基本格局。

第三,坚决落实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方针政策关乎制度保障和政治协商的成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专门规范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内法

规,为新时代统战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是专门规范政治协商工作的党内法规,为各级党委加强对政治协商活动的研究部署、统筹安排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各地做到“民主协商、理性协商、真诚协商、和谐协商”,保证协商活动计划性、协商议题针对性、民主决策科学性,促使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更加认同党的主张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工作局面:构建齐抓共管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10]《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所涉及的工作领导小组、各个部门之间权责关系、上下联动协同机制等方面的优化措施作出了具体规定和安排。

第一,党委统一领导。统一战线无小事,统战工作是各级党委(党组)必须做好的分内事、种好的责任田。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统战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统一战线重大问题、部署重要工作,确保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第二,统战部门牵头协调。统战部作为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承担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要加强自身建设、优化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成效。

第三,有关方面各负其责。各部门各单位要增强统战意识,齐抓共管,形成民主党派、民族、宗教、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侨务等方面工作的强大合力,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创造性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三)工作方法:把握和处理“四对关系”

“四对关系”是对统战工作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总结,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提

供了科学指引。把握和处理“四对关系”,关键是要在明确“过河”任务的基础上,知道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掌握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善于将统战思维和统战方法贯彻落实到具体的统战工作实践当中。

第一,把握和处理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一是要坚守底线思维,用好“思想政治引导”的方法,找到最大公约数。通过法治、民主讨论和说服教育等方法,将风险隐患和重大危机防患于未然,固守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心共筑中国梦,促进五大关系和谐。二是要增强朋友思维,运用“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的方法,画出最大同心圆。习近平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联谊交友”是统一战线的题中之义,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把统战工作对象变为统战力量。

第二,把握和处理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一是要树立“无我”思维,用好“润物细无声”的方法,广泛凝聚人心力量。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保持日日做功的毅力和久久为功的定力,做好打基础、管根本、利长远的工作。二是要夯实系统思维,用好“弹钢琴”的方法,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毛泽东将统筹兼顾比喻为“弹钢琴”,道出了整体谋划、协调各方、互相配合的工作之理。要将系统观念贯穿统战工作的全过程各领域,树立“一盘棋”意识,统战部门牵头履职,其他部门积极作为,切实增强统战工作的协同性、系统性、整体性,推动党的统战事业行稳致远。

第三,把握和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一是要坚持辩证思维,用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方法,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包容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22],做到宽严不误、亲清分明,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一致性。二是要坚定创新思维,用好“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前,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

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要洞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应对和解决统一战线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四,把握和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一是要树立团结思维,用好“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思想上的问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民主讨论、以理服人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和思想分歧;对涉及重大原则和是非问题的错误言行,要旗帜鲜明亮明正确观点,通过批评教育、思想交锋来纠正错误、去其弊害、巩固共识,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二是要建立共享思维,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原则,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要重视同盟者的利益关切,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畅通党外人士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沟通联系,为他们多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赢得党外人士的认同和尊重。

(四)工作重点:着力做好“五项重点工作”

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与“五项重点工作”统筹起来谋划部署,强调民族宗教工作已通过重要会议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全面部署,要抓好落实。同时,对新时代统一战线“五项重点工作”明确指出了着力重点。统筹谋划、一体推进、高效落实这些工作,一方面要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与党同心同德的高素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一支党性坚强、能力过硬、学识丰富、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统战干部队伍;另一方面要做好统战领域重大风险的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等工作,探索建立统战领域风险防控协同机制,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聚焦五项重点抓好以点带面贯彻落实。一是着力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二是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健全各类联谊组织、服务团体、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以

爱国奋斗为目的,以凝聚共识为根本,团结引导他们立足本职建功立业。三是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健全政企常态化交流沟通机制和平台功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分层分类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自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馈社会的表率,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四是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健全当地海外重点侨团、代表人士数据库,推进海外人士工作站建设,常态化开展联谊交友、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活动,涵养壮大知华友华的海外爱国力量。五是做好网络统战工作。互联网作为统战工作的新领域,要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既要做好网下“面对面”的工作,也要做好网上“键对键”的工作,加强对网红大V、意见人士的政治引领,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优势,努力将网上最大变量变成统战事业最大增量,并探索建立数字统战APP,构建大统战数治格局,共同构建网上网下统一战线两个“同心圆”。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工作重点和政策举措,蕴含着深刻的学理哲理道理,涵盖了统战理念、统战价值、统战目标、统战方法、统战格局等内容,精辟阐述了统一战线的存在基础、最终目的、如何发挥作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学理上具有鲜明的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以历史思维定位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以战略思维定位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在哲理上具有鲜明的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以辩证思维谋划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工作方略,以创新思维谋划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工作目标;在道理上具有鲜明的系统思维和法治思维,以系统思维构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大格局,以法治思维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湛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生成的四维逻辑[J]. 山西社会主义

- 学院学报,2022(3).
- [2]蒋连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研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6).
- [3]赵克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4).
- [4]李忠壹,肖于波,蔺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研究[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3).
- [5]郭志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丰富内涵研究[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6).
- [6]冉小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原创性贡献研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
- [7]史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文化底蕴和实践要求[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8.
- [9]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
- [10]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1).
- [11]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1).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23.
-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3.
- [1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3.
- [17]谱写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新篇章[N].人民日报,2006-07-13(1).
- [1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9]尤权.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法音,2022(9).
- [20]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61.
- [2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1.
- [22]《求是》杂志评论员.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J].红旗文稿,2022(8).

责任编辑:祝远娟

论人民政协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逻辑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瞿 磊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广西南宁 530021)

摘 要:团结和民主相互贯通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延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传统的需要,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人民民主是共和民主的崭新形态,具有团结和民主相互贯通的内在禀赋。在团结和带领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民政协这个团结和民主有机统一的制度平台。在人民政协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创造和凝聚人民团结的政治核心,统一战线是实现人民团结的政治方略,协商民主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践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人民政协发展的制度逻辑,赋予了人民政协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功能。

关键词:人民政协;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6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49-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人民政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制度逻辑,赋予人民政协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功能。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成立新中国的伟大实践,赋予人民政协两个基本属

性:一是统一战线组织的属性;二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属性。以上两个属性深刻地影响着人民政协的发展,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效应:一是提升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二是实践人民民主,推进国家一体化与制度化建设;三是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有机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团结与民主有机统一的国家治理机制,人民政协就是实践这个国家治理机制的重要制度平台。人民政协把民主建立在人

收稿日期:2023-08-25

基金项目:2022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2FZZ005);2021年度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申报培育项目(2021PY03)。

作者简介:瞿磊,男,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

民团结之上,巩固扩大了民主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组织属性为民主提供了组织形式和制度平台。人民政协把团结建立在协商民主达成的政治共识之上,团结是人民真实的意愿;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以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巩固了人民的团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厘清人民政协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逻辑,把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作为人民政协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根本遵循,不断彰显人民政协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

一、团结和民主相互贯通: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对民主功能的内在要求

在现代民主中,人民民主属于共和民主形态,也被称为人民共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没有照搬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而是选择了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的共和民主,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总结,其本质是源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对团结和民主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它有效回应了在超大规模国家建构人民民主对人民团结的内在需要。

(一)团结与民主相互贯通:共和民主的内在禀赋

团结和民主相互贯通是共和民主的内在禀赋,体现了共和主义的公共性。“从词源上看, republic (共和)这个术语源自希腊文 politeia,西塞罗最先用拉丁文将其表达为 res publica 并做了详细阐述”^[9]。西塞罗对共和国解释是公认的经典,“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10]。古代共和是希腊和罗马城邦的一种政体类型,与君主制相对应,共和政体强调国家的公共性、人民的整体性,国家与人民的一致性。现代共和民主被认为是与自由民主相对立的民主类型,卢梭和洛克分别是共和民主和自由民主两种民主理论源头的代表人物^[9]。自由民主坚持个人权利优先,认为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政治不具备道德意义。共和民主以人民主权为核心价值,人民作为整体掌握国

家权力,公共生活有高于私人生活的意义。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共和政体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6]。近代共和主义思想家卢梭认为,在共和民主中人民是通过社会契约结合而成的道德和政治共同体。“当它被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国家;当它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至于结合者,它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威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服从者就叫做臣民。”^[7]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秉承了共和传统,强调共和国中国家、主权和人民的一体性。从古到今共和主义流派纷呈,但公共性是共和主义价值中轴^[8],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作为整体构成国家。

马克思的民主理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卢梭人民主权理论进行了全面改造、全新阐释。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共和传统^[9],把国家看做人民的自我规定。“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0]另一方面,马克思赋予人民具体的阶级属性,揭示了民主的阶级统治本质,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民主新形态。共和民主具有团结和民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内在禀赋,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可行方案。

(二)再造共和:延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传统的需要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结构、经济社会状况影响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规范了现代化的本国特色。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长期历史的演进中,确立了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维护疆域和政治统一,以儒学意识形态维系伦理和精神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大一统政治秩序成为支撑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政治密码。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和世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

下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封建帝制崩塌之后,维系地方秩序的士大夫阶级衰落,基层社会逐渐散沙化。在一盘散沙的社会之上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不仅要按照民主原则重塑国家政治结构,还要按照团结的原则重建社会组织结构,把散沙社会变成具有组织形态的能动社会,民主才有巩固和稳定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活动中意识到现代中国需要的民主是具有组织和动员力量的共和民主,而不是强调追求个人权利、个性解放的自由民主。汉语的“共和”出自《史记》中“周召共和”的记载^[12]。现代汉语的“共和”一词,是19世纪70年代从日本传来的。“最早引入‘共和’新义的黄遵宪,对中国古代的共和十分向往”^[13]。那个时代的开明知识分子,如康有为、黄遵宪、蔡元培等人都用儒家政治理想的唐虞“三代之治”来诠释现代共和,这种思潮为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观念奠定了基础。孙中山批判了西方共和不适用于中国的陈腐观念,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三代之治”阐释“国家是人民的事业”的西方共和,认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始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14]。因此,共和民主的建国方案不是照搬照抄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天下为公”的现代复兴,是政体意义上的“再造共和”。

(三)人民民主:从人民的团结走向人民当家作主的成功道路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堵死了中国发展和进步的一切可能,革命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所以,再造共和不是将共和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赋予旧国家、旧体制,而是通过政治革命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是通过社会革命重建社会经济基础,建设新社会。因此,中国的民主不仅是国家建设的方案,也是革命动员的纲领。民主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不取决于民主本身,而取决于民主对于人民的性质和范围的确定。人民的范围越广泛,动员的革命力量越壮大;人民的范围越狭窄,动员的力量就越弱小。毛泽东说:“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

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15][1479-1480]}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由哪个阶级来领导,人民的性质和范围如何,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

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了统一战线在实现团结和民主有机统一中具有的重大意义。第一,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人民大团结的战略策略,党的领导、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三件主要武器^{[15][480]}。第二,统一战线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政权组织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的共和国,不是单一阶级的统治,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统一战线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形式。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科学预见,“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6][675]}。“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16][677]}。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走向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是“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5][472]}。在此理论指导下,1949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7]。第三,人民民主专政赋予统一战线以政治结构,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并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团结与联合。“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5][480]}在人民民主国家建设中,“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的有机统一是支撑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的‘重要机制’”^[18],它不仅巩固了党的领导,而且巩固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即人民的团结与统一。

二、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人民政协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逻辑

团结和民主的有机统一必须在人民民主国家加以制度化,人民政协就是实现团结和民主有机统一的重要制度平台。习近平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19]这段重要论述精辟阐述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人民政协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实践逻辑和制度逻辑。

(一)党的领导:创造和凝聚人民团结的政治核心

人民民主不仅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还要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理想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是创造人民团结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各个时期的任务和目标;运用群众路线把人民的愿望变成党的主张,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的自觉行动。党创造人民团结的过程就是实现党的领导的过程,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明确人民的性质和范围,制定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的统一战线战略策略,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的团结和联合。

党的领导是凝聚人民团结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用两种形式凝聚人民团结。第一,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完整的组织体系,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政治、思

想和组织动员,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共同的目标奋斗。这种组织形式把分散的群众个体变成团结一致的人民,将散沙社会变成具有组织结构的能动社会。第二,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建立起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种进步力量之间团结与合作的关系,形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同心圆。在人民民主制度建构中,中国共产党是创造人民团结的政治核心。

(二)统一战线:实现人民团结的政治方略

在人民民主中,人民是具有政治结构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的政治结构在组织上表现为不同性质和层次的政治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需要团结的力量。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是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需要巩固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和发展与工农联盟以外的阶级、阶层的团结与联合,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合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统一战线是实现人民团结的政治方略。第一,在人民民主国家,工农联盟构成人民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依靠的基本力量。第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要与工农联盟以外的阶级和阶层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与党在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接受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团结在爱国统一战线当中。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实践证明,只强调工农联盟,忽略、淡化、甚至否定与工农联盟以外的阶级、阶层的团结与联合,容易导致“左倾”错误。反之,只重视与工农联盟以外的阶级、阶层的团结与联合,忽视、淡化、弱化工农联盟,就会动摇阶级基础,犯右倾错误。两种倾向都会削弱统一战线,破坏人民民主。运用统一战线的政治方略来壮大人民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

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三)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中实践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协商民主是实践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体现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民主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与对反动派专政方面的有机统一。专政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手段。民主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协商民主的方法。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20]周恩来也说过:“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21]习近平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2],精辟地阐述了协商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得到各党各派、各族各界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在政党关系中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与统一战线各领域协商合作、寻求共识的方式实现的。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23],“也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19]。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实现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人民政协广泛和充分的政治协商,达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建制的政治共识。在人民政协制度安排中,中国共产党是创造和凝聚人民团结的政治核心,统一战线是实现人民团结的政治方略,协商民主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践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实现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方式。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是支撑人民政协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逻辑。

三、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根本遵循

新时代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就必须把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属性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属性有机协调起来,实现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这是对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和制度成长规律的深刻总结,是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深刻把握,也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根本遵循。

(一)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主题

1949年人民政协协商成立新中国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过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协商机构继续保留。毛泽东为人民政协规定了五项主要任务,即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的关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五项任务归结起来就是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左”的错误在统一战线上的表现就是采取关门主义,把接受共产党领导、愿意并且事实上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阶层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削弱了人民团结,破坏了人民民主。邓小平科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界定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23]187},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3]187}。邓小平特别强调发挥人民政协的民主功能,指出:“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实行相互监督,发

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23]187}邓小平主持人民政协章程修订工作时,爱国统一战线性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在新章程得到明确表达。1989年12月,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发展重新步入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促进的正确轨道。

江泽民、胡锦涛持续推动人民政协沿着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轨道发展。江泽民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1993年,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载入宪法。人民政协章程不断修订完善,人民政协性质从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扩展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2005年党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政党制度。2006年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内涵和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

(二)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三个方面,大力推进制度建设。第一,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全面领导,完善政协党的领导体制。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从政治责任、理论武装、政协党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严明纪律等方面明确了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领导的总体要求、具体部署和工作机制。第二,提高统一战线建设的制度化水平。201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21年修订后全面实施。条例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科学、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为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工作方向。第三,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这一系列制度建设,完善了人民政协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会议制度和工作制度,创新了人民政协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形式,为人民政协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提供了制度支持。

(三)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是人民政协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工作机制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综合承载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和职能,集中体现了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和协商民主渠道两大基本属性。其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功能是团结,工作机制是广泛凝聚共识;协商民主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机制是建言资政。党的领导为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在结构上相互协调,团结和民主在功能上相互贯通提供了政治保证。

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建言资政是人民政协履行协商民主职能的工作机制,贯穿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人民政协通过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机制建言资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人民政协的民主是充分尊重民意、广泛吸纳民智、协调多元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协商民主;是通过优化决策和行政程序、以良好的国家治理增进人民福祉、巩固和扩大人民团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在要求。人民政协是政治组织,凝聚共识首先就是要讲政治。政协党组要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上发挥领导作用;政协委员要通过理论学习、视察调研等形式,广泛凝聚共识,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上来。“人民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力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19]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机制,是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方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20]。

新时代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充分彰显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制度优势,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

[参考文献]

- [1]党建读物出版社.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29.
- [2]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J].中共党史研究,2011(5).
- [3]万健琳.公民与制度:共和主义两条进路的分立与复合[J].哲学动态,2010(3).
- [4][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9.
- [5][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4.
-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29.
-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5-26.

- [8]张凤阳.共和传统的历史叙事[J].中国社会科学,2008(4).
- [9]王志强.“社会共和论”:共和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J].哲学研究,2015(6).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1.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 [12]刘虹,等.“共和”术语的马克思主义中文文本溯源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9(7).
- [13]桑兵.历史的原声:清季民元的“共和”与“汉奸”[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8.
-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2.
-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80.
- [18]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
- [19]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1(1).
- [2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8.
- [21]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4.
- [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1).
- [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刘菊香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

李承儒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典型特征,是当今世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社会现代政治文明的建构中,西方社会的率先探索和实践为现代民主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随着时代发展,西式民主日益陷入民主衰败、民主失效、民主异化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创造从民主的实现形式和价值追求上完成了对西式“选主”和形式民主的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授权和行权相统一、程序和实质相统一、过程和结果相统一、国家意志和人民主权相统一、良政善治和人民诉求相统一、自我调适和人民利益相统一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建构,保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丰富了民主的类型,用自身生动的实践证明民主的建构没有定于一尊的固定模式。西式民主不是民主发展的终结,只有根植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实践探索的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民主,才是丰富世界文明之花、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西式民主;内涵特征;超越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7

[中图分类号]D621;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56-09

民主作为当今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典型特征。以公共意志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权力由谁掌控,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关键。现代国家的建构终结了统治者将国家权力变为私人权力的异化状态,实现了政治权力向人民的复归,却出现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的分野”^{[1]7}。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个人本位的民主理论成为“绝对真理”被四处推行。但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对

个人自由的无限放大,几乎断送了自由主义民主本身”^{[1]8}。资本主义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民主模式容易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危机,而解决危机的出路就是兼顾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作为人民本位民主理论的实践,中国的人民民主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建构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与西式民主有着显著区别。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

收稿日期:2023-11-01

基金项目: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3年专项课题(GSSYYB202312)。

作者简介:李承儒,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

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西式民主的当代困境

“人类在建构现代民主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的探索和实践具有首创性和引领性,既构建了现代民主理论和现代民主原则,又创造了现代民主形式和民主制度。”^[12]因此,西方的民主理论、制度和模式一度被奉为圭臬,指导着后发国家的民主建构,但一波波民主化浪潮并没有帮助这些国家脱离“危机重重、无效治理,甚至国家分裂和国家失败”的苦难^[3],反而使其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和争斗。历史和现实表明,西式民主日益“陷于治理衰败和民主衰退的双重困局中”无法自拔^[4],民主衰败、民主失效、民主异化的困境成为西式民主日渐式微的根源。

(一)民主衰败

民主先后历经古典民主、近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发展形态,其判断标准由古希腊时期的“人民统治”到近代以来“代议制被视作适应客观实际的最好体制,成为西方民主的基石”^[5]^[3],再到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把“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作为划分有无民主的根本标准”^[5]^[4]。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和寡头经济形成,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利益团体在公共决策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导致现代民主制度受利益集团的制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不断显现。

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6]^[66]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从生产关系层面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服务对象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其目的是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永久奴役,因而在人民权利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民的各项权利都将被剥夺。不论阶级民主的宣传口号如何变化,“议会制”“普选制”等制度被如何吹嘘,西式民主被如何强制普及,其目的都是借用民主的外衣掩盖追求利益的实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的重组进一步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赢者通吃的现象由于资本的高效流通更加普遍,贫富差距加大不

仅出现在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群体间的剥夺感也因收入差距的增大而增强。不论是左翼反对“富者益富”的力量,还是右翼将经济全球化和外来者视为进入“下沉年代”的根源,二者的共识都是对主流政治力量的不满、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对,并且都有将此诉诸民意的倾向。因此,民选政府基于对胜选需求的考量,将安抚选民情绪作为施政的首要因素,看似健全合理的民主运行机制难以以理性、有效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引致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有效性和长期性难以保证,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支持率下降,政治冷漠使得“民主制度下发生的灾难,可能转变为民主的危机”的可能性增加^[7]^[10],西式民主逐渐走向衰败。

(二)民主失效

制度的有效性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制度形式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也必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互作用、互为表里。因此,民主要运转起来,首先要有有效的国家治理和有利的国家能力,而治理效能一方面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另一方面取决于领导力量的合法性和领导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要素重新布局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推动财产权转化为政治权的意愿更加强烈,表演型政客在资本的运作支持下通过政治营销的手段赢得政治权利,胜选的政治家则受资本的控制,无意也无能力实现善治。而选民对选举本身的兴趣下降,对良政善治的期望不高,转而期望制度的短期补偿。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足,制度运行的持续性会大打折扣,“好的制度有助于形成良好治理,从而有助于民主的巩固,而存在‘弊端’的制度极易导致民主崩溃”的风险不断显现^[9]。

由于资产阶级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分殊,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和普遍改善,出于巩固社会结构的需要,资产阶级一方面诱导民众接受“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的评判标准,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和标签化,促使“宁要民主的草、不要非民主的苗”的极端标准压倒一切关于政治改革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强行普及“竞争性选举”,以选举权置换人民主权,用左手换右手的方式维护那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

少数人享受的民主”^[81]。因此,西式民主与良政善治间的关联变得脆弱,“以善治成绩论证西式民主的根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固”^[9],西式民主难以再为经济增长提供指导和保障。

西式民主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过程中,一方面以自己的先发优势或采用胁迫手段或扶持反对派力量推进所谓民主变革,导致很多国家打破了原本脆弱的政治平衡从而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向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对于当地社会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程度。西式民主赖以自豪的社会整合功能由于党派政治的裹挟,使得政治与治理陷入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其促进发展的功能广受质疑,维护社会和谐的功能也被进一步削弱。因此,西式民主于“民主国家”而言,其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逐渐失效;于后发国家而言,其“民主灯塔”的功能受到普遍质疑。

(三)民主异化

从民主概念的起源看,希腊语“民主”(Demokratia)的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如今,对于民主的理解,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统治是基于全体(或多数)人民的意志或同意,并且是为了公共利益或共同福利进行的”^[10],也就是人民主权或者人民当家作主。但经由约瑟夫·熊彼特等人的改造,人民主权变为竞争性选举,程序正义被重点强调,而单纯追求选举正当性成了民主异化的根源。

一方面,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将“多数人的统治”演变为“代表多数人进行统治”。其建立的整套政治架构,从本质上剥夺了人民直接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使得“公民权完全是一种远离政治参与的、消极的、被动的抽象公民权”^[11]。代议制民主“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式^[12]^[36],使得人民主权被政治人物间进行选择的形式民主所代替,那些“为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主张经济民主等言论反被视为将导致极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反民主’”^[11]。社会进步力量和弱势群体的要求和诉求被忽视,民主的异化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西式民主对选举程序正当性的过度

追求更容易被政治精英所利用。政治精英的意志经由选举程序而获得正当性,大大降低了胜选后作为统治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尤其是通过对民主权威适用范围的限制和对“民主”意识形态化的运作,束缚了对政治改革的有益探讨。在这种机制的保护下,政治精英更容易形成同盟,“选举把人民大众的作用局限于几年一次的‘选主’,将政治变为少数人的游戏”^[12],西式民主的择优功能被抛弃,民众参与决策的机会被限制。在西方主流的价值序列中,平等往往居自由之后。因此,西式民主把“不平等地行使自由权利成为一种不可改变,也不应被改变的事实”^[9]。而对平等的追求往往被与侵害自由联系在一起,以致于人民主权论的反对者明知其宪法和制度有不公正、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弊端,却依然专注于制造人们对于“民主专制”“民意冲击”“多数人暴政”等伪问题的恐惧,将民主“设计成了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机器”^[13],使得西方语境中对民主的探讨被限定在“市场专治”的基础上,用驯化灌输的方式把民主推向受限或反对的方向上。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

西式民主过去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其最大限度地带来了‘可行的民主’,也不在于其发挥出了民主制度的最佳治理绩效”^[9],而是在于其强大的硬实力支撑,尤其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霸权,诱导人们将民主等同于西式民主,将民主问题的探讨局限于如何使一国政体尽快实现西方化。尽管西式民主陷入“治理衰败”和“民主衰退”的双重困境,但由于对民主问题的单向度思考,无论是民主内涵、民主形态,抑或是民主实现路径的探讨,都囿于西式民主的框架,很难探寻西式民主之外的民主建构。

中国沿着非西方化的道路在探索中重塑了民主制度与良政善治的关系,特别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为走出西式民主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现形式上,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设计,实现了授权民主和行权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

取向上,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通过国家意志和人民主权相统一、良政善治和人民诉求相统一、自我调适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实现了对西式“选主”的超越。

(一)实现形式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本位的实现形式实现了对西式形式民主的超越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环节的全链条。把民主票决政府首脑和政治代表的选举民主引入公共治理的各方面,实现了全方位民主。以人民为整体,通过制度设计打破资本逻辑根据市场地位确定社会地位的运行规则,实现民主参与的全覆盖。

1.授权民主和行权民主相统一。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后,人民主权、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等权利的形成和分配原则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典型特征,而能够有效解决在广袤国土上的民主追求的代议制民主成为“现代的伟大发现”。代议制民主的实行,将原本的人民统治变为人民代表的统治。从本质上讲就有了“一旦代表不能代表人民,甚至是只代表自己或者某个集团的利益,那民主就会被悬置,最终脱离其本意”的风险^[4]。代议制民主作为西式民主的同义词,体现的是一种“单过程的选民主”,其将选民作为民主主体,目的是使“政治家通过争夺选民的选票而获得决策”,成为政府正当性和权力合法性的来源^[5]。

西式民主以聚焦“选择”和“竞争”的方式体现其制度设计的“主权在民”,但无论是对统治者的选举还是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单纯的竞争机制剥夺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机会,不仅抑制了大众的自主决定权,其“择优”功能的退化也成了西式民主难以摆脱的困境。西式民主看似以制度的方式规避了政治统治权“被世袭于特定家族的血缘谱系树上的状况,使政治统治权力不是通过出生而是通过被赋予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地位的人民的‘同意’或‘授权’的方式而获得”^[6],却制造了私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分殊,埋下了政治精英操作选举的祸根。相较西式民

主以竞争性选举获得民主的合法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完备的制度体系实现了多种民主形式的有机统一,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相互补充中保证“权为民所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整体意志和国家机关高效运转的有机统一,保证“权为民所用”,不仅有效避免了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利益集团和政党间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还避免了资产阶级代议机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本位,既体现在国家权力的运行过程中,也体现在人民对政治生活广泛参与的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主体的民主制度体系,不仅保证人民决定政府的正当性,同时也保证人民行使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进而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推进民主与善治的协同共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政务公开、网络问政、信访等途径表达利益诉求,通过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了对西式民主下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超越^{[7]530},体现了授权和行权在民主过程中的有机统一。

2.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西方代议制民主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将政权获取和利益博弈限制在一定的框架和程序中,强调“国家制度的创立与政府决策的出台,都要求在程序上满足某种普遍的标准,这种普遍标准就是让人们在目的、利益冲突的时候,赞同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具有合法性”^[8]。其弊端是忽略了生活方式差异化、价值诉求个性化对程序民主工具性和价值性平衡的影响。西式民主对程序民主的过度追求不仅容易导致程序霸权,同时将对民主的探讨限制在了程序正当性的框架内,使得程序正当性凌驾于价值正当性之上。这不仅造成了西式民主的现实困境,更异化了人民统治的本质含义。国家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任何民主程序的设计都受

制于阶级利益,民主制度的运行也必然需要协调各方利益。然而,西式民主试图用程序民主掩盖阶级对立和利益分立的社会实际,协调不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价值诉求。一方面,西式民主把人民的民主权利限制在“人民有接受或者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124]15},把广大民众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将民主改造成了精英民主。另一方面,民主被迫进行程序化改造,民主被限定在维护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保持在资本家能接受的范围内。基于西式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制定民主程序时必然要在“以人为本”和“以资为本”的选择中有所偏向,尤其是在长时间的造势、备选、竞选过程中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使得当选者沦为资本的代理人。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重视程序民主,更重视实质民主,始终将满足人民的需要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制定具体的制度、规则和方法保证了人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实践,通过党的领导明确了民主实质,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兼顾民主和效率。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广泛的民主参与制度实现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实现了对西式民主将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竞争民主的超越。

3.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相统一。现代西方民主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123]59}。因此,“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界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价值从民主当中剥离出去,通过程序民主的转向逐渐形成了程序民主的共识”^[18]。西方理论家认为,“程序民主更为简明,在研究中具有可操作化的优势”^[18],谁来当家、怎么样当家的的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选举来解决。所以,民主程序的优化和完善,特别是选区的划定、选民的登记、计票的规则等成为西式民主关注和发展的重点。

西式民主看重选举权利,把竞争性选举作为衡量民主的标准,将权力制衡视为制度制定的原则。因此,在制度的设计中,对治理效能的追求并不处于优先地位,反而强调对程序正当性的设计。这就容易使得利益集团打着过程正义的幌子蚕食人民整体利

益,民主程序蜕化为“贿选过程代名词”,民主程序与民主结果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民主程序或过程民主对权力起到限制作用成为一种幻想。相较于西式民主单纯强调民主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把“选举和票决民主只是整个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不具有相对于其他民主形式的绝对优先级,更不独立于完整的民主过程之外”^[19]。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设计和人民参与实践中更强调广泛性、真实性,使民主回归解决人民问题的本质。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民主环节全链条、民主领域全方位、民主参与全覆盖涵盖了民主运行的全过程,体现了形式与实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尤其在政治平等性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制度设计和目标追求从根本上建立在最广大人民对制度的认同和对政治的参与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式民主精英化的超越。相较于西式民主以过程民主掩盖结果不民主的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做到“汇集意见,抓住主要矛盾,体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人民意见多样化的有机统一,维护社会团结,并在此基础上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19]。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鲜明的人民价值取向和强有力的社会整合能力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充分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的有机统一。

(二)价值取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实现了对西方“选主”民主的超越

代议制民主作为“防止特殊利益的博弈陷入混乱状态,规范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统治权的获取,需要设计严密的程序规则将代表与民主联结起来”出场有其历史必然性^[11],但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联姻中,代议制民主被改造为选举民主,最终将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简化为“人民选择统治者”的选举权利,民主的本质走向“选主”的异化。尤其是资产阶级基于维护私有财产的需要,通过对民主的程序化改造,实现用“合法”手段保护“产权规定、市场规律、资本规则”的目的。因此,选民在政治竞争中仅扮演接受或拒绝某一政治团体提供的政治产品的角色。在赢者通吃的环境中,政治团

体一方面为赢得选举开“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将多元的政治文化群体分割为利益群体,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20],在既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又充分保障人民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实现国家意志和人民主权的统一,在既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又参与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管理中实现良政善治和人民诉求的统一,在既充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又积极听取民声、回应民意中实现自我调适和人民利益的统一。

1.国家意志和人民主权相统一。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解决由谁当家、怎么当家的问题。多数原则解决了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却因存在“多数人暴政”的危险而被广泛批评。因此,现代西方的制度设计以权力制衡为原则,通过三权分立等方式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以期实现所谓的“人民主权”。但西方民主制度因过分强调程序民主而走上异化之路。一方面,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为资本开路,通过政客的竞选承诺强行输出有利于其利益的理念,普通人的投票权利被限制在接受与否的框架内,所谓的人民权利或公共利益被忽视甚至剥夺。另一方面,西式民主将主权在民简单化为选举民主或者授权民主,只重视选举过程不重视权力行使的过程,极易形成“帝王式总统”的现象。总统被投票授权,当选后权力却无法得到约束,行权过程与群众意志不相符时,国会和司法机构无法对其权力形成监督和制约,国家意志和人民主权走向分裂。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民主权的统一。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执政理念上强调全体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回应人民需求、保障人民整体利益实现政党意志和人民意愿的统一;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意见、凝聚共识,实现个人诉求和人民整体意愿的统一;“以改革创新

精神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切实尊重党员主体地位”^[21],通过党内民主推动决策民主和执行高效的统一。其次,我国的权力机关通过民主选举行使国家权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互为补充,提高决策质量和执行效果。最后,通过建立民主参与制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实现了民意表达的扁平化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实效化。

2.良政善治和人民诉求相统一。西式民主将竞争性选举作为解决民主本源问题的根本方法,认为民主程序的正当性能够保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对应资源的支配权,所以胜选成为西式民主的第一考量,这就导致了表演型政治精英的产生,造就了“自愿被收买”的选民。在精英和大众强弱对比的关系格局中,政治精英与利益团体的联合使得大众的诉求被塑造为一种“反民主”的抗议,使得民众要么放弃政治参与,要么投机于对制度短期补偿的要求,竞争性选举治事政策的择优功能变得不再重要,民主与善治的关系因“选主”的设计发生割裂。竞争性选举的核心就是竞争,表现在执行层面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但反对的原因并非根据治理结果的好坏或施政水平的高低,而是服务于受资本控制、被少数精英把控的“权力游戏”。这种致力于保障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利益的制度设计“顺理成章地鼓励少数权贵无视大众的治理要求”^[4],遂人民诉求和良政善治彼此疏离成为西式民主陷入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

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制度设计上完成了“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8]699},避免了资本裹挟政治、精英控制选举的发生,使得人民不仅成为国家的主人,更可以通过国家表达自身意愿,提升生活福祉;全过程人民民主把选举民主仅作为整个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通过对民主形式的丰富和参与渠道的畅通,实现对西式民主把民主“狭隘地理解为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自治需求和治理需要之间的零和博弈”的超越^[4]。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国家视为保障人民权益、提升民主水平的主体,在制度体系的设计上不仅提供广泛的民主参与平台,更用协商民主的优势凝聚社会共识,形成人

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完整的制度设计,将被西式民主限制在政治层面的民主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覆盖基层事务管理的各领域,通过选人做事解决人民需要的目标设定,在社会各层面和各领域广泛推进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得“人民既是人民民主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政治资源,也是治理效能福利的共享者”^[22],真正做到良政善治和人民诉求的统一。

3.自我调适和人民利益相统一。作为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西式民主从本质上讲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因此,西式民主的程序设计无不体现着服务资产阶级利益的取向。无论是把民主简化为竞争性选举还是对程序民主的情有独钟,西式民主通过对“民主”的垄断和话语霸权,使“民主成为有钱人的民主、资本家的民主”^[14],因而出现了“资本主义似乎总是倾向于约束民主,而很少出现相反的情形”^[4]。民主与资本的“绑定”,必然使得民主朝着市场化方向进行转变,资本主义发展的优先级也必然高于对公共意志的关注。所以,被竞争性选举改造的民主陷于政治精英的内部循环,其自我更新、自我调适的动力不足,公众意志和人民利益被忽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不被认为是对民主的威胁,反而是表达民主的核心与稳定的源泉”^[11]。

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民主模式,也不寻求对民主模式的终结。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17530]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23]的变与不变中体现人民利益与自我调适的有机统一,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作为制度设计的目标^[17530],在民主实现的路径和方式上始终保持发展、改革、多样化的眼光,通过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自我革新推动民主与善治的良性互动,从而不断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人民的诉求联系起来,推动形成人民民主打开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钥匙。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千百年的不懈追求,凝结着全人类共同价值。但其发展却因“西方民主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基础、已然成型的国际秩序以及潜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优势”^[4]而陷入“民主化=西方化”的迷思,对民主的定义、解释甚至探讨范围都被限定在西式民主的框架内,人类社会对民主问题的探讨被西式民主所“终结”。而资本主义民主化的三次浪潮“已经发生过两次民主的回潮,时至今日也暴露出多重危机,已引发了新一波的质疑”^[24]。因此,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向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积极回应人民对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更高要求,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通过党的百年民主实践经验的总结,结合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这一内容进行充实和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充分体现和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创造了一种超越西式民主的“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新型民主形态,丰富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类型。

(一)保证了人民主体地位

民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换言之,就是国家权力由谁掌控、由谁行使的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民主形式,从经济基础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实现了人民对国家权力真实有效的掌控。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形成了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在内的各领域、各阶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2575]。相较于其他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权力的掌控和行使上更加真实和广泛。

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导向。在国家权力的行使上,既强调民主

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又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人民主体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保障“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5],实现了民主领域的全方位;通过政务公开、信访、问政等途径畅通民主参与渠道,实现了民主参与的全覆盖;通过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表达人民意愿,实现了民主环节的全链条。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从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实现了“国家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是人民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工具”的复归^[64],保证了人民主体地位。

(二)丰富了民主类型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本质上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奠基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的民主实现方式,应该由该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基础所决定。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在继承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一方面,不迷信“包治百病”的单一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的耦合互动,既支持和保障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利,又以协商民主为有力补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另一方面,强调人民对政治参与的具体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保障人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的全链条参与体现民主权利,以政党协商、统一战线、基层自治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各阶层诉求、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将民主的覆盖范围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全领域和各方面。

相较于其他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从形式和程序上保障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又以制度化的方式从内容和实质上保证人民政治参与的权力。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程序和实质、过程和结果、直接和间接的有机统一,以民主制度、民主形式和民主过程的重大创新建构起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丰富

了民主发展的类型。

(三)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打破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形态,却因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使得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明形态不可避免地落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框架中。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虚伪性因阶级压迫和阶级专政的存在而不断显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标榜的主权在民原则成为空谈,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一道陷入发展困境,人类社会对政治文明的探索迫切需要进入新的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走上了人民民主的民主新路。”^[14]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民主实践的不懈追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政治文明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人民民主的跨越。经过不懈的探索实践,我们不断“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5]。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得人民民主得以全面发展,中国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宽,人民的主体地位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要求中充分彰显。在民主的价值取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实现了对西方“选主”民主的超越;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主权在民的实现形式实现了对西式形式民主的超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支撑,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跨越,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良性互动中,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林尚立.论人民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1.
- [3]漆程成,刘小溪.对西方民主困境的再思考[J].国际

- 政治研究,2016(1).
- [4]林毅.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J].探索笔会,2022(2).
- [5]桑玉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的危机[M].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8]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林毅.对“民主失效”与“反对民主”问题的辨析——针对“民主发展=西方化”命题的两个反思维度[J].政治学研究,2022(2).
- [10]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
- [11]陈晓斌,刘同舫.西方现代民主的政治逻辑和理论困境——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考察[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6).
- [1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3]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5.
- [14]佟德志.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2).
- [15]王宗礼.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16]徐俊忠.“人民主体地位”再强调的深远意义[N].光明日报,2016-04-16(1).
- [17]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8]佟德志.当代西方案程序民主的困境与悖论[J].国际政治研究,2016(2).
- [19]韩笑鹏,黄毅.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22(2).
- [20]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2(5).
- [21]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
- [22]张贤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之道[N].光明日报,2021-09-11(7).
-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
- [24][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13.
-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刘菊香

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农工民主政党自觉及经验研究

陈红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咸宁 437000)

摘要: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大气磅礴、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是中华儿女的孜孜追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农工民主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始终保持高度政党自觉,作出了应有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伊始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在抗日战争时期自觉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并在解放战争时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自觉加强政党自身建设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农工民主党始终保持政党自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启示:始终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坚定政党自觉的根本和保障;始终以弘扬政党优良传统作为激励政党自觉的精神源泉;始终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保持政党自觉的内驱动力。

关键词:中国农工民主党;政党自觉;现代化;经验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8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65-08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工民主政党自觉实践及特征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化是指中国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起步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初使命。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其中便有包括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奋斗身影。

(一)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伊始自觉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

收稿日期:2023-09-15

基金项目:2020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0Y173);2020年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鄂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20XZ17);

作者简介:陈红,女,湖北科技学院讲师,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七届中央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

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1],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主张“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同时强调其根本政治目标是“实行社会革命”^[2]。在凄风苦雨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首要历史使命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迅速将国民大革命推至高潮。然而随着国民党阵营内部分化加剧,革命形势于1927年春逆转直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使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彻底破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1930年5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海外秘密回到上海创建新党。同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一致通过《我们的信条》和由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指明临委会的任务是“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实现社会主义”^[3]。这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之后,临委会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力图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平民政权。由于邓演达被害殉难和反蒋革命斗争失利,临委会遭受严重挫折,但同志们仍坚守建党政治纲领并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临委会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建党及建党伊始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所进行的一系列反蒋反帝革命活动,均表明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主动地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事业。这体现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建党伊始就具备高度的政党自觉。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道路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农工民主党因建党初期创始人殉难及反蒋革命斗争失利致其革命事业一度跌入低谷,但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志仍坚持革命信念与初心,怀揣本党建党初心继续探索革命成功

的道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一贯体现出来的先进性、革命性以及斗争精神、斗争策略使中国农工民主党深受鼓舞,看到了革命新的希望,也增强了革命取得胜利的信心。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建党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历经血与火的残酷淬炼、付出巨大牺牲代价后,逐步认识到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均有过融洽合作。如此历史机缘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更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了重要历史铺垫。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夏,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但也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黄琪翔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在中国农工民主党正处于低谷之时,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新的革命希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志们的革命斗志,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一致主张并决定重振组织。中国农工民主党坚定地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形成革命的合力以壮大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本党的民主革命事业继续推进和发展,才能实现建党伊始所提出的政治纲领。三个月后,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这次会议一致同意以邓演达建党时的纲领为基本纲领,并根据新的历史任务作适当修改,重点突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会议确定“抗日、联共、反蒋”总方针,决定以推动抗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选出了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经此组织整顿后,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投身全面抗战。这标志着中国农工民主党伴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自觉在认知层面实现了一次重大飞跃,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中国革命走

向胜利。

自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革命道路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革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1930年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建党到1935年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从提出“解放中华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到确定“抗日、联共、反蒋”总方针,从独自奋斗到与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五年来的革命历程,无不体现其一贯自觉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事业,自觉地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革命道路,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高度的政党自觉。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坚决反对国民党妄图在美国支持下为维持一党专政而发动内战的方针。毛泽东携中共代表团亲赴重庆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与国民党谈判,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但是,国民党却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对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进行监视、恐吓、逮捕和绑架,各民主党派处境日艰并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秘密转移到香港活动,并鼓舞他们彻底清除中间路线思想,放弃第三条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更加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们绝大多数人自觉主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1948年,毛泽东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以口号的方式表达中共召开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同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通过陕北新华社正式广播。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

“五一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同年6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严信民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监委会上表示:民主党派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要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当前施政的最高原则;要承认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唯一的国家军队^[6]。中国农工民主党完全赞同并宣传这些原则。1948年6月1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对时局宣言》中号召爱国同胞要为人民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宣传“五一口号”,纷纷发表文章,召开讨论会,举行座谈会,围绕召开新政协问题贡献意见、研究办法,形成了一个广泛深入的“新政协运动”。新政协筹备会的组织及筹备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中的亲密合作。

1948年秋至1949年3月,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彭泽民、丘哲、严信民、韩兆鹗先后到达解放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国农工民主党20位党员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直接参加了筹备成立新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章伯钧、郭冠杰分别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参与筹备成立新中国等,这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工民主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高度的政党自觉。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工民主政党自觉实践及特征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初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首要条件。毋庸置疑,1840—1949年的抗争史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奠定了重要历史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拉开了序幕。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不断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一如既往以高度的政党自觉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竭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动扛起自身责任担当,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勇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工民主党遵循《共同纲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服务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家中心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9]同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出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热忱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9]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将重点工作转移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中国共产党同心携手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后,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改革开放事业作贡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方向性指引和制度性保障。中国农工民主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扣推进“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两条工作主线,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扎实履行职能,开创工作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工民主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拓展、深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一以贯之地自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并作出应有贡献。

(二)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好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更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8],”中国共产党在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自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追求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构想的‘东方式’形态的新尝试”^[10]。中国式现代化前无古人,没有可供遵循的模板和样板,是全新的探索和巨大的考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既需要建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也需要通过政治建设统领执政党自身建设和长期执政建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保障、塑造发展核心、创造发展动能^[11]。同时,对参政党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参政党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指出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2018年2月6日,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制度以及各项议事决策制度,增进班子成员团结,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强调新时代的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12]。2018年3月,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指出,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13]。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支持参政党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是提升政党政治实践能力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中国农工民主党自创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自身建设,1930年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就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工作大纲》,1935年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又重振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农工民主党强烈地认识到,“为着完成新的政治任务,本党必须而且必然的发生质的变化,这一变化一定是要通过自我教育及阶级觉悟的提高”^[13]。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作出继续进行全国党务整理的决定。1950年12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会议通过《为健全组织加强团结而奋斗》决议,各地党务整理工作至1951年秋季基本结束,组织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明确发展组织必须与巩固组织相结合。中国农工民主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应根据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有重点地向医药卫生界发展组织,加大对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团结。根据形势发展的新要求,2000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制定了《组织发展工作规程》《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在组织工作中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注意质量,把握速度,在吸收高层次、代表性人士方面取得新进展,实现组织工作的平稳有序发展。新时代,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中国共产党为师,对标参政党建设要求,采取有效举措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政治交接,弘扬优良传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新型政党关系的维护者。中国农工民主党不断提升参政议政能力,通过优化创新参政议政载体和开辟新的更有效的参政议政渠道等方式提升参政议政效能,通过创新组织活动载体、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永葆组织特色、健全组织制度、强化成员素质、推进机关建设等途径,全方位统筹协调推动组织可持续发展。坚守合作共事的政治共识、树立合作共事的良好形象、争取合作共事的实际效果,不断提升合作共事能力。进一步增强提升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全面提升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更好地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

三、中国农工民主党始终保持政党自觉的启示

(一)始终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坚定政党自觉的根本和保障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理论创新,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新境界。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和彰显政党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奋进、砥砺前行、建功立业,建党一百多年来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新成就。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6]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快步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毋庸置疑,在未来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同样能以卓越的政治定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实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自觉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既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优良历史传统,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宝贵历史经验。70多年前,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新时代,中国农工民主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必须在政治上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

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14]。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5]毫无疑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农工民主党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跟中国共产党走。

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参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政党自觉的根本立足点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政党自觉才能真正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赓续自身优良传统,才能在政党实践中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才能彰显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时代价值和时代风貌。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坚持政党自觉的重要保障,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工民主党政党自觉才不会丧失方向和目标,才能真正得以践行并延续传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坚定政党自觉的根本和保障。

(二)始终以弘扬政党优良传统作为激励政党自觉的精神源泉

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纵观中国农工民主党90余载光辉历程,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一个极其重视行动的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所发起的一系列重大活动、开展的一系列履职工作,都与“行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6]。中国农工民主党之所以在90余载光辉历程中始终能保持高度政党自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自身始终蕴藏着源源不竭的精神源泉。这个精神源泉源于中国农工民主党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是农工党优良传统的重要承载者。邓演达从创建农工党伊始到其革命生涯的最后阶段,始终主张:“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17]中国农

工民主党建党、策动和参与反帝反蒋斗争、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自觉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道路,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协商筹建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政治实践,无一不彰显和赓续着中国农工民主党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

正因具备这样的优良传统,中国农工民主党1935年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在思想上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飞跃。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农工民主党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明确宣告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要团结全党同志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自我改造。1979年,中国农工民主党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入新时代,中国农工民主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章程并确立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22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七大要求全体党员要坚定不移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密围绕中共二十大战略部署,落实本党十七大工作部署,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基础,持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牢记国之大者、心系民之关切,扎实履职尽责,奋力谱写本党参政报国、履职为民的新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农工民主党以高度的政党自觉不断推进政治实践,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发展成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参政党。在中国农工民主党政治实践中,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始终激励其以高度的政党自觉投身中国现代化历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爱国、革命、奉献优良传统是激励中国农工民主党政

党自觉的精神源泉,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农工民主党应继续弘扬这一优良传统。

(三)始终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保持政党自觉的内驱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国农工民主党创立时就提出了“解放中华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目标。其在创党初期的革命活动中屡遭挫折与失败,但在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中逐渐认识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35年中国农工民主党正式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革命道路,参与和见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其“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理想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得以实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农工民主党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于1948年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推进中国革命贡献力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建立平民政权”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成功实现。此后,中国农工民主党继续服务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社会主义改造,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确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艰辛探索中经受曲折考验,中国农工民主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持续作出努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参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同心、砥砺前行。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农工民主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辉煌。

90多年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长期政治实践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政党自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与全国各族人民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新时代,中国农工民主党在致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应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保持高度政党自觉的内驱动力。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1.
-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5.
- [3]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超文集新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214.
-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6.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3-284.
- [6]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九十年(内部资料)[M].[出版地不详],2020:91.
- [7]尹勇.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
- [10]王梦可.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J].毛泽东研究,2023(2).
- [11]唐亚林.“过上好日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J].江苏社会科学,2022(5).
- [12]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N].人民日报,2018-02-07(1).
- [13]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

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五辑[M].[出版地不详],1981:38.

- [1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6-01(1).
- [15]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
- [16]杜黎明.农工党“行动理念”初探(一)[J].前进论坛,2019(5).
- [17]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超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38.

责任编辑:刘菊香

铜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二

覃彩銮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28)

摘要:壮族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中原地区鼓乐文化、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传入广西,对铜鼓铸造业产生重要影响,加快了铜鼓铸造本地化进程。壮族先民铸造的铜鼓,既保持着地方民族的特色,又借鉴和融入了中原青铜铸造工艺和花纹装饰,使之成为壮汉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体,是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铜鼓铸造;中原文化;历史见证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09

[中图分类号]G03;K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73-07

铜鼓,因以铜铸造而得名。其高大的形体、庄重的造型、洪亮的音质、精美的纹饰、精湛的工艺和多重功能,集权力、神性与乐器于一身,成为广西壮族及其先民独具特色的一种青铜器,是广西壮族及其先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综合体现,也是广西壮族先民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因铜鼓与中原的铜鼎属性基本相同,都是权力的象征,故有“北鼎南鼓”之说。壮族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早在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壮族先民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鼓,并穿越历史时空,随着瓯骆人的不断发展,世代传承下来,至今仍在壮族民间流行使用,被称为“活着的铜鼓”。一方面,正是壮族及其先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塑就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和独具风韵的铜鼓文化,丰富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青铜文化宝库。另一方面,铜鼓作为壮族古代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载体,从起源、铸造工艺、鼓体造型到纹饰图案都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吸收、融入了诸多中原文化元素,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和历史见证。通过对壮族及其先民铜鼓文化中的独特性及所包含的中原文化元素进行甄别与剖析,可以增进人们从整体上对广西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关系及其文化交流互鉴历史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关于“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

收稿日期:2023-08-20

作者简介:覃彩銮,男,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

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等重要论述的理解^①,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

一、铜鼓: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

铜鼓是我国西南地区别具特色的一种青铜器,在我国丰富纷呈的青铜文化中风韵独具、光耀闪烁。我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最多的国家,广西和云南则是我国发现铜鼓最多的地区,在海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也有发现。随着民族的迁移和文化交流,铜鼓还传入东南亚地区,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根据2015年开展的全国铜鼓专项调查统计,我国馆藏的铜鼓有1676面,民间收藏的铜鼓有1500多面。其中,广西出土、收藏铜鼓最多,馆藏的各类铜鼓达500多面,民间收藏的铜鼓仅河池市所辖各县就有1417面,其中东兰县538面,是收藏铜鼓数量最多且流行使用最多的县,被命名为“铜鼓之乡”。如果说,在云南发现年代最早的春秋时期的万家坝型铜鼓,那么广西则是发现铜鼓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类型最全(即铜鼓分类中的八大类型都有发现)的地区。

壮族及其先民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出土的铜鼓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类型齐全。1994年田东县林逢镇和同村大坡岭战国墓葬发现两面万家坝型铜鼓(因最早发现于云南楚雄万家坝而命名),是目前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鼓,而后相继在百色、贵港、桂林、贺州等地发现石寨山型铜鼓(因最早发现于云南省晋宁区石寨山战国墓而命名)。1955年北流县(今北流市)发现云雷纹大铜鼓,鼓身高67.5厘米,鼓面直径165厘米,重达300公斤,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铜鼓,故被誉为“铜鼓之王”,被命名为“北流型铜鼓”。1987年灵山县旧州镇长基行政村尚坪村出土一面鼓面饰有蹲蛙立体造型的铜鼓,被命名为“灵山型铜鼓”。1972年在广西藤县蒙江横村冷水冲出土一面鼓面

四周铸有蹲蛙、骑士及鸟兽立体造型的铜鼓,被命名为“冷水冲型铜鼓”^①。从铜鼓造型和纹饰特征判定,广西出土的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应是从云南传入,而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形制和纹饰特征与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明显不同,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都是鼓面小于鼓身,颈胸外弧度大于鼓面;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身多饰羽人划舟、羽人舞蹈花纹图案;而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都是鼓面大于鼓身,鼓面边沿多饰有蹲蛙、牛、骑士等立体形象,其中以北流型铜鼓年代最早,约为战国至秦汉时期;而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的年代约为汉代至隋唐时期。可以肯定,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应是世代居住在广西的瓯骆工匠所铸造。宋元至明清时期,壮族民间相继铸造和使用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铜鼓。特别是红水河流域上游的东兰、天峨、南丹等县民间,因流行“蚂蚱节”活动,几乎每个壮族村寨乃至每个宗族都保存有由雌鼓雄鼓组合的铜鼓。当地壮族以拥有铜鼓为荣,凡节庆、祭祀、集会、喜庆之事必敲击铜鼓伴奏歌舞。春节期间村与村之间还举行赛铜鼓、跳铜鼓舞活动,雄浑洪亮、震撼人心的鼓声伴随着人们的歌声舞蹈和欢笑声,在山谷田峒间回荡,成为壮乡一道别具特色的文化图景。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铜鼓铸造技术失传,铜鼓存量日趋减少。铜鼓属大型空腔类器物,鼓壁薄且均匀,铸造工艺复杂,对音色的要求极高。因此,铸铜鼓之形易,敲出的音色要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则难。直至20世纪90年代,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韦氏兄弟经过多年探索与反复实验,终于掌握了铜鼓铸造工艺技术,成功铸造出形音兼具、获得当地老鼓手和群众认可的铜鼓,失传的铜鼓铸造技术得以重拾和延续。在铸造过程中,韦氏兄弟还融入现代科技和文化元素,实现了铜鼓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尔后,东兰

^①按照考古文化类型标准器出土地命名的原则,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此后凡发现与其文化形态相同或相似的遗址或文物,皆以最早出土地命名之。另外,我国铜鼓学界按照铜鼓的不同形制和花纹,将我国各地发现的铜鼓分为八个类型,即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等。其中的北流型(北流市)、灵山型(灵山县)和冷水冲型(藤县)铜鼓,因最早发现于广西,故以其发现地作为标准器命名。

民间工匠也掌握了铜鼓铸造技术,开始铸造铜鼓,使得民间铜鼓的拥有量与日俱增,实现了铜鼓文化的复兴和光大。壮族铜鼓文化还影响了广西的瑶、苗、彝等民族,丰富的广西铜鼓文化反映了广西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铜鼓已走出壮族山乡,进入城市的节庆活动,并且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文化节目,壮族铜鼓习俗亦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铜鼓图像也成为城市建筑装饰和雕塑的重要元素,营造出浓郁的铜鼓之乡的氛围,实现了铜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广西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特色文化的亮丽名片。

据研究,铜鼓由炊器的釜发展演变而成。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社会生活和信仰观念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多重功能。一是乐器,即在节庆集会或祭祀活动敲击铜鼓伴奏歌舞,营造隆重、热烈气氛,激发歌舞者的热情,以敲击铜鼓为节拍,歌舞的节奏,呈现出抑扬顿挫、整齐划一、赏心悦目的效果。二是权力、社会地位、身份或财富的象征。历史上,铜鼓是青铜器中的重器,通常是部族中德高望重、富有权威的首领、王侯、将领或贵族才能拥有。正如《隋书·地理志》所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八五载:“俚僚贵铜鼓,以高大唯贵。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雄。”三是神性之器。铜鼓因具备响彻、浑宏之声,如同雷声,故被壮族及其先民赋予神秘的灵性,视之为沟通神灵之器,铜鼓面上所饰的太阳纹、蹲蛙、牛、鹭鸟等塑像,是壮族及其先民崇拜的对象,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铜鼓的神话故事,将铜鼓看作一种通神之器。在祭祀活动中,敲击铜鼓祈求天降雨水、风调雨顺、农业丰产。唐代许浑《送客南归有怀》中就有“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的诗句。四是敲击以集众或作为指挥军队作战的号令。

铜鼓主要由铜锡合金铸成,其制作含有诸多科技元素。铜鼓一般由鼓面、胸、腰、足、耳和立体饰像六个部分组成,形如圆墩,鼓胸曲腰,腹和底皆空,两旁附对称双耳,遍体饰纹,可谓集造型、雕塑、刻画铸

造、乐器、礼器、重器于一体,融科技、美学、物理、化学、几何、工匠精神和民族智慧于一炉,堪称精美的艺术作品和包含诸多科技元素的产品。瓯骆工匠大约在战国时期开始铸造铜鼓,随着铸造经验积累、技术提高和认知深化,瓯骆工匠从早期铸造的小型实芯器物的基础上,逐步掌握了铸造大型空腔类青铜器的工艺技术,开始了铜鼓的铸造。大型空腔类、圆形且侧面腰部呈曲线起伏、器壁厚度不足1厘米的青铜器,是青铜铸造中难度最大的一类器物,其铸造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实心体或小型空腔类器物。实验考古证明,铜鼓模与范的塑造及纹饰雕刻是关键。首先是选择质地纯净、黏性强的泥料,经过充分拌合增加黏性,先塑出鼓的内模,而后在内模外壁通体刻画布局有序、种类多样、线条细腻、构图完整的花纹图案,继而用泥料完全敷盖在内模上,以翻出范板。如此一来,内模通体上刻画的纹饰便翻印于范体内侧,然后将外范分割为二,使之与内模分离。接着要将内模(即范芯)外壁通体削去一层泥料,再套上外范,其间用支钉有序支隔,使内模与外范之间形成空隙,其空腔的间隔度便是铜鼓的鼓壁厚度。最后将合金的铜液从浇注孔注入空腔内,直至饱和。待铜液冷却后,揭去外范,捣碎内模,取出铜鼓,对浇铸过程中形成的毛刺、飞边等进行修整,再焊卯上另行铸造的立体装饰塑像和鼓耳,一件完整的铜鼓便宣告完成。耗费工匠们大量劳动和精心制作的模与范,铸造一面铜鼓后便废弃。若是继续再铸造一面铜鼓,需要重新制作模与范。所以,在出土的众多铜鼓中,没有两面完全相同的铜鼓,原因便在于此。在广西发现的许多铜鼓内壁,还发现有铲削的痕迹,专家分析认为,这应是工匠们为调节铜鼓音色留下的,说明先民们对铜鼓音色的重视。据铜鼓专家研究,铸造形体如此宏大、结构如此复杂的铜鼓,很可能采用的是从中原传入的失蜡铸造法。通过对铜鼓铸造工艺及过程的记述,便可知铜鼓铸造的复杂性及技术难度,其中还不包括铜锡矿的开采、冶炼、炼炉修筑与结构、鼓风设备、合金比例等。

从出土铜鼓的形制和纹饰看,铜鼓的铸造,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早期铸造的北流型铜鼓,形体虽大,但器壁厚重,纹饰简单,音色也较低沉。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铸造的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结构合理,造型美观,线条起伏有致,纹饰丰富,构图精美,地方特色鲜明,音质洪亮悠扬,标志着铜鼓铸造技术的成熟。铜鼓的铸造,工艺复杂,技术难度大,涉及铜锡矿的开采、冶炼、合金、铜鼓模范的塑造、装饰图案花纹的雕刻、合范、浇铸、修整调音、焊接(鼓面装饰塑像)等复杂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有精湛的技术和娴熟的工艺,还需要高效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壮族先民瓯骆工匠在学习和借鉴云南百濮工匠铸造的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造型的过程中,根据本民族的审美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在铜鼓造型、结构、花纹图案装饰等方面作了诸多改进,摄入了诸多本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了铜鼓铸造的创新,并且包含诸多科学原理,提高了铜鼓品质。秦汉至隋唐时期,壮族及其先民铸造的铜鼓,形体适中,装饰美观,纹饰精致,庄重大气。瓯骆工匠铸造时,将鼓面延伸至鼓身外,既可优化音质,又便于手持移动。其鼓胸束腰侈足,利于敲击时铜鼓音的共鸣与释放。鼓面边沿的立体装饰雕像,皆取材于其生活、信仰和崇拜物,如青蛙、牛、鸟、龟、骑士等,并且采用单独雕塑和铸造的方法,而后焊镶于鼓面周边,严密稳固,浑然一体,可谓匠心独具。更令人赞叹的是,当时尚未出现圆规类绘图工具,但工匠们铸造的铜鼓,无论是鼓面、鼓胸还是鼓底,线条圆润,规整对称,完全符合黄金律,反映了壮族及其先民高超、娴熟的铸造工艺和创造智慧。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上赞曰:“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2]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云:“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3]壮族及其先民铸造铜鼓造型之庄重,结构之精妙,纹饰之精致,由此可见一斑。

二、铜鼓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铜鼓是壮族及其先民的一种标识性青铜器,也是壮汉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壮汉民族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一方面,铜鼓作为一种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民俗、审美为一体的重器,无论是其起源还是文化内涵,都源于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积累,即铜鼓的造型来源于作为日常生活中用于炊煮的釜,铜鼓中心光芒四射的太阳纹、鼓面边沿的立体蹲、牛、鸟等图像,寓含着壮族先民对太阳、青蛙、牛、鹭鸟的崇拜,是工匠们对生活的观察、提炼和融入铜鼓文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壮族及其先民居住的广西,西面是青铜铸造业发展较早的云南,东北面与湖南毗邻,是青铜铸造业发达、青铜文化繁荣发展并南传广西的主要通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已通过湘桂走廊,传入瓯骆人居住的广西,催生了广西青铜铸造和青铜文化。秦和汉王朝统一岭南后,随着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带来了中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化的发展。壮族及其先民在铸造铜鼓过程中,既受到云南铜鼓文化的影响,更受到中原青铜铸造技术和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因而壮族及其先民铸造铜鼓的工艺和装饰花纹图案,学习、借鉴和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技术和文化元素,既促进了铜鼓铸造业的发展,又丰富了本民族铜鼓文化的内涵。中原青铜文化元素,主要反映在铜鼓的使用功能、铸造工艺、技术和装饰的花纹图案中。

(一)铜鼓功用蕴含的中原文化元素

壮族及其先民铸造和使用的铜鼓,有其自身的起源和发展轨迹,即造型源于作为炊器的釜。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用作炊煮的圜底、鼓腹、侈口的陶釜已经出现。将釜倒置,便是铜鼓的早期类型——万家坝型铜鼓。铜鼓出现后,随着社会发展,铜鼓被赋予多重社会功能,并且由最初的乐器演变成部族酋首权力、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其名称和用作礼乐器的功能,则受到中原礼乐文化的影响。

鼓作为一种传统打击乐器,历史久远。鼓的名

称、击鼓伴奏歌舞之俗,源于中原地区。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鼓”字,属会意字,左边是鼓的本字,右边是“支”,表示手持棒槌击鼓之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鼓,郭也。春分之音。”^[4]古文“郭”“廓”相通,有扩张、延伸与成长之意。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称:“鼓,廓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5]东汉应劭《风俗通义》释云:“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6]由此可知,“鼓”的名称和文字,在公元前 16 世纪的商代已经出现。

鼓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考证,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遇到喜庆之事会手舞足蹈、敲击石器助兴。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发明了烧制的陶器,出现了用陶土烧制成上圆、中鼓、空腹的“鼓”,用木棒或蕒草制成鼓槌敲打为乐,故《礼记·明堂位》有“土鼓,蕒桴苇草,伊耆氏之乐也”的记载^[7]。商周时期,土鼓开始用于皇家组织的祭祀与礼仪,《周礼》规定:“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8]21}这在祈求丰年和年终国祭蜡中,都用鼓舞娱媚神灵,并且还建立了专门管理鼓乐的机构和“鼓人”官职负责管理鼓制、击鼓等事,制定有一套鼓乐的制度。正如《周礼》所云:“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8]116}此后,鼓舞更加规范,用于各种祭祀、军事、劳作等活动,前期使用的土鼓演变为用陶土或原木制成鼓腔,蒙上兽皮鼓面,使得敲击的鼓声更加雄浑洪亮,标志着“革鼓”的出现。由于鼓声雄浑洪亮,响彻天际,震撼人心,故古人将鼓声与雷声类比,赋予神性,且击鼓求雨祈丰年习行成俗,《易·系辞》有“鼓之以雷霆”之说。可见,击鼓祭年求雨祈丰年、击鼓伴舞为乐,源于中原。南传广西后,为瓯骆人所借鉴和吸收,融入铜鼓功用之中,亦敲击铜鼓祭年求雨祈丰年、敲击铜鼓伴奏歌舞以为乐。

(二)铜鼓铸造工艺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中原华夏民族是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器的民族,公元前 10 世纪前的夏商时代已开始铸造青铜器,并且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初始阶段,首先

从铸造结构简单的实心体小型器物开始的。已出土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一阶段流行采用的是合模(范)铸造法,即使用一块对剖的石料,内中各凿刻出所铸器物的半边形体,留出浇注的小孔,然后将两范紧扣为一体,将合金的铜液从孔口注入范体内,直至饱和。待铜液冷却后,揭开石范,取出铸件。如果需要,可用此范继续再铸。广西武鸣区元龙坡战国墓葬里也出土有此类石范。另一种是泥模(范),即使用经过拌和的黏土制成铸范,形态和铸造方法与石范相同,一范可以多次使用,重复铸造。所以在出土的小型实心体青铜器中,常见有戈、矛、钺、剑、镞、镢、斧、铍、锛、凿、刀等小型兵器或生产工具,形制相同,均是使用此类模(范)反复铸造的结果。随着铸造经验的积累和铸造技术的提高,工匠们开始铸造空腔类器物,如生活用品、乐器乃至礼器,常见的有鼎、壶、鬲、甗、罍、尊、簠、斛、觥、盒等。此类空腔类器物通常采用内范外模浇注法进行铸造,这是铸造的发展与进步。大约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失蜡铸造法(也称“熔模法”),这是一种比青铜铸造更先进、更精密的一种铸造方法,即使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其他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经过加热烧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出模型,从而形成空的型腔,然后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便可铸成器物。失蜡铸造法是在外模内范铸造法基础上的创新,用蜡类取代了传统的模与范间的支钉,使铸件具有无模范之痕、饱满光洁、细致精密、玲珑剔透之特效,标志着青铜铸造工艺与技术的创新与巨大进步。铜鼓研究专家认为,铜鼓作为结构复杂的大型空腔类器物,很可能是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失蜡铸造法是中原工匠在长期的铸造过程中,经过不断实践与摸索的开创性新成果。这种创新性铸造法南传至广西后,瓯骆工匠学习并逐渐掌握了内模外范失蜡铸造法,应用和融入铜鼓铸造实践中,并根据本民族需要和审美观,以创新精神,巧妙地注入地方民族文化基因,铸造出一面面造型独特、结构严密、纹饰精美、内涵丰富、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铜鼓。事实证明,民族文化交流为民族

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璀璨风采。中原文化传入广西,对广西瓯骆及其后裔壮侗民族文化起着引领和促进作用。可贵的是,广西瓯骆及其后裔学习和借鉴中原地区的内模外范和失蜡法铸造工艺,用以铸造与云南万家坝、石寨山型铜鼓不同、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粤式”铜鼓,并获得成功,丰富和发展了我国铜鼓的新类型,形成了文化交流互鉴的硕果,堪称中原文化与瓯骆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例,也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典范。如果没有中原内模外范和失蜡铸造方法的传入、影响和借鉴,壮族先民可能难以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就铸造出形体如此庞大、结构如此严密、造型如此凝重、纹饰如此精美、风格如此独特的铜鼓,这是民族文化交流作用与魅力的生动诠释。

(三)铜鼓纹饰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开始在陶器上刻画或模印各种花纹图案作为装饰,既可增加器壁的皱褶度,便于手持不易滑落,又能增加陶器的美观感。到了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青铜铸造业的产生与发展,在青铜器特别是礼器上饰以形式多样、布局对称、纹饰繁缛、图案精美、寓意深刻的花纹图案,将花纹图案装饰发挥到了极致,实现了青铜器别致造型与精美纹饰的完美结合,使之成为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青铜文化的内涵,也增加了青铜器的灵性与魅力。青铜器纹饰作为一种视觉语汇,成为传递人们的信仰、风俗、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观等信息的艺术符号,通过这些艺术符号诠释社会文化内涵,揭示其艺术成就、特色与面貌。青铜器上装饰的花纹图案,多取材于大自然、信仰和社会生活,是工匠们艺术创造的结果,反映了人们的信仰、愿望、追求、审美和艺术成就。不同民族由于生活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方式、所处时代和审美观的不同,其艺术形式、花纹图案种类和装饰风格也不尽相同。在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不同地区和民族铸造的青铜器装饰花纹图案也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吸收

与交融。因此,纹饰的种类、装饰形式、方法及风格特征,往往成为辨别青铜器的铸造年代、民族和相互影响的重要依据。中原地区青铜器及其铸造工艺与技术的南传,不仅促进了广西瓯骆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而且将中原青铜器装饰的花纹吸收和融入铜鼓,形成中原青铜纹饰与地方民族特色纹饰的巧妙结合,使之成为广西瓯骆与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证。

1.太阳纹。全世界同在一片蓝天和太阳照耀下,太阳给大地带来光明与温暖,给万物带来生机,因而世界各地普遍崇拜太阳,中华各民族也流行太阳崇拜,并且流传着许多有关太阳的神话故事。在我国历代文献或诗词中,从《周礼》《尚书》《史记》《山海经》到屈原《离骚》乃至后期的诗词中,都记载着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和赞美。又因太阳从东方升起,故称之为“东君”,如南北朝魏收的《五日诗》中就有“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的诗句。我国许多民族一直保留和传承着祭拜太阳习俗。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最早发现的太阳纹在陕西铜川三里洞出土的商代早期兽面纹鼎上。商代晚期至西周以后,青铜器上太阳纹饰日渐增多,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彝和西周时期的弓形器上,都饰有带芒星的太阳纹。随着中原青铜器的南传,其青铜器的装饰花纹图案也随之传入,对瓯骆铜鼓纹饰产生深刻影响。瓯骆工匠不是简单吸收和复制中原青铜器的纹饰,而是根据铜鼓的功能和本民族的信仰及审美观,对太阳纹的装饰部位和纹样形态作了别具匠心的布局和创新性美化。工匠们将其花纹装饰与铜鼓的实用巧妙地结合起来,采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将光芒四射的太阳置于鼓面中心,中间为加厚凸起的圆饼形太阳体,周边有序地铸出8—12道光芒纹,芒纹外饰一圆形晕圈,使太阳纹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纹饰单元。中间加厚凸起的圆饼形太阳体,是敲击铜鼓部位。将之适度加厚,使之耐于敲击、不易损坏。圆饼形太阳体的周边所饰的光芒形纹,既形象又生动美观,表达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心理,同时又可使敲击铜鼓的声波沿着芒

纹向四周均匀传播,优化了铜鼓音质,使鼓声浑厚、悠扬、悦耳,反映了瓯骆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借鉴与吸收,体现了瓯骆工匠的智慧与创新精神。

2.其他纹饰。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常见的纹饰种类有兽面纹(饕餮纹、夔龙纹、蟠虺纹、凤鸟纹、牛纹、鱼纹、鸟纹、虎头纹、蝉纹、龟纹等)、物象纹(圆涡纹、半人半兽纹、陶纹、贝纹、垂鳞纹、蕉叶纹、乳钉纹、花瓣纹、羽纹、五铢钱纹等)、几何纹(雷纹、云纹、方格纹、连环纹、锯齿纹、回形纹、重环纹、网纹、水波纹、弦纹等等)。这些纹饰布局规整、形象生动、构图精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人们的信仰、文化艺术创作与审美观念,展示了工匠们卓越的艺术创造,为庄重、别致的青铜器增辉添彩。中原青铜器南传广西后,其铜器上的花纹装饰,得到瓯骆人的认同和欣赏。瓯骆工匠在铜鼓的花纹装饰中,既有取材于自然界、经本民族艺术化的纹饰,如立体蹲蛙、双蹲蛙、牛、翔鹭、衔鱼翔鹭、羽人、羽形纹、双鸟、蝉、田螺、旂旗、变形船纹、乘骑、水波、漩涡、蕉叶、花瓣等纹饰,显示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也借鉴和融入了大量的中原铜器上的纹饰,如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上的太阳纹、云雷纹、方格纹、弦纹、乳钉纹、重圈纹、锯齿纹、回形纹、四出钱、龟纹、蕊纹、叶纹等。有的铜鼓因以中原青铜器纹饰为主,如北流出土的“铜鼓之王”,鼓面中心为八芒星太阳纹,周边晕圈内全部为细密的云雷纹,故称之为云雷纹铜鼓。中原青铜纹饰的吸收与融入,丰富了铜鼓纹饰,增加了铜鼓的装饰美。所以说,铜鼓纹饰是地方特色纹饰与中原纹饰荟萃的集合体,反映了古代广西瓯骆及其后裔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互鉴、吸收与交融,促进了铜鼓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中原青铜器及铸造技术传入广西,对壮族先民瓯骆人铜鼓的铸造产生深刻影响。作为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壮族及其先民借鉴和吸收中原的鼓和青铜文化,开创了铜鼓的铸造。壮族先民瓯骆人学习和借鉴中原青铜铸造技术,应用到铜鼓的

铸造中。其所铸铜鼓既保持了鲜明的稻作文化特色,又学习和吸收中原青铜铸造技术和花纹装饰,并且在借鉴和吸收过程中不断创新,形成了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模式。因此,壮族及其先民铸造的铜鼓,不仅成为汉壮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是汉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2][唐]刘恂.岭表异录[M].鲁迅.校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7.
- [3][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0.
- [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277.
- [5]王国珍.《释名》语源疏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51.
- [6][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36.
- [7][西汉]戴圣.礼记[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149.
- [8][西周]姬旦.周礼[M].钱玄,等,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1.

责任编辑:潘宏纹

回顾、评价与展望：广西民族互嵌研究

马俊勇

(北部湾大学,广西北海 535011)

摘要:民族互嵌成为新时代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梳理并总结近年来学术界对民族互嵌的研究成果,客观评价广西民族互嵌研究的现状与特点,有助于深化和拓展民族互嵌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夯实理论基础、挖掘历史渊源、拓宽研究视角、探寻本土经验、推动学科合作等方面着力,不断深化广西民族互嵌研究。

关键词:广西;民族互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10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80-07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能否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随着社会的变迁,民族发展呈现出新的变化特点。2014年,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他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2]。习近平关于民族互嵌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为新时代开展民族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一、国内外关于民族互嵌的研究基础

“民族互嵌”一词由嵌入理论发展而来。匈牙利学者波兰尼于1944年提出嵌入性理论,并运用嵌入性理论分析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1985年将嵌入性理论引申到社会学领域,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后经过祖琼、迪马吉奥、安德森、福斯格伦等学者的不断拓展研究,嵌入性理论逐渐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中。

国内关于民族互嵌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14年党中央提出建设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要求后,学术界围绕民族互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目前国内的“民族互嵌”研究专著不多,主要有杨荣的《云南民族互嵌研究》,分别从空间基础、人口嵌入、族际婚姻等方面介绍了云南民族互嵌的格局,并分析了云南民族互嵌格局形成的动力和因素;张少春的《互嵌式社会与民族团结:人类学的视角》以人类学的视角,在解读民族互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

收稿日期:2023-08-29

基金项目:2022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2KY0395)。

作者简介:马俊勇,男,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党的建设。

宁夏、内蒙古、四川、陕西等地不同个案的调查,探讨了经济、文化、空间、社会、民俗、宗教等方面互嵌的特征,并分析其背后的生成问题。近年来,以“民族互嵌”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快速增长。截至目前,在中国知网搜索相关主题,共得到 505 篇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民族互嵌的概念与内涵、实证与探索、治理与路径等维度进行探讨。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民族互嵌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界定,如吴月刚、李辉认为:“民族互嵌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交往中形成的联结互动关系或者指某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社会联结的镶嵌关系。”^[3] 杨荣从经济、政治、文化、婚姻、人口等方面把握民族互嵌的内涵,提出“民族互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相互嵌入的客观现象和过程”^[4]。杨刚认为:“民族互嵌是指国家、社会、民族等多元主体交互作用推动建立有利于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的过程。”^[5]关于民族互嵌的价值意义,何生海基于民族和区域的差异,提出“民族互嵌追求的价值意义是调动资源整合和共享,使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不同民族实现资源共享、能量对流、优势互补和状态均衡”^[6]。刘国强、古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探讨民族互嵌,认为其功能是“将不同民族结合起来,营造社会结构、互相利益、社会参与的关联,形成有机团结的局面”^[7]。也有学者探讨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意义,平维彬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探讨民族互嵌,提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路径”^[8]。部分学者把视角投向社会结构,郝亚明从背景、内涵、路径的维度探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提出“社会融合是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重要实践路径”^[9]。戴宁宁基于民族心理学范式探讨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认为“民族认知、民族意识、宗教心理是构建民族互嵌型社会结构的民族心理基础”^[10]。在实践与探索方面,学界主要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如周宁宁探讨了新疆民族互嵌社区的类型,认为“民族互嵌社区模式的形成与国家的政策、资源、民

族交往等多方面有密切的联系”^[11]。对东部地区民族互嵌的探索较少,但也形成了一批成果,如温士贤以珠三角地区为个案,对该地区民族互嵌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四种理想类型:居住型、生产型、商贸型、宗教型”^[12]。在治理与路径方面,学界主要从治理的模式、困境和对策等进行了分析,乌小花、乔国存从浙江宁波城市民族互嵌的实践分析了治理模式的特点,认为“我国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更注重政治、文化和心理层面的互嵌”^[13]。刘国强分析了城市民族互嵌社区存在的困境与挑战,认为“要注重不同地区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个性分析与把握,提出更精细化的治理路径”^[14]。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的研究不断丰富,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有益的实证参考,为民族互嵌相关研究继续深化奠定了基础。

二、广西民族互嵌研究的回顾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历史悠久,长期以来生活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 12 个世居民族和其他 44 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创造了广西的历史与文化。这为民族互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基础,广西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民族互嵌的主要阵地之一。研究和探讨广西的民族互嵌,对维护国家边疆的稳定与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梳理学界有关广西民族互嵌的研究,目前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的探索,本文主要对广西民族互嵌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特点,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基于民族互嵌的历史视角

广西的民族互嵌历史悠久。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部分学者从民族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广西民族的起源、变迁以及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罗彩娟运用民族历史学的范式,分析了广西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朝时期、两汉至三国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宋元时期、明清时期的演进过程,认为“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是在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居住格局

基础上,经过各民族共同团结互助与斗争,通过婚姻交融、语言互动、文化交流形成了相互认同,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15]。刘相涛将广西古代民族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阐释了各个时期民族的分布、发展与变化情况,指出广西民族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6]。杨军具体分析了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历史变迁,认为经过几千年的移民迁徙演变,形成壮、汉、瑶、苗、侗等民族嵌入杂居的格局;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承了各民族“在一起”的历史基因,构建了广西民族团结的局面^[17]。付广华结合广西各民族的历史,认为经过分化和重组,形成了现在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且这些民族不断与迁入广西的汉族、苗族、瑶族等民族交融,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互相帮助和学习,甚至互相通婚的和谐共生格局^[18]。此外,黄朝武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古代百越各民族雒文化交融、互嵌的发展历程,认为“百越各民族雒文化的交融互嵌,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脉络,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亲情血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应有的作用”^[19]。

可以看出,学者们通过对广西民族关系历史变迁的探讨,认为广西各民族受到历代统治政策、战争、迁徙等因素的影响,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格局,这反映了广西多民族格局有丰富的历史底蕴,为当前民族互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二)基于民族互嵌的功能视角

近年来,也有学者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民族互嵌问题。郝亚明提出关于“共同的居住空间能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必要的场所,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结果”的观点^[20],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朱慧珍探讨了广西各民族文化共生的动力因素,表现在各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相近的语言和血统,共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并指出这与生存空间、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民族政策

等方面密切相关^[21]。罗彩娟认为,多民族杂居共处格局为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发生场域,并从制度、经济、战略、文化、教育等多个维度梳理了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探讨促进新时代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路径^[22]。何文钜通过梳理广西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形成的和谐共生的格局,认为各民族通过交流交往交融和同化、异化、涵化,促进了各民族的心灵相通,位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3]。郑旭东以广西融水苗家小镇社区为案例,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其作为移民搬迁小区创新开展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实践特点,认为民族互嵌社区建设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条件和具体途径,提出了要从空间、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发挥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24]。赵洋君聚焦广西龙胜多民族聚居区文化互嵌的形成、表征、机理,分析了文化传播在文化互嵌中的动力机制,认为文化互嵌和传播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两者协同对龙胜深入构建多民族互嵌起着重要的作用^[25]。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民族互嵌是广西民族和谐共生格局的条件与基础,通过空间、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嵌入,促进了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民族互嵌的整合功能。

(三)基于民族互嵌的结构视角

有学者运用了嵌入理论分析社会结构问题。蒋志远结合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分析广西各主要民族人口在年龄、教育、职业、地域、婚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提出应针对广西人口结构的民族差异进行合理的政策性调控,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人口结构性平衡及人口结合的紧密度,以保障广西的民族团结以及民族互嵌型社会的建构^[26]。夏天顺运用族际接触、民族互嵌等方法梳理广西1953年至2015年民族人口空间互嵌格局演变,分析广西各民族空间互嵌的程度,提出广西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接触主要表现为逆向互嵌化、正向隔离化和特殊模式三种模式^[27]。傅俊豪、黄家信以广西百色平山屯

为个案,探讨民族互嵌式社区形成与发展,认为生存的需要促成了平山屯壮、汉居民在居住空间上的嵌入,空间上的互嵌促成了经济以及社会心理上的互嵌,壮、汉民族互助共同体也在互嵌的发展中同步形成^[28]。徐玉特以广西壮族“陇峒节”的实践考察分析其文化意蕴,分析了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认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嵌入,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前提,通过有机嵌入实现融合共生才是有效路径,壮族传统节庆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生逻辑需构建从实体的主体嵌入、内容嵌入、方式嵌入到结构嵌入的现代与传统文化体系,进而形成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良性循环的文化共生系统^[29]。

以上研究基于广西民族互嵌的结构视角,展现出了从人口、空间到文化等多维的角度,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的过程。

(四)基于民族互嵌的实践视角

广西作为既沿边又沿海的民族地区,区域优势独特,为民族互嵌实践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学界基于不同的区域和个案,探讨了广西各民族互嵌的实践与经验。龚永辉等从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区情、筑牢安全屏障、民族交融等多方面总结了广西民族团结60年的基本经验,探讨了城市民族团结的“南宁模式”和“和谐村屯”的典型环江陈双村的民族交融实践,指出“广西各族人民在共同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同步发力,持续推动全区各族人民的平等交往、自主交流与深度交融”^[30]。近年来,城市民族互嵌的实践与治理研究成了热点。杨军等以广西南宁多民族互嵌社区典范万秀村为例,从党建、管理、服务、文化、法治等方面进行了社区治理的探索,从推动各民族由空间嵌入到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全方位嵌入等方面,认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方向,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索更多城市多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典型经验^[31]。蒋慧、孙有略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总

结了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模式的经验,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治理绩效评估机制、法治运行保障机制三方面探讨了新时代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32]。潘少君、贾婷婷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分析广西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增强共生单元治理意识和能力、构建新型共生模式以及营造正向共生环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能力的路径^[33]。乡村的多民族互嵌实践治理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陈俊宇以陈双村为田野点,探讨了易地搬迁多民族空间互嵌的实践,认为社区融合、各屯各民族空间的交互、多民族互嵌社区的建构等一系列实践,是一连串从空间互嵌到文化互嵌发展的不同形式^[34]。王兰分析了多民族聚居村落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条件和经济原因等影响,认为在乡村振兴及民族互嵌构建中存在诸多障碍,提出通过主体共融、内容互促、体制共通等三位一体耦合机制的打造,促进民族村落乡村振兴和民族互嵌的深度融合^[35]。部分学者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探讨民族互嵌的实践。陈牧以柳钢集团为例,研究了国有企业嵌入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认为这些实践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能力的转化,完成了从嵌入地方到互嵌社区和互嵌式发展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五个互嵌”的新局面,走出一条“工业强边”的互嵌式发展道路,形成了“柳钢模式”^[36]。也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视角探讨民族互嵌治理问题,杨耕、杨东运用系统方法分析广西多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共融目标,提出“以结构系统模式治理多民族互嵌社区,从整体上把握社区的复杂情况,实现社区的优化治理目标”^[37]。

学术界对广西民族互嵌的实践与治理的探索,从整体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企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经验与治理模式。

三、广西民族互嵌研究的评价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放眼全球,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抬头,民族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社会纠

纷等时有发生。面对国内外各种风险与挑战,合理解决民族问题关系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民族互嵌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样化,学术成果不断涌现。随着学界对广西民族互嵌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研究主题集中在历史发展、功能地位、结构分析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理论基础、实践经验与治理模式,对促进广西民族互嵌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广西的区情来看,各地民族分布不一,民族互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梳理现有成果,对广西民族互嵌的研究可在如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一是从民族互嵌研究的理论构建看,目前关于民族互嵌理论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某一个学科、某一个视角,研究成果主要还停留于概念分析、政策解读层面,理论构建还不够深入,对于当前广西民族互嵌出现的新情况缺少理论阐释。

二是从民族互嵌研究的历史演进看,现有研究主要按照历史发展脉络从整体上把握各民族互嵌的演变过程,总结了各民族和谐共生格局形成的有利条件和举措,为民族互嵌研究提供历史经验。但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对因历代政策、战争、人口迁徙等因素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造成影响的研究成果偏少。

三是从民族互嵌研究的角度看,民族互嵌涉及空间、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在空间、文化的互嵌,而关注经济、社会、心理的互嵌成果较少,民族互嵌研究需要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目前民族互嵌研究对有利因素关注较多,而对不利条件的关注较少,需要加强民族互嵌的利弊研究。

四是从民族互嵌研究的范围来看,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广西经济社会的转型、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各民族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展,从乡村流入城市,从内陆流向沿海,影响民族互嵌的因素日益复杂多样,民族互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越来越突显。城市民族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民族互嵌的

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城市社区民族互嵌格局构建。

五是从民族互嵌研究的范式来看,由于民族互嵌研究起步较晚,成果涉及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但学科之间交叉研究不足,研究范式比较单一。

四、广西民族互嵌研究的展望

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加强民族互嵌建设,是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需要政府、社会、学界等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取得新成效。通过对广西民族互嵌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分析,今后广西民族互嵌研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深化拓展。

(一)夯实民族互嵌的理论基础

理论研究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构建的过程。立足广西的区情,分析广西民族互嵌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要不断拓展理论研究的视野,充分利用各个学科关于民族互嵌的理论基础,特别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科学把握“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广西的实际、同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深入解析民族互嵌的内涵与外延,以强化理论研究推动民族互嵌实践的发展,并在民族互嵌实践中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化。

(二)挖掘民族互嵌的历史渊源

民族互嵌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未来学界还需要加强对民族互嵌史料的挖掘。从历史的视角分析民族互嵌,挖掘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过程,特别是要从地方志、民族志等文献中挖掘民族互嵌的历史渊源。这不仅要溯源某一村落、某一社区的互嵌格局,还要加强对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研究,不断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不利因素和影响,扬长避短,为民族互嵌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今后的民族工作创新提供历史依据。

(三)拓宽民族互嵌的研究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升,各民族人口流动加速,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空间、文化的互嵌研究,需要不断开拓研究视角,加强对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互嵌的研究,特别是要拓展心理互嵌的研究,将心理互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四)探寻民族互嵌的本土经验

民族互嵌研究不仅要关注城市民族互嵌问题,还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讨乡村民族互嵌问题。虽然已有学者分别从城市、乡村的视角进行了民族互嵌的社会调查,但研究深度和广度还可以继续提升,需要进一步丰富民族互嵌实证研究,扩大研究区域的范围,通过深入研究不同地区民族互嵌的情况,注重对各地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实现各地民族互嵌格局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挖掘典型的做法,总结成功经验,为其他地区推进民族互嵌提供经验参考。

(五)推动民族互嵌的学科合作

民族互嵌涉及面广、领域多,其研究需要多个学科的合作。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民族互嵌研究需以更加创新的思维,将跨学科方法应用到民族互嵌研究中。具体应注重民族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发挥各学科优势,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强化民族互嵌的实证分析,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构建合理规范的指标体系,不断提升民族互嵌格局的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光明日报,2014-05-30(1).
[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1-08-29(1).
[3]吴月刚,李辉.民族互嵌概念刍议[J].民族论坛,

2015(11).
[4]杨荣.云南民族互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5.
[5]杨刚.大理吉村民族互嵌关系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9:25.
[6]何生海.“民族互嵌”与边疆治理[J].民族学研究,2021(4).
[7]刘国强,古棋予.民族互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3).
[8]平维彬.互嵌与交融: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野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9]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10]戴宁宁.构建民族互嵌型社会结构的民族心理基础及实践路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11]周宁宁.民族互嵌式社区适宜模式初探——以新疆为例[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4).
[12]温士贤.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多元类型与建设理念——基于珠三角地区的案例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0(4).
[13]乌小花,乔国存.“民族互嵌”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浙江省宁波市 Z L 社区民族工作为例[J].民族社会学研究,2018(3).
[14]刘国强.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路径分析[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3).
[15]罗彩娟.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广西民族关系史浅论[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4).
[16]刘相涛.新中国成立前广西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演进[J].前沿,2013(21).
[17]杨军.广西多民族杂居格局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动空间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8(1).
[18]付广华.人类学视野下的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J].桂海论丛,2009(2).

- [19]黄朝武.古百越各民族雉文化交融互嵌的历史考察[J].贵州民族研究,2022(2).
- [20]郝亚明.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J].中南民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 [21]朱慧珍.广西各民族文化共生生态势及其形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2004(1).
- [22]罗彩娟.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及其深化路径探讨[J].广西民族研究,2018(5).
- [23]何文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八桂根基——建设壮美广西的民族理论视角研究之一[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6).
- [24]郑旭东.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以融水苗家小镇社区为例[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
- [25]赵洋君.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互嵌与传播——基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调研[D].南宁:广西大学,2022:67.
- [26]蒋志远.广西人口结构的民族差异及其嵌入式问题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6(11).
- [27]夏天顺.1953—2015年广西民族人口空间互嵌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3:84.
- [28]傅俊豪,黄家信.社会共生论视角下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生命史——广西百色市平山屯的个案[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
- [29]徐玉特.嵌入与共生: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生逻辑——基于广西DX县陇峒节的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
- [30]龚永辉,俸代瑜,黄金海.守正创新能帮善成和谐壮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60年的基本经验[J].广西民族研究,2019(1).
- [31]杨军,朱颖芸,韩春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万秀村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5).
- [32]蒋慧,孙有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研究——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
- [33]潘少君,贾婷婷.广西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基于共生理论视角[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
- [34]陈俊宇.空间的互嵌:易地搬迁多民族互嵌社区的实践与分析[J].民族学论丛,2022(2).
- [35]王兰.多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民族互嵌的耦合机制与实践路径[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3(2).
- [36]陈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国有企业嵌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以柳钢集团为例[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
- [37]杨耕,杨东越.广西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民族共融目标研究[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3(1).

责任编辑:许立坤

中老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潘 岳,冯羽鑫,刘 蓬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 530006)

摘 要:在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与老挝的革新政策共同构筑的基础上,中老两国的友好关系茁壮成长。2019 年,随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命运共同体行动方案生效,双方关系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老挝作为东盟重要一员,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老铁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成果已经顺利通车,其在湄公河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和老挝始终坚持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展望未来,中国和老挝在相似的发展道路、深厚的传统友谊以及战略对接的互补性基础上,传统友谊将更加稳健,经济依存度也将持续加深。中国和老挝将继续增进共识、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为维护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

关键词:中老关系;命运共同体;中老铁路;多边主义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11

[中图分类号]D829.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87-06

中国自 1953 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始终将之作为外交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2002 年,中共十六大正式明确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的周边外交策略^[1]。2003 年 10 月,温家宝在印尼巴厘岛出席首届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并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提出并全面阐释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2017 年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新论断。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标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高度,也开启了外交领域的新篇章。近年来,在中国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和老挝革新政策奠定两国友好关系基石的基础上,中老双边关系得到了新的发展。

一、中国和老挝双边关系攀升至新高度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和老挝在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推动下,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不断在多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收稿日期:2023-03-10

作者简介:潘岳,男,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中国—东盟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老挝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东南亚移民与华侨华人;冯羽鑫,女,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刘蓬,女,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老挝教育。

(一)政治互信进入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老挝政治互信显著增强,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两国高层交往日益密切。2000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对老挝的首次访问。此后,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先后访问老挝,而老挝国家领导人坎代、朱马利、本杨、通伦也先后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关系从正常化发展到了“四好”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最终形成了中老命运共同体。

二是两党间的交流合作密切。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老挝的干部、军队提供了丰富的培训项目,涵盖语言学习、政治建设、专业技能、国家治理、脱贫攻坚经验等方面的内容。培训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培训教学、实地考察、座谈研讨等。中国为老挝培训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成为老挝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老挝的经济社会建设和中老友好关系的深化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

三是防务安全合作显著增强。中老两军高层保持密切的沟通和互动,中方国防部门高层领导多次访问老挝,老挝国防部领导人也多次来中国访问。中老两军高层积极推动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深化在政治工作、疾病防控、教育培训、联合巡航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积极向老挝提供医疗物资和疫苗支持,先后向老挝派遣了八批医疗专家,协助开展医疗救援工作。这些举措大大提升了老挝军队的卫勤保障能力,进一步巩固了两军的友谊基石。

(二)务实合作领域成果丰硕

在中国和老挝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以及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的背景下,双方在众多务实合作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经贸方面,过去十多年里,中国一直是老挝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2021年,中老双边贸易额高达43.4亿美元,占老挝全年贸易总额的32%;而老挝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0亿美元,占其贸易顺差总额的100%。令人瞩目的是,2022年双边贸易总额进一步提升至56.8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30%,而老挝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保持在10亿美元^①。同时,2021年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也达到了12.8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达99.4亿美元^②。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项目累计达862个,投资领域广泛涵盖经济合作区、铁路、电网、水电站、房地产和通信卫星等关键行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型企业在老挝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矿电行业,中型企业主要投资于建材和矿电行业,小微企业主要投资于建材行业。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在老挝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其数量占我国对老挝直接投资企业总数的80%^[2]。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中国和老挝在经贸领域的深度合作和互利共赢。在经济模式变革的推动下,中国和老挝不仅保持着传统的经贸往来,更积极地推动产业升级,加强在新兴经济领域如电子商务等的深度合作。2022年,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工业与贸易部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推动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同时加强物流、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效率和便利性,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推动两国经贸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中国在老挝的经济发展中,主要发挥着重要投资来源国、援助国和发展经验分享国的角色作用。

在交通运输方面,老挝成为最早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这与老挝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特别是推动老挝从内陆状态向区域一体化国家迈进。“一带一路”倡议为老挝及沿线国家带来了显著的益处。2020年至2021年,中老两国共同投资建设了老挝万万高速公路(万象—万荣段)和中老铁路,结束了老挝无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历史。这不仅是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http://stats.customs.gov.cn/>。

^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211/20221118091910924.pdf>。

推动中老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例证,也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中老两国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成果已经开始产生外溢效应,泰国和越南纷纷期望加速与老挝和中国的互联互通。

在农业方面,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在老挝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老挝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29亿美元,占GDP的17.9%^①。得益于中老农业的互补性,中国丰富的农业发展经验及成功模式为老挝提供借鉴的样板。老挝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具备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这恰好与中国的农业技术和人才形成了互补。2017年11月,中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共同建设中老现代农业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双方共同推进中老现代农业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协调机制,以促进天然橡胶、水稻、畜牧、木薯、果蔬等产业的发展^②。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示范区和示范点成为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老挝—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是较为知名的项目。该示范园由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建成,并成功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部首批“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这些农业示范区和示范园的成功运营,有力地推动了老挝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大幅提高了当地农户的收入。自2022年9月起,中国对包括老挝在内的16个国家的98%税目产品实行零关税待遇。在2022年老挝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天然橡胶达28.4万吨,总价值为4亿美元,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木薯淀粉达到19万吨,总价值达9000万美元;甘蔗达到110万吨,总价值6400万美元^③。中国和老挝在农业领域的深度合作,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增收,还有利于老挝农村地区商品化生产,为老挝政府推进减贫工作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在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推动下,中老农业

合作不断茁壮成长,结出新硕果。

在减贫合作方面,中国独特的扶贫经验和方案,为全球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参考。老挝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将贫困发生率从2012—2013年的23.3%降低到2018—2019年的18.3%,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贫困问题仍需持续关注^④。因此,中国和老挝在减贫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2014年11月,中国提出了“东亚减贫合作倡议”,老挝成为该倡议下的第一批重点合作国家。目前,由广西负责实施的中国援助老挝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已取得圆满成功。2019年5月中国和老挝共同签署的《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中国援老挝八大工程”。2021年3月“中国援老挝八大工程”一期项目正式开工,受益范围覆盖万象省和琅勃拉邦省共30个村庄,包括农村贫困地区的通电照明、数字电视、卫生和供水等关键工程。中老两国在老挝的减贫合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中老两国的友谊基石。

在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东南亚地区长期面临着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等诸多挑战。中国和老挝在此方面形成了诸多共识,展开了广泛合作与资源共享。例如,在联合国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边机制下,双方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以提高区域安全稳定性。此外,双方还积极参与反恐联合演习,提高中老边境管控能力。随着反恐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区域合作的迫切需求,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加入联合反恐演练。在禁毒、打击电信诈骗、打击跨境赌博、打击拐卖人口、移民和边防出入境管理等领域,双方也加强了合作,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在新兴领域方面,两国积极拓展了在数字经济、

①数据来源:老挝统计局网站 <https://laosis.lsb.gov.la/tblInfo/TblInfoList.do?sessionId=G39AyHfzf2OWHsdtq6kWEj1eOUTtGpfCqa6vhLs.laosis-web>。

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http://stats.customs.gov.cn/>。

③数据来源:老挝统计局的资料 Poverty Profile in Lao PDR _ Poverty Report for the Lao Consumption and Expenditure Survey 2018-2019。

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合作。这种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积极合作,不仅有利于地区的稳定,还为两国之间搭建起跨越边界的友谊之桥。

(三)人文交流日益频繁

在国家交往中,民众之间的深厚感情起着重要作用。2019年至2022年,中老两国共同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和《关于进一步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其中都将人文交流列为合作的三大内容之一。近年来,中老双方人文交流的互动愈发频繁,取得的成果也愈发丰硕。

在教育方面,中老两国的合作源远流长。自2005年10月15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教育部2005—2010年教育合作计划》起,中方每年都向老方提供23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并承担老挝留学生从万象至中国接受教育的往返旅费。这一举措旨在促进中老两国的教育交流,为老挝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质的学习平台。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3月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应运而生。2011年7月,老挝苏州大学设立。这两所学校的建立,不仅为老挝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老挝以及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为了深化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中国每年除提供全额奖学金外,还通过广西、云南等地的政府机构,为老挝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机会。2012年7月,中老两国签署了《中老2011—2016年教育合作计划》,中方每年向老方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名额增加到300个,涵盖了矿产、水电、环境、农业、机械、企业管理、贸易、财政、金融等^[4]。近年来,中国在教育领域对老挝的援助取得了显著成效,仅2018年,老挝学生来中国留学就达14645人,在来华留学国家中排名第八^[5]。

在旅游方面,2004年11月,中老两国签署了《中国公民组团赴老挝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激发中国游客赴老旅游的热情。为了进一步落实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2019年两国共同举办了“中国—老挝旅游年”活动。在两国政府的

积极推动下,2019年中国前往老挝的游客首次突破了100万人大关。特别是随着中老铁路、万万高速公路的相继通车,两国间的旅游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在新闻出版方面,2021年4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共同签署了中老经典著作互译备忘录。该协议规定,在未来五年内,中老双方将携手翻译并出版50种两国经典著作。作为两国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首批成果,天津教育出版社于2022年12月成功出版了《凯山·丰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事业》《两姐妹》《昆布罗王》三部老挝经典著作,为两国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在生态环境方面,2020年中老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关于合作建设万象赛色塔低碳示范区的谅解备忘录》,致力于在老挝首都打造一个低碳示范区,为老挝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持。此外,双方还共同努力,共建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这是一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合作项目,旨在保护包括亚洲象和热带雨林在内的沿线珍稀濒危资源。在水资源领域与水环境治理方面,中老两国也开展了广泛合作,主要目标在于优化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提升水环境质量,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在水资源规划、水利工程建设、水环境监测、水污染防治和水灾害防御等多个领域,双方都开展了合作项目,为湄公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作出了贡献。

二、中国和老挝深化多边合作关系

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是中老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秉承“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中国政府一直坚定不移地推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并致力于深化与东盟的友好关系。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21年11月,双方将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该关系以多边、安全和发展为核心主题。作为东盟成员国的老挝,始终主张在包括中国—东盟(10+1)合作、澜湄合作和东亚峰会等多边

机制中,加强与中国的协调与配合。目前,中老两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重大的事情上。

一是老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97年,老挝踏上了申请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一步,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于2004年正式启动了谈判进程。在该过程中,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老挝加入工作组”的主席,中国不仅积极给予老挝入世过程以全方位支持,还举办了专门针对老挝入世的培训班,与老挝官员分享经验,协助简化入世谈判进程。2012年10月,老挝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58个成员国。

二是南海问题。老挝在2016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在东盟峰会上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老挝认为,南沙部分岛礁的争议并非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因而不应当干扰中国—东盟关系的正常发展,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及多边化。同年7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各方承诺将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有效解决南海争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举措也有助于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清除障碍。

三是湄公河巡航。自2011年10月5日湄公河“金三角”地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中国船员遇害案以来,中老缅泰四国共同建立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以确保这条重要航道的安全。截至2022年9月底,该执法共执行了120次巡航任务。这些行动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湄公河航运的安全,保障了沿岸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还推动了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三、中国和老挝关系的发展前景

(一)加强合作,稳健前行

在地理上,中国与老挝山水相连,是一衣带水、同舟共济的伙伴。历史证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且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共同的革命经历、斗争历程,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相似的发展理念与目标,使得中老两国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

体。然而,对于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西方国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老合作有助于推动地区和平与发展,他们支持中国在基础设施、环境、贸易等领域的投入,同时期待与中老两国开展三方或多边合作。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对中老合作持有偏见和敌意,认为中老合作是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手段,试图阻挠和破坏中老合作,他们利用国际舆论,对中老铁路项目、湄公河水资源等问题进行抹黑和诋毁,导致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对中老两国的形象产生误解。另一方面,尽管老挝正在努力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其经济环境仍受到国际和国内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种经济上的滞后性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营商环境、社会治安等,进而影响两国的贸易往来。同时,中老合作涵盖了众多领域和项目,需要得到充足的融资支持。因此,在中老合作过程中,经济互补的天平在一些地方将会偏向老挝一方。此外,中老合作对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极大,尤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由于老挝人口有限且发展相对落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教育水平有待提高,这给中老合作带来了一定的制约。因此,双方在未来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培训、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二)立足现实,放眼未来

尽管国际和地区局势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中国和老挝互为战略伙伴、共享命运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框架下,双方关系将拓展至更广泛的领域、深化至更高的层次。首先,中老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道路,均秉承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原则。在长期的交往中,两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推动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其次,战略对接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为实现对外开放新格局及推进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互联互通是重要支柱之一。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老挝境内80%为山区和高原,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中老铁路建成前,老挝的铁路里程仅有3.5公里。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融入

东盟经济一体化,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成为老挝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老挝提出了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自身的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今,中老铁路和万万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沿线的经济开发以及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将成为未来两国经济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再次,中老两国在旅游、教育、减贫、公共卫生、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中国在资金、技术、经验和人才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而老挝需要着力改善民生和保护环境,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最后,中老两国均秉持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外交理念。双方可持续性发展离不开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大国,中国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和公平正义,为此提出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旨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老挝方面,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展望未来,中老两国将在多边机制中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与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自古以来,中国与老挝一直是亲密无间的邻居,双方秉持着团结互助的精神,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友谊基础。两国的发展道路相近,优势互补,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尤其是中老铁路的竣工通车带来了显著的外溢效果,极大地推动了湄公河地区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多边合作机制中,中老两国始终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同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发展。两国命运相连,中老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双方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务实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地区和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7.
- [2]李好,苏立坡.在困境中成长:中资企业在老挝[J].中国—东盟博览,2019(3).
- [3]王立丰,袁坤,刘勇,等.澜湄合作机制下的中

国——老挝天然橡胶科技国际合作现状与展望[J].热带农业科学,2022(6).

[4]张成霞.中国与老挝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回顾与展望[J].东南亚纵横,2017(3).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EB/OL].(2019-04-12)[2023-02-22].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责任编辑:许立坤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角下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秦雅静

(南宁市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深化,进一步完善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推进中国—东盟双边营商环境法治化,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近年来,广西在探索建立健全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商事纠纷法律文件可操作性、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效能释放、调解和仲裁衔接程序、发挥民间调解积极作用以及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可通过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制定中国—东盟商贸纠纷调解法、进一步发挥民间调解积极作用、培养中国—东盟高层次法律人才等措施,不断完善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营商环境;法治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12

[中图分类号]D9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93-06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CAFTA”)自成立以来,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农业等合作领域不断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拓展,从1.0版进入3.0版建设时代。近年来,中国—东盟贸易额连创新高,2022年前10个月已达到7984亿美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尤其是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生效之后,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更进一竿。在这进程中,双方因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文化宗教和社会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摩擦和争端也时有发生,完善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十分必要。广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应在现有的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制度框架下,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机制、提升纠纷解决的能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能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优化中国—东盟营商环境,推动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一、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中国—东盟双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据2022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分会(以下简称“广西贸促会”)等发布的《东盟营商环境报告(2022)》显示,47.31%的受访企业对东盟营商环境持乐观预期,49.7%的受访企业表

收稿日期:2023-10-20

基金项目:2023年度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课题(2023XSX11)。

作者简介:秦雅静,女,南宁市社会主义学院法学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示计划扩大在东盟业务^①。高效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在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机构设置、法律服务体系、合作交流机制等方面为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提供了坚实支撑。

(一)设立专门机构完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1.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中国—东盟贸易往来产生的纠纷,其本质属涉外纠纷,如果按照涉外程序进行诉讼,在证据的调取、法律的适用以及文书的送达等方面不仅耗时较长,也不符合商业活动对效率的要求。2022年9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设立,以和解(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类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护航中国—东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自贸区设置国际商事法庭在全国尚属首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的受案范围包括所有的东盟成员国,为中国—东盟从传统合作领域拓展到新兴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设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东盟庭审中心(以下简称“东盟庭审中心”)。与诉讼相比,仲裁以其自愿性和灵活性受到各大跨国企业的青睐。2011年8月,东盟庭审中心在南宁正式揭牌,是中国面向东盟的仲裁服务机构,可以为涉案企业提供更专业、更便捷的纠纷解决服务。2020年12月,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广西)自贸试验区办事处设立。该办事处积极宣介“仲裁示范性条款”、举办仲裁知识培训、提供仲裁咨询,拓展企业对仲裁条款的认知度,增进企业的接受度,提升企业自觉利用仲裁条款的能力和水平,为企业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经营效益。

3.设立广西商事调解协会。东盟各国因法律体系、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些企业习惯于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2022年9月,广西贸促会设立首个商事调解类专业协会,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商事调解协会。该协会在制定与推动行业规范、行业资讯与研究、政策与法律宣传等方面积极作为,为各会员搭建了研讨、会议和咨询的交流平

台,有力维护了行业的正常秩序和利益。广西商事调解协会不断促进国内调解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满足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

4.成立诉调对接中心。2021年1月,广西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与南宁市青秀区法院联合成立诉调对接中心。截至2022年9月,已受理涉及泰国、墨西哥、科威特等国家的商事纠纷案件2500余起,案件标的约3.5亿元^②。广西贸促会充分发挥商事调解协会的积极作用,对于最先选择调解但最终没有达成调解协议的企业提供诉调对接服务。此举既可以分流案件,减轻法院的压力,还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二)加强商事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东盟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法律服务,在《外商投资法》《民事诉讼法》《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法律和重要文件以外,广西在制定法律文件、促成建立法律合作机构等方面积极作为,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商事法律服务。

1.发布商事法律合作指导性文件。聚焦中国—东盟商事法律服务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不断完善中国—东盟商事法律服务体系。在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期间,发布了《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共同宣言》《中国—东盟商事联合调解合作协议》等重要文件,对中国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等方面作原则性的指引。

2.推动东盟各成员国签署法律合作备忘录。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签署的法律合作备忘录主要是针对特定国家具体案件、具体情况开展的微观、可操作的合作,如签署《中国—菲律宾商事法律合作备忘录》(2017年9月)、《中国—越南商事法律合作备忘录》(2017年9月)、《成立中国—老挝商事法律合作委员会备忘录》(2020年9月)等重要文件,通过规定案件事实和法律细节,为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3.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立足东盟国

^①参见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等,编:《东盟营商环境报告2022》,2022年,第14页。

家的多元化需求,设立了中国贸促会自贸协定(广西)服务中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办事处、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办事处、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广西自贸试验区调解中心等法律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纠纷解决法律服务。商业与风险相伴,争议解决虽然不是商贸履行过程中必备的一环,但在前期磋商、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都是不可回避的,争议解决对投资者的前期考察、后期的投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站式”法律服务,即从纠纷提起问题到解决,具有程序简便、耗时短、尊重当事人意愿等优势。在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中,“一站式”服务具有独特优势,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论坛

1.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2014年9月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研讨会,到2023年9月已经成功举办8届。顺应法律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新加坡、老挝等东盟国家法院、检察院的相关负责人,每年聚焦当年法律热点问题,回应现实关切,探讨涉外纠纷调解与诉讼对接、知识产权、企业合规等问题,积极发挥各国的企业家、法学家、律师的专业优势,为中国—东盟法律服务提供交流的平台。2023年9月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首次升级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论坛,论坛以“加强RCEP区域企业合规建设与合作”为主题,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老挝、缅甸、越南和中国最高检的相关领导和嘉宾聚焦体制机制建设、争端解决、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等交流企业合规的最新经验和成果。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合作论坛,对促进中国—东盟国家企业投资方面法律制度的衔接、推进商事纠纷联动解决、加大各国法律部门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2023年该论坛促成了七项实务成果,即中国—东盟检务信息交流中心揭牌、揭牌成立中国—越南商事法律合作委员会中方秘书处、揭牌成立企业合规师培训示范基地(广西)、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联

动解决机制正式运行、发布广西首本行业类出口合规指引——《柳州螺蛳粉产业国际贸易合规手册》、启动《广西企业境外经营合规指引》课题、发布《RCEP成员国投资合规指南》,为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国际化经营搭建合作交流的国际平台。

2.举办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2014年9月18日首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举办,至2022年7月已成功举办三届,为东盟国家的首席法官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机会。东盟国家既有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差异较大。借助大法官论坛,可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相关主管机关的信息沟通,促进中国—东盟优化法律服务。

3.建立中国—东盟国家法官交流培训基地。2017年中国—东盟国家法官交流培训基地在南宁挂牌成立。近年来,该基地共举办了5期涉外法官研修班,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等12个国家共115名法官、检察官参加了研修。研修班的成功举办有利于促进东盟各国在法律理论研究、司法案例指导、区域司法合作等方面的联系和沟通。东盟国家的大法官、大检察官则通过培训加深对中国国情、司法制度、“一带一路”法律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解,更好地服务中国—东盟经贸发展。

二、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的法律合作文件可操作性不强

中国—东盟商事纠纷的法律宣誓性文件较多,主要表现为宣言、协议、备忘录等,内容多停留于原则性规定和宏观指导层面,无论是合同纠纷亦或借贷,人们往往不诉诸法律,而是通过一套基于长期交往内生出的非正式规范来调节,出现了制度与实践的背离^①。同时,中国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违约、侵权等予以全面完整的规定,而东盟国家受历史的影响,有的为大陆法系国家,有的为英美法系国家。为满足东盟国家的多元需求,中国—东盟商事纠纷的协议具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但对解决具体案件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指引。

(二)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平台的效能有待进一步释放

无论是刚设立的国际商事纠纷法庭,还是“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都是为了平等的市场主体在货物买卖、投资、服务等领域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搭建纠纷解决平台目的是服务市场主体,但现实中一些中小企业或者私人之间的纠纷没有通过平台寻求救济。东盟的中小企业在合同订立或者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受交易习惯、信息以及标的额等影响,它们诉诸以上纠纷解决平台的概率较低。笔者曾就中越商贸纠纷有关问题到广西某法院中越商事纠纷特别巡回法庭调研,了解到法院受理的中越商事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有不当得利、民间借贷、合伙协议等,解决方式有撤诉、调解或按照撤诉处理等,而通过诉讼解决的案件数量极少。究其原因,首先是诉讼时间长,影响商业效率。对企业而言,效率就是第一生产力。当事人提起诉讼要经过各种程序,而且域外司法文书的送达须由最高人民法院递交外交部,耗时比一般国内的民商事案件更长。根据成本和收益分析,以追逐更大利益为目的的企业,经过理性分析之后,往往不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其次是中越商贸纠纷多发生在“熟人社会”。中越边贸互市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彼此信任,彼此在长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如果有人因为失信导致合作不畅,那么一方的当事人就会在当地的“商圈”中传播,相对方就会受到严格的“声誉罚”。如果双方当事人违约将会永远丧失商业信誉,随之丧失商业机会。因此,在熟人社会,违约和失信的成本增加,促使当事人履行义务。

(三)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调解与仲裁衔接程序性规定有待完善

仲裁和调解作为商事纠纷非常重要的两种选择,都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快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方式。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定》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试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调解和仲裁衔接主要分为三种模式,即先调解后仲裁、仲裁中调

解、先仲裁后调解。当事人可以在三种纠纷方式中任意切换。按照一般的纠纷解决的习惯,先仲裁后调解会增加成本,较少被选择。商事调解与仲裁的衔接解决的结果能够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4],在调解或仲裁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事后否认,会出现证据不足、不执行调解协议等现象。此时当事人在调解或者仲裁过程中自愿作出的妥协、提供证据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是默示的方式,对证据默示是否可以认定为同意,则需要进一步明确。

(四)商事调解的民间角色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

行业协会、行业自律性组织或者第三方调解等机构在处理中国—东盟商事纠纷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民间调解机构在涉中国—东盟商事纠纷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其原因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第一,中国—东盟国家法治模式存在差异。我国的民事诉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当事人主动提起诉讼,法院才会受理。如果当事人不提起诉讼,司法则保持中立不介入。第二,当事人在合同纠纷中并未约定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仲裁裁决要求必须在当事人双方选择或者约定的前提下才能采用。虽然仲裁与诉讼相比具有耗时短、程序简便、公正、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优点,是商事主体发生纠纷之后比较青睐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但是仲裁庭不能在没有约定时主动裁决或者干预,即使完备的法律规定也会被束之高阁。第三,一些企业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淡薄。受交易习惯、法律文化等影响,东盟国家一些当事人习惯用非正式方式解决纠纷,对合同约定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重视不够,最终能否妥善解决纠纷取决于民间组织的声誉、调解员是否公正。如果行业协会、行业自律性组织或者调解员存在偏袒,那么矛盾可能会找不到合适的救济途径,不利于形成纠纷解决的良好循环。随着 RCEP 的实施,民间调解的需求巨大,但因涉及规则、规范层面内容关注度不够,其便捷、高效的优势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五)中国—东盟商事纠纷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

随着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东

盟商贸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已经出现一批研究成果,但在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首先,中国—东盟商事纠纷理论研究缺少系统性。目前,在中国—东盟商事司法协助及其演进过程、中国—东盟司法协助统一化、司法文书域外送达等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切入的视角较单一,未能满足实践的需求。其次,涉东盟复合型的专业人才缺乏。在涉东盟商事纠纷发生后,不仅需要熟悉国内、国际法律的人才,也需要有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英文和东盟国家语言的复合型人才。目前,“法律—语言”“法律—经贸”的复合型人才比较缺乏。再次,涉东盟律师队伍人才不足。据广西律师协会网站显示,目前广西律师的总数是16 014人,涉外律师44人(2022年数据),占比0.27%。涉外律师人数严重不足,不利于涉东盟纠纷的解决。

三、完善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

(一)制定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调解法,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指引

调解、和解等纠纷解决方式法治化,有助于当事人寻求纠纷解决的最佳途径,为纠纷解决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应制定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调解法,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弥补协议、宣言、法律合作备忘录等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

(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释放商事纠纷解决平台的效能

需求决定供给,经济主体不但注重商业效率,更加注重纠纷发生后司法的公正和高效。通过纠纷解决机制多元设置,力争形成纠纷解决的合力,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积极鼓励商事主体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订立仲裁条款,提高仲裁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以更好地节约司法资源,促成纠纷及时解决,降低投资和经营的成本,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在对外商贸纠纷领域充分发挥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主导作用,探讨引入同乡会、行业协会、法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第三方企业等参与的非诉讼争议

解决制度,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制度支撑。

(三)完善商事纠纷调解与仲裁相衔接的程序性规定

近年来,广西颁布了《关于构建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联动解决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签署了《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发布了《RCEP背景下中国—东盟商事仲裁协调机制研究》白皮书等文件^[9],不断强化调解、仲裁、诉讼联动协同,依法公正高效化解涉外民商事纠纷的力度。当前,进一步完善调解和仲裁相衔接,首先应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例如,关于在调解过程中因妥协作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据在仲裁中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问题,可以在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依据判例、指导性案例予以判断。其次应落实好《意见》规定的法律问题研讨制度。调解和仲裁相衔接,在程序的选择和适用上要用好法律问题研讨制度,对适用中模糊的规定、存在歧义的条文以及实践中没有规定的法律问题定期开展研讨,本着最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原则达成共识,形成最大合力,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再次应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同一个案件,在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规则的适用方面不因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发生改变,案件事实、证据、法律规则等信息共享可以减少因程序变化导致的结果差异。应利用好调解、仲裁信息共享平台,为调解和仲裁的衔接提供支持。

(四)进一步发挥民间调解的积极作用

民间调解不具有强制性,方式较灵活,适用规则较多样,执行较松散。中国—东盟的商贸纠纷时有发生,纠纷双方当事人主要通过和解、协商或者第三方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应进一步发挥民间调解的积极作用。首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组织的积极作用。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没有法律强制力,在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分歧或者争议应合理管控,规定其在规范层面解决纠纷的行为,避免矛盾升级。其次,引导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纠纷解决的方式。民商事纠纷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纠纷预防和矛盾的实质性化解方面给予

当事人选择和协商的空间,最大限度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加强中国—东盟基础理论研究,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队伍

首先,加强中国—东盟法学理论研究。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一批中国—东盟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但随着中国—东盟经济交往不断深入,中国—东盟需要更加开放多元的司法合作和司法服务。因此,应加大对东盟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的前沿研究力度,不断深化法学理论研究。加强东盟各国理论专著、学术论文、东盟发展动态等研究,积极推动中国—东盟法学理论研究,为中国—东盟司法实践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指导。

其次,加强交流合作,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涉东盟纠纷法律专业人才。面向涉东盟诉讼的法律人才应依据中国和东盟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将培养类型定位为复合型,尤其是“法律—外语”复合型人才和“法律—经贸”复合型人才。大学是培养符合中国—东盟经济发展和纠纷解决复合型人才的主要基地,在对外交流方面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合理设置课程,扩大交流的专业范围,增加交流的人数。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发展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对外交流规划,不断优化交流人员的知识结构,提高交流人员的司法服务能力。

再次,加强涉外律师队伍建设。就广西来看,执业律师队伍中从事涉外法律的律师人数严重不足,律师水平亟待提升,应增强律师涉外诉讼能力培养,通过在职律师培训、引进区外甚至国外相关人才等方式优化执业律师队伍,提高涉东盟律师专业素质。有针对性地开展涉及东盟律师业务指导,建立中国—东盟律师专业人才库,培养一批懂业务、精通语言、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素质律师。

[参考文献]

- [1]中国—东盟贸易规模30年扩大100余倍[EB/OL]. (2022-12-13)[2023-05-08].<http://pxzhbsq.gxzf.gov.cn/xwzx/gnxw/t14284742.shtml>.
- [2]童政.擦亮商事法律服务“金字招牌”[N].经济日

报,2022-09-18(12).

[3]张显伟,徐毅飞.论制度与实践的背离——以中国—东盟商贸纠纷的解决为分析基点[J].广西社会科学,2013(3).

[4]杨鹏.“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涉东盟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2(3).

[5]王春楠,聂新宇,林小康.促进贸易规则互学互鉴实现法商融合共进共赢[N].广西日报,2021-09-16(5).

责任编辑:祝远娟

需求溢出理论视角下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服务需求分析

——以柳州市L区为例

罗树杰¹,李霖¹,王杨²

(1.广西大学,广西南宁 530004;2.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需求溢出理论视角下,城市困难群众存在最低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心理情感、社会交往等多样化的社会救助服务需求且个体差异明显,不同个体需求溢出情况不同,在不同方面存在需求溢出问题。针对困难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溢出,应加大政策宣传,正确引导困难群众对政府社会救助责任的认知;建立救助对象多维评估指标与需求科学评估机制,动态多维识别,实现多维帮扶,遵循差异化供给原则按需救助;打破社会救助信息数据壁垒,扩展数据共享渠道,提升社会救助智能化水平;加强社会救助多元主体合作力度,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可及性。

关键词:社会救助;困难群众;需求溢出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6.013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6-0099-11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是政府和社会为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向弱势群体提供的救援活动,是保障社会底线公平的兜底性政策制度^[1]。城市困难群众作为特殊群体,主要包括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困难流动人口等^[2]。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来,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以解决,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变,社会救助作为兜底性制度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在当前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原有制度逐渐脱离时代和现实

需要,社会救助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3]。

首先,从衡量贫困标准来看,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不同,以往多从单一收入维度衡量受助对象困难程度的做法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困难群众的困难情形已经从单一向多维转变。孤寡老人、重病患者、困难残疾人、困境儿童、失业者等特殊群体出现的困难情形不同,则救助需求也不同,如果仍然仅从单一收入维度去衡量且提供无差别的社会救助,难以体现不同个体之间救助需求的差异性。其次,困难群众

收稿日期:2023-1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SH003)。

作者简介:罗树杰,男,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李霖,女,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王杨,女,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

的救助帮扶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需求从“保生存”转向“促发展”。从救助方式看,以满足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的救助手段,难以促进救助对象的自我发展,而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等多样化的服务救助可以帮助受助者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贫困治理需不断提高社会救助层次,不仅要解决救助对象生存方面的需求,更要从贫困问题的根源出发,增强其自我发展潜力,逐渐形成自我内生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9]。最后,在现有的低保制度下,个别地方低保对象表现出对低保政策的依赖性,刻意选择并保持“贫困生活方式”。低保政策的“捆绑式福利”,产生了“福利叠加”“福利悬崖”现象,影响了城乡低保政策基层执行效果,产生了政策执行偏差,不利于社会救助的良性发展^[9]。

不断提高城乡社会救助治理水平,完善共同富裕的兜底性制度安排,实现精准救助、精准识别和供给是社会救助转变的关键。应转变我国传统的“供给型救助模式”,积极构建“需求型救助模式”^[9],精准回应困难群众需求,纠正和减少救助服务中出现的“供需错配”“供需脱节”等问题,实现“供需匹配”优化目标^[9]。如何对城市困难群众需求进行科学评估与调研,如何针对困难群体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社会救助服务,最终形成因人而异的个性化、多样化的社会救助服务供给,是新形势下社会救助工作需要考虑并改进的问题。本文试图遵循需求溢出理论的需求分析方法,结合对L区低保对象的实际需求调研与柳州市社会救助实践,以低保对象社会救助服务需求为原点,探讨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的优化路径,以期提升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水平提供建议。

二、理论基础

需求溢出理论以个人需求为起点,当个体和家庭内部资源较低且无法满足个体所产生的需求时,这部分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即为个体需求的溢出,从而成为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应该解决的问题。需求

溢出理论依据需求正义、需求迫切程度将需求分为人道需求、适度需求、奢侈需求三个层次。明晰解决需求溢出的优先次序,按人道需求、适度需求、奢侈需求排序,公共管理只需要解决个体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的溢出。个体及家庭才是解决需求的首要对象,只有需求外溢才需寻求政府和社会的帮助^[7]。需求溢出理论倡导差异化供给原则,即强调以需求定供给、按需供给,公共政策以及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也应根据个体和家庭内部能力的差异和需求而区别对待。反对对富人或穷人进行无差别的民生政策供给、无差别的成本分担,让有限的社会资源提供给更需要帮助的群体和个人^[8]。

公共物品理论倡导无差别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和成本共担,认为传统的社会救助进行无条件的福利供给,带来了政策依赖性,出现“福利叠加”“福利悬崖”现象。一部分人过度依赖政府的帮助,刻意保持“贫困生活方式”,导致社会救助成本高、效率低,不仅给政府财政带来负担,也不利于社会救助服务的发展完善。在需求溢出理论视角下,构建的是“无差别”与“有差别”相结合的社会救助方式,社会救助需求溢出多的群众多受益,社会救助需求溢出少的群众少受益,个体及家庭内部资源禀赋足且需求未溢出的不受益。

三、城市低保对象社会救助的需求分析

2021年,柳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6.4990万户,14.9171万人,占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约37.59%。L区位于柳州市区的北部,全区总面积30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约46万人,户籍人口约35.47万人,下辖3个镇、9个街道、35个行政村、63个社区。L区作为柳州市工业大区,聚集了一批大中型国有企业。伴随城区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化步伐加快,产业升级与产业转型进程中L区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失业,其中一大批年龄大、技术落后的下岗人员生活出现了困境,这也间接导致L区在享低保人数规模较大,近几年L区城市低保人数近7000人。选取柳州市L区低保对象作为社会救助需求调查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021年1月至3月,柳州市龙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入户探访、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对L区低保对象的需求情况进行收集,共向L区低保在享户发出调查问卷250份,线下回收调查问卷223份,其中12份为无效问卷,共获得211份为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89.2%,问卷有效率94.62%。

(一)L区低保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上看,本次调研样本中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有2人,占总人数的0.95%;18—50周岁的97人,占总人数的45.97%;51—70周岁的有102人,占总人数的48.34%;70周岁以上的有10人,占总人数的4.74%。调查对象年龄分布呈弧线形,整体年龄结构偏大,集中在51—60周岁阶段,年龄大、文化低、有劳动能力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有71人,占总人数的33.65%,18周岁至60周岁区间为上升趋势。性别方面,男性129人,占总人数的61.14%;女性82人,占总人数的38.86%。50%左右的调查对象主要因家庭贫困被纳入低保,73.93%调查对象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补贴,仅21.33%调查对象有工资性收入,可以看出大多数低保对象及其家庭受年龄、身体状况、疾病等影响,只能单纯依靠低保金、基础养老金、优抚金、残疾人补贴补助等政府补贴维持基本生活。家庭结构方面,81.04%的调查对象与1—6名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其中有1名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占总人数的26.07%;有2名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占总人数的27.01%;有3名及以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占总人数的27.96%;约有18.96%的低保对象独自生活。这说明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家庭内部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一旦家庭成员出现变化,如有家庭成员读大学而教育成本增加、意外事故或重病医疗支出剧增等情形,家庭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增高。子女抚育与老人赡养方面,35.55%的低保对象目前需要抚养子女,其中需要抚养1个子女的,占总人数的26.54%;需要抚养2个子女的,占总人数的7.11%;需要抚养3个子女的,占总人数的1.43%;需要抚养4个子女的,占总人数的0.47%。

49.76%的调查对象需要赡养老人,其中需要赡养1个老人的,占总人数的28.44%;需要赡养2个老人,占总人数的18.95%;需要赡养3个老人,占总人数的0.95%;需要赡养4个老人,占总人数的1.42%。可以看出调查对象总体要抚养与赡养人数均衡,需要赡养老人及养育小孩的低保家庭均有可能面临着家庭劳动力少、支出负担重、经济压力大、家庭内部矛盾冲突多等诸多问题。

表1 城市低保对象样本的基本情况

类别	指标	样本数(人)	占总人数比(%)
性别	男	129	61.14%
	女	82	38.86%
年龄段	18周岁以下	2	0.95%
	18—50周岁	97	45.97%
	51—70周岁	102	48.34%
	70周岁以上	10	4.74%
纳入低保原因	家庭贫困	106	50.24%
	身患残疾	48	22.75%
	其他原因(慢性病、家庭成员患病或身患残疾、家庭教育支出大等)	57	27.01%
主要收入来源	工资	45	21.33%
	亲友接济	6	2.84%
	政府补贴	156	73.93%
	其他(退休金、副业)	4	1.90%
是否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	无家庭成员共同生活	40	18.96%
	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	171	81.04%
抚养子女	不需要抚养子女	136	64.45%
	需要抚养子女	75	35.55%
赡养老人	需要赡养老人	105	49.76%
	不需要赡养老人	106	50.24%

(注:数据来源于龙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格为作者自制)

(二)L区低保对象存在的社会救助需求

1. 最低生活保障需求。基本生活保障是城市低保群体维持生计的重要条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3.93%低保对象受年龄、身体状况、疾病等影响,主要依靠低保金、基础养老金、优抚金、残疾人补贴补助等政府补贴维持基本生活,收入来源单一。

91.46%的调研对象生活主要开支为生活日常费用支出。L区低保调查对象生活月开支额度在500元以下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2.84%;开支额度在500—1000元之间的有78人,占总人数的36.97%;开支额度在1000元以上的有125人,占总人数的59.24%;另有2人不太清楚自己的生活开支额度,占总人数的0.95%。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L区低保对象生活主要开支为生活日常费用且消费水平不高,大多数是必要的食品、药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支出。相较于普通个体与家庭,低保对象及其家庭往往面临的经济保障需求更为明确与迫切。究其原因,一是缺少固定的家庭收入来源;二是受身体状况、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削弱了低保对象获取收入的途径;三是低保对象及其家庭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遇到突发问题,支出增加,更难以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

2.教育救助服务需求。有子女需要抚育的调查对象,除了维持自身以及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还需要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他们的家庭必要开支比其他的低保对象有所增加。调查结果显示,生活主要开支为教育支出的低保对象有9人,占比4.27%。这一部分的比例虽然不大,但需要抚养子女的低保家庭均可能面临子女教育支出负担重的问题,存在子女教育救助方面的需求。

3.医疗救助服务需求。L区低保调查对象中,因身患残疾而申请低保的有48人,因其他原因(慢性病、家庭成员患病或身患残疾、家庭教育支出大等)申请低保的有57人。低保调查对象的日常主要开支中因残疾、重疾、慢性病等原因需要支出大额医疗费用的有9人,占比4.27%。整体来看,低保对象中存在医疗困境的人较少,但相较于因家庭贫困被纳入低保的个体,低保户中残疾、重疾、慢性病者以及需要长期照料者是更为弱势的群体,脆弱性更高^⑨。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解决其溢出于自身和家庭的需求。针对存在因病致贫、身患残疾等不同困境的低保对象,仍需要根据其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4.养老救助服务需求。L区低保调查对象中,有49.76%需要赡养老人,其中需赡养1个老人的,占

总人数的28.44%;需要赡养2个老人的,占总人数的18.95%;需要赡养3个老人的,占总人数的0.95%;需要赡养4个老人的,占总人数的1.42%。从子女赡养义务履行情况来看,低保调查对象子女应尽赡养义务的有74人,其中有22人的子女从未支付过赡养费,占总人数的10.43%;有13人的子女会偶尔支付赡养费,占总人数6.16%;有21人的子女支付赡养费的金额为100—200元之间,占总人数的9.95%;有15人的子女支付赡养费的金额为201—500元之间,占总人数7.11%;有2人的子女支付赡养费的金额为501—800元之间,占总人数比为0.95%。有1人的子女支付赡养费的金额为801—1000元之间,占总人数比为0.47%。调研中,具体了解到赡养费支付与否和子女的赡养意识、子女的经济收入水平、低保对象的家庭互动模式等相关。低保对象收入来源单一,家庭抗风险能力弱,需要赡养老人的低保家庭均有可能面临家庭劳动力少、支出负担重、经济压力大、家庭内部矛盾冲突多等诸多问题,存在着供养照顾老人、压力疏导等需求。

5.就业救助服务需求。调查数据显示,L区低保调查对象家庭中无劳动力的有114人,占总人数的54.3%;家庭中有1个劳动力的有81人,占总人数的38.39%;家庭中有2个劳动力的有13人,占总人数的6.16%;家庭中有3个劳动力的有1人,占总人数的0.47%;家庭中有4个劳动力的有2人,占总人数的0.95%。可以看出,将近一半的低保调查对象家庭有劳动能力,少部分家庭还不止一个劳动力。可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力作用为家庭增加收入。就业情况方面,L区低保对象目前无工作的有155人。其中,受到用人单位以年龄、无相应技能等原因拒绝用人,导致低保对象未就业或无法就业,约占总人数的73.46%,体现了大龄或中龄就业者、特殊就业者的窘境与无奈。目前有工作且已经稳定工作1年以上的有33人,占总数的15.64%;有工作但不稳定,工作才半年左右的有16人,占总数的7.58%;换了很多个工作,工作一般不稳定的有7人,占比3.32%。此

外,在对低保对象无工作原因的调查中,有135人选择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具备劳动力,有6人选择是因为文化低,有15人选择是因为无技能,有18人选择是因为无合适的工作,有4人从来没想过就业问题,另有33人选择是因为其他原因(如照顾小孩子或老人)而无法工作。从调研情况来看,影响低保对象就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身体原因不具备正常劳动能力,占总人数的63.98%;二是无适合工作、无相应技能、文化低,分别占总人数的8.53%、7.11%、2.84%。可见不同低保对象存在着不同的就业问题,存在着社会就业救助服务的需求。

6.心理情感需求。从共同生活家庭人口上看,约有18.96%的低保调查对象独自生活,他们极有可能面临社区和家庭支持体系缺失、居家安全风险、心理行为自我封闭等困境,需要加强来自其他系统的支持。在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低保调查对象中,家庭关系和睦相处的有139人,占总人数的65.88%;家庭关系一般的有66人,占总人数的31.28%;家庭关系紧张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2.84%。数据表明,L区的大部分低保对象家庭关系和睦,具备相对完善的家庭支持体系。针对独居、家庭关系不和谐的少部分低保对象,需要进一步评估其具体需求,确定是否需要为其提供家庭关系调适、支持体系构建等服务。

7.社会交往需求。L区低保对象与社区其他成员的交往频率为每天都有的有46人,占总数的21.8%;交往频率为每周两三次有的有37人,占总数的17.54%;交往频率为每月两三次的有28人,占总数的13.27%;还有100人与社区其他成员基本没有任何交往,占总数的47.39%。在关于低保对象半年内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的调查中,参与频率为0的有168人,占总数的79.62%;参与频率为1-2次的有37人,占总数的17.54%;参与频率为3-4次的有4人,占总数的1.90%;参与频率为5次及以上的有2人,占总数的0.95%。调研数据显示,79.62%的低保对象没有参与过社区的活动,表明大多数低保对象与社区的互动极少,47.39%的人与社区其他成员基本没有任何交往,近半数的

低保对象与邻里、社区居民的交流与沟通也极为有限。究其原因,一是部分低保对象受到身体状况的制约无法参与社区活动;二是良好社会互动的缺失也会致使低保对象难以融入社区,导致低保对象人际关系的紧张乃至不良情绪和行为的产生;三是近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社区开展活动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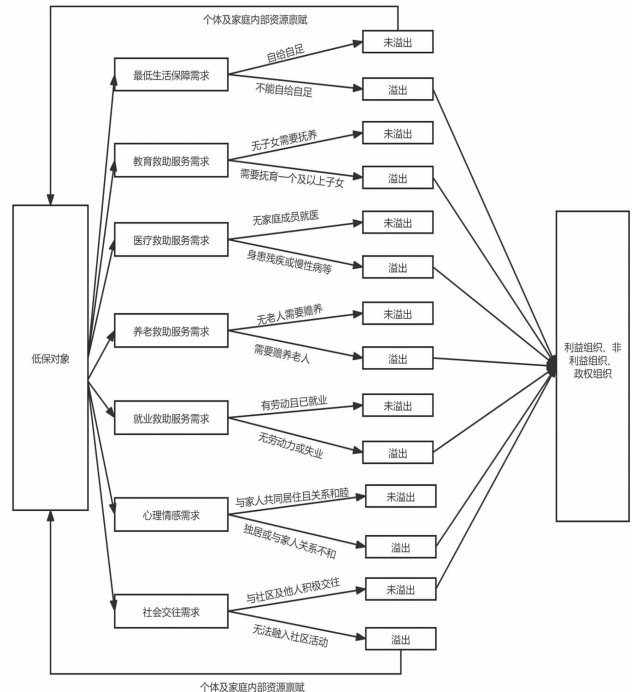


图1 低保对象社会救助服务需求分类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四、柳州市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的现状与空间

(一)基本生活保障方面

2016年以来,柳州市不断调整城乡低保保障标准,提高城乡低保救助水平。与“十三五”初期相比,柳州市区城市低保标准由2016年的480元/人·月提高至2022年的770元/人·月,增长60.42%,农村低保标准由3000元/人·年提高至6000元/人·年,增长100%,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与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基本适应。“十三五”期间,柳州市超过85万名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累计发放低保救助资金22.30亿元。提高机构抚养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由2021年的1200元/人·月提高至2022年的1422元/人·月,社会散居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和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从2021年的800元/人·月提高至1022元/人·月。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缓解物价上涨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影响,保障困难群众生活。为城市困难群众提供水电燃气、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减免。

(二)医疗以及养老救助方面

柳州市向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对象,包括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等困难群众提供住院医疗救助、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救助、重特大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救助等三大类医疗救助保障。同时,对在广西境内发生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提供疾病应急救助基金。2018年以来,柳州市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柳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接实施方案〉的通知》,由政府全额资助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和孤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确保困难群众全部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险。依托人社部门已有的基本医疗保险结算系统,搭建民政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系统,提高医疗救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改变了原有的医疗费用、医疗救助结算方式,实现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结算系统与民政医疗救助结算系统的无缝对接、同步结算、统一监管,使困难群众就医报销一次完成。

(三)教育救助方面

柳州市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费补助,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补助标准按寄宿生标准的50%核定,小学每生每年500元、初中每生每年625元。同时,免收困难家庭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费用,减轻其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在高中教育阶段,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免除学费(不含住宿费),

并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原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提供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对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学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在高等教育阶段,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入学资助项目,大学新生入学资助主要用于一次性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从家庭所在地到被录取院校之间上学所需路费及入学后短期的生活费用,2022年资助标准为区内院校录取的大学新生每生一次性补助500元,区外院校录取的大学新生每生一次性补助1000元。统筹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免学(杂)费补助资金、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资金、高校应届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金、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大学新生入学资助、中职升高职学费补助等共同保障困难家庭学生受教育权利。

(四)就业救助方面

柳州市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就业补助资金,就业补助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就业创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农民工就业创业奖补和用于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其他支出。为毕业学年身患残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或属于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脱贫户家庭、特困人员(孤儿)中的高校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按照上一年度全区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对招用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与之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6个月的企业或社会组织,按其为脱贫劳动力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2022年1月1日起按照2000元/人·年的标准给予带动就业补贴。另外还为困难家庭劳动者提供每人每年一次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

(五)住房救助方面

柳州市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住房困难职工、外来务工住房困难人员等四类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并给予相应的租赁补贴、租金核减,公共租赁住房保

障遵循明收明补、分档补贴、租补分离的原则。对特殊困难家庭及低保家庭等优先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并为承租的特困供养人员家庭、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家庭减免100%、50%、30%、50%的物业服务费,按1.0、0.9、0.7、0.9的租金核减系数计算租金核减金额,予以减免租金。

(六)社会救助信息共享与数据利用,大数据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方面

柳州市依靠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平台、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精准瞄准与管理,推进社会救助体系与救助能力的现代化。2022年柳州市以政务数据治理试点为抓手,依托大数据局建设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大数据采集各类困难群众信息数据,进行数据归集、抽取、分析,筛选出低收入人口中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患病住院等刚性支出较大等可能存在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众家庭,及时将风险数据分发到县级民政部门。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依托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牵头建设了社会救助、资源环境等16个主题库和40个跨部门融合应用场景,平台汇聚了5.67亿条数据,各部门调用数据超过4.2亿次。数据内容涵盖医疗、教育、人社、不动产、公积金等领域,汇集了工信、税务等全市571家管理部门数据,为教育资助、法律援助、住院医疗救助等121个应用场景提供数据支撑。有了大数据介入,通过与医保、民政、教育、应急等部门进行数据共享比对,能及时获取疑似需要政府救助的人员信息,有效提高社会保障的及时性、主动性,为实现“及时救助”“精准救助”提供了数据支持。

(七)社会救助服务方面

柳州市积极打造“物质+服务”“专业社工+志愿者”的社会救助服务新模式,通过创新社会救助服务内涵、理念与方式,形成了物质救助帮扶与社会心理支持相结合、基本社会救助服务与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相补充、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服务模式,形成了柳州经验。第一,从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工作出发,开展入户核查及需求评估,缓解基层社会救助力量不足。通过购买社会

服务,将原有直接承办的事务性工作交给社会力量承担,由服务机构完成对所服务城区低保在享户100%的入户探访工作,对低保在享户的基本信息及家庭情况进行核实,建立低保数据信息统一档案,为民政部门掌握和分析低保家庭的动态情况提供参考和依据。第二,从社会救助对象服务需求出发,设计、组织和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确保社会救助对象服务需求得到及时回应与有效满足。通过“专业社工+志愿者”模式,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服务的城区低保家庭进行100%的需求调研,为有需求的低保对象开展心理疏导服务,协助低保对象形成健康理性的身份认知,理性对待来自内心的烦恼与外界的压力,学会合理解压和宣泄,促进其养成良好的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帮助救助对象链接生活、助学、就业、慈善等方面的社会资源,在困难家庭和社会爱心资源间搭建互动平台,让更多社会大众与爱心企业通过互动平台了解和认识困难家庭的现状,激发慈善行为。2022年,柳州市共举办社会救助人员培训13场次、培训3000余人次,筹集资金2202.57万元,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24个。

五、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面临的挑战

(一)兜底保障政策综合供给不足,未能及时回应特殊困难群众的个别化需求

低保对象需求调研发现,部分对象享受低保后依然存在基本生活困难的困境,即使有了低保政策的支持,其基本生活保障依旧受到威胁。如个别低保对象属于独居老人,由于特殊原因达不到特困的条件,只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部分人自身患有多种慢性病,除了平时会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外,大多只是到小门诊等问诊拿药。部分患病低保对象到正规大医院进行大病治疗时,有些药品并不能在医院通过医保结算购买,只能在药店自费购买,但这类药品的价格往往不低,加大了低保对象的医疗成本,从而使低保对象的低保金受到隐形的挤压,基本生活受到威胁。

在低保对象群体中,一些低保对象为重病、残疾或精神障碍等人员,这给他们的家庭成员带来了较

大的照顾压力,也影响了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困难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较高,个体需求差异明显,在贫困程度、自主脱贫能力等方面存在广泛差异,因而在社会救助诉求上也各不相同^[10]。目前除了低保对象、特困对象以外,国家还增加了对于低保边缘家庭(即原来的低收入家庭)、支出型家庭的认定。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了相应的审核认定文件,但目前尚缺乏对于这两类困难对象的社会救助配套支持措施。例如对于医疗救助,针对支出型家庭是否需要配套有医疗救助政策,对于低保、特困对象的新生儿家庭是否有对应的医疗保障措施,针对低保边缘家庭的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有什么政策配套,都需要认真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

(二)困难群体自我认知不清晰,表现出对社会救助的依赖性

调研数据显示,L区低保调查对象中对低保政策非常了解的有4人,占总人数的1.90%;对低保政策了解一点的有94人,占总人数的44.55%;对低保政策不了解的有103人,占总人数的48.81%;对低保政策完全不了解的有10人,占总人数的4.74%。在对低保对象是否知道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查中,表示不知道的有176人,占总人数的83.41%。L区仅有1.90%的低保对象对低保政策非常了解,12.80%的低保对象知道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L区低保对象对低保政策了解度低,对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了解极低。低保对象对关乎切身利益的低保政策的不了解,不仅不利于社会救助工作的开展,也影响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效果。

虽然有相关的文件精神作为指导,但每个人对低保的认识都不一样,特别是低保对象对政策不了解的情况下,会产生自己对低保的自我认知。如什么人可以领低保,什么样的生活是低保对象应有的状态,低保对象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等。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低保对象认为自己是“老烟鬼”,抽烟喝酒是正常的;一些低保对象认为自己刚申请了廉租房,按照进新房的习俗请亲友吃喝是正常的;还有一些低保对象认为自己的孩子在外工作不容易,特

别是孩子挣了钱从来不给父母的家庭,低保对象也不问孩子要钱,因为他们认为孩子“没有钱”,自己领取低保补贴是正常的。

(三)困难群众信息数据共享仍存在壁垒

目前,困难群众的分布及社会救助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相关部门分别掌握了不同救助对象的数据信息,同一救助对象的不同救助需求信息数据在不同部门的业务数据库中,并未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困难群众数据共享仍然存在壁垒。这不仅可能造成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没有被纳入救助,也可能造成救助资源使用低效。2017年网信研究院对全国的调查结果显示,省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基本实现信息共享的仅13%^[11],以医疗、教育和大额取款为主的支出型贫困的信息互联仅在上海等极少数地区开展^[12]。社会救助数据实现完全的互通共享还存在较大困难,推动信息整合共享,打破数据壁垒的工作仍需进一步推进。

(四)社会救助多元主体参与力度不足

当前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多主体参与、多主体责任共担的社会救助模式。如英国,政府负责困难群众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以及残疾人等特殊人员的救助,非盈利组织、宗教组织、公益组织等为更广范围的弱势群体提供捐款、情感关怀等救助^[13]。根据L区的问卷调查结果,在关于生活中遇到困难后会优先向谁寻求帮助调查中,低保对象中有106人选择向亲戚寻求帮助,有65人选择向居委会寻求帮助,有3人选择向邻居寻求帮助,有10人选择向政府相关部门求助,有13人选择向朋友寻求帮助,还有14人选择其他(即自助、无求助等)。可以看出,L区一半以上的低保对象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会优先向亲戚求助。除此之外,社区居委会也是低保对象优先寻求帮助的重要平台。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亲戚及社区是低保对象寻求救助的首要对象,提供救助的可及时、效性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也是低保人员可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说明低保对象的社会救助主体较为单一,主要的依靠对象是

亲戚、社区、政府,低保对象遇到困难向公益组织、盈利组织、社会团体寻求帮助极少,间接表明实际的社会救助实践中公益组织、盈利组织、社会团体等主体未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服务,发挥的作用较小^[9]。

六、提升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水平的思考与建议

(一)加大政策宣传,正确引导困难群众认知以及对政府社会救助责任的期望

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贫困治理的重点转向相对贫困。我国社会救助的目标对象范围也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群体扩展到相对意义上的低收入群体,面对的群体对象更复杂,需求结构更多元,贫困发生表现形式更多样,涉及的群体分布更广^[10]。要继续推动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提高民众的思想认知仍是重要问题。当前,一部分困难群众对政府的依赖较大,认为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责任而忽视个体和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需求溢出理论,政府并非是承担需求的唯一主体,只有溢出于个人和家庭的需求才需寻求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帮助。要避免福利叠加,消除个别对象“等靠要”的思想,打破群众因自身文化程度低或政策宣传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对政策了解程度低、不清楚社会救助申请条件与申请流程等情况,引导居民不断加深对政府社会救助等政策的了解,通过加大社会层面宣传,组织社区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和政策咨询服务活动,在社区形成良好的政策学习氛围与了解政策的热情,在全社会营造政府救助+生产自救+互助救助相结合的良好风气。

(二)建立救助对象多维评估指标与需求科学评估机制,动态按需救助

为适应社会救助的服务对象范围广泛、救助对象的复杂性增加的现实需要,必须建立一套更加科学合理的社会救助帮扶对象识别标准,改变以往单一的从收入来识别救助对象的方式,采取多维贫困指标,综合贫困群体对健康、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在这一方面,可参考借鉴国际认可度较高的多维贫困指数(MPI)。多维贫困指数主

要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条件3个维度以及受教育程度、儿童入学率等10个指标,指标从不同维度反映不同个体及家庭的实际情况和社会救助服务需求程度,为按需救助、因户施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15]。各地区可借鉴多维贫困指数,探索建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社会救助多维识别指标。

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救助对象,要增强社会救助效力,除了构建多维识别指标,也要多方面衡量并考虑救助对象存在的困境与社会救助需求,不仅是经济需求,也包括就业、养育、养老、照料压力等方面的需求,做到按需救助。对困难人员和困难家庭救助需求进行综合评估,建立需求科学评估机制并适时开展需求评估调研,积极构建“需求型救助模式”。根据具体的困难类型、程度和特点,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如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专项救助(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或急难社会救助(如临时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突发公共事件困难群众急难救助等),再综合考虑身心健康、社会支持、精神慰藉等因素,开展心理关爱、社区融合等服务,满足困难家庭多样化的救助需求^[16]。应及时反馈信息,防止过度需求、超前需求等无价值的社会救助需求信息导致供给不足和错位,最终形成按需供给、多维供给的社会救助资源供给结构。

(三)打破数据壁垒,继续拓展数据共享渠道

大数据治理充分利用信息化对贫困治理进行技术赋能,能够实现困难群众数据的共享、实时、整合与应用。通过动态监测、及时预警、主动识别和筛选对象,可以有效避免监测预警迟滞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和“福利依赖”问题^[17]。社会救助服务要积极用好大数据技术手段,着眼大数据救助,加速实现社会救助体系数字创新,让救助更加便捷高效。要实现这一目标,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各部门要梳理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困难群众数据并上传到大数据平台。二是各部门上传到平台的数据,要确保传得及时、准确,数据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并对上传数据的准确性负责。三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数据需求,可

以直接通过大数据平台申请,大数据部门根据业务部门提出的数据需求,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使用场景、字段条目、比对逻辑,最终得到目标数据,力求实现数据共享与分类推送同步,定期反馈与动态更新同步。四是鼓励由地方党政机关而非单一政府部门牵头部署信息共享平台与大数据平台建设,以降低各部门在信息共享过程中的畏难与推诿情绪,实现各救助主体救助信息的互联互通,提升救助能力^[13]。

提升社会救助智能化水平,需打破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政府机构之间的数据信息交换共享,依托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把民政、乡村振兴、卫健、医保、教育、人社、住建、应急等相关部门掌握的困难群众信息互联互通,集成数据共享交换的各类数据,从而实现低收入人口数据交换、业务协同,形成强大合力。此外,还要实现政府与利益组织、非利益组织、第三方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联通共享,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息平台建设,便于救助服务资源的利用及反馈,减少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落实错位、服务叠加等情况。如针对在享救助对象死亡难以监控的问题,卫健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定期进行信息交换,从殡葬管理、公安、医院等部门收集死亡人员信息与在享救助对象进行数据比对,建立数据分析比对系统,将比对结果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实现所有数据互联互通,最大限度避免“死亡人员吃低保”的现象发生。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救助信息统一汇集、集成应用,减轻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业务管理的负担,方便基层快速研判困难群众是否符合纳入相应社会救助或相关政策帮扶范围,逐步在社会救助领域实现网络化、协同化、智能化,为进一步推动救助政策的科学制定、救助对象的全面覆盖和救助效能的精准、高效发挥作用。

(四)加强社会救助多元主体合作力度,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可及性

政府作为社会救助服务供给的主体发挥着无可代替的作用,但某种程度上也因长期承担兜底性社会保障责任,容易忽视从整体角度考虑运用多元社会力量解决救助难题。现实中面临的社会救助需求

往往多元且复杂,仅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多元主体的融入能够弥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保障服务中的不足^[14]。根据需求溢出理论,个人需求溢出问题可通过血亲组织、利益组织、非盈利组织、政权组织这四大组织解决,家庭和营利组织主要解决个体未溢出的需求,而非营利组织和政权组织主要解决个体溢出的需求^[15]。既要强化家庭的救助责任,也要加强社会救助多元主体的合作力度,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可及性。一是在社会救助服务主体上,要以政府主导为基础,积极引导鼓励血亲组织、利益组织、非盈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深入挖掘其他组织的潜能,加强多元主体联动,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同社会救助主体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共同解决个体社会救助需求溢出问题^[16]。同时鼓励条件允许的困难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我救助,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解决其生存困境。二是整合资源,实现社会救助服务制度和工作的衔接。社会救助工作不仅涉及民政、卫生健康、乡村振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住建、应急管理等部门共同参与,同时涉及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公益组织。除了要做到信息资源跨部门、跨主体互联互通,还需要不同部门间的资源整合和衔接、各类社会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做到社会救助服务供给与救助对象需求相对应,如尽快确定出台新增的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家庭两类困难对象的帮扶救助政策配套措施,以提高社会救助的效率与能力^[17]。三是继续提升多元主体社会救助服务供给能力,完善社会救助人才培养与培训机制,继续探索“物质+服务”“专业社工+志愿者”的社会救助模式,继续完善物质救助帮扶与社会心理支持相结合、基本社会救助服务与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相补充、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服务模式。

[参考文献]

-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70年发展(1949—2019):回顾与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5).
- [2]关信平.我国城市相对贫困呈现的新特点及治理

- 对策[J].人民论坛,2021(18).
- [3]相英丽.当前社会救助机制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国际公关,2022(11).
- [4]高红,徐成铭,迟文涛.积极探索“物质+服务”救助方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1-02(5).
- [5]田毅鹏,关文君.城市低保政策基层实施过程中多主体行动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3(4).
- [6]林闽钢.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发展现状和健全思路[J].行政管理改革,2023(1).
- [7]刘太刚.需求溢出理论:一种以孔孟治道为核心逻辑的公共管理基础理论[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2).
- [8]刘太刚.公共物品理论的反思——兼论需求溢出理论下的民生政策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1(9).
- [9]卜长莉.城市低保群体的生存困境及发展型社会救助的选择——以C市低保户集聚区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19(7).
- [10]史新杰,李实,陈天之,等.机会公平视角的共同富裕——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22(9).
- [11]Aisit 网信研究院.互联网+政务[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55.
- [12]万国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相对贫困的大数据治理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13]张世青.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救助主体的救助责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6.
- [14]赵晰.中国社会救助的政策范式变迁与高质量发展内涵[J].社会建设,2023(2).
- [15]王一.后2020“参与式”反贫困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战线,2019(5).
- [16]青连斌.建立反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J].科学社会主义,2020(2).
- [17]万国威.促进共同富裕的大数据治理:概念意涵、发展历程与完善策略[J].求索,2023(3).
- [18]吕子荣.社会救助的协同治理路径探析——以正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救助个案为例[J].就业与保障,2023(2).
- [19]刘太刚.人类组织化生存:动因、图景与未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J].求索,2017(1).
- [20]代玉巧.城市社会救助服务模式的先进经验——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22(34).

责任编辑:祝远娟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年总目录

·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逻辑关联

……………【廖小明,杨懿】2023.1.P5

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及实践要求

……………【王介明】2023.1.P13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

……………【梅春英,李晓军】2023.1.P18

共同富裕的文化之维

……………【杨琼,唐莉】2023.2.P5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路径探赜

……………【蔡锦宜,虞新胜】2023.2.P12

“三个务必”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王晓青】2023.3.P5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
路径

……………【尹文嘉,贾钰鑫】2023.3.P13

坚持人民至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遵循

……………【刘辉】2023.4.P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历史演进、现实挑战与
未来指向

……………【周文琦,刘涵】2023.4.P10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探赜

……………【张艳,程静强】2023.5.P5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价值旨归、实践效能与创
新路向

……………【谢鑫辉,李效东】2023.5.P14

“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三维探析:理论、历史和
价值

……………【陈德山,王彦龙】2023.6.P5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耿文建,袁伟华】2023.6.P13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 周年·

“五一口号”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关系研究

……………【刘菊香】2023.2.P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内容、意义与路径

……………【张恒】2023.1.P25

习近平关于资本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漆昌彬】2023.1.P31

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的理论支点与构成逻辑

……………【刘旭】2023.2.P24

新时代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历史依据、现实必然
与实践路径

……………【黄钧鸿】2023.3.P20

数字经济对我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刘章】2023.3.P27

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建构

……………【谭权洁】2023.4.P16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实践
演进及价值旨归

……………【粟显洪】2023.4.P21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三重向度

……………【廖小明】2023.5.P22

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与发展路向——基于马克思主义
民主观的视角

……………【黄磊,黄会奇】2023.5.P29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革命的路径生成及其启示意义
研究

……………【刘玉东】2023.6.P23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伦理意涵与伦理路径

……………【廖仁郎,欧阳辉纯】2023.6.P32

·统战理论与实践·

夯实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基础性工作的若干思考

……………【孙宝林】2023.1.P37

年轻一代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研究——以
福建省宁德市为例

……………【游秀琴,陈媛】2023.2.P29

党外干部提升政治能力的实践路径研究

……………【孙军,姜田龙】2023.2.P36

民营经济共同富裕双向赋能研究——基于共同富
裕示范区浙江的实践

……………【韩欢】2023.3.P35

- 边疆省份做好新时代港澳台统战工作的思考
【杨松禄】2023.3.P45
- 海外华侨华人参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
【刘雨辰】2023.3.P50
-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
【何元浪,刘欣宇】2023.4.P30
- 大统战工作格局视域中的人民政协:功能角色与路径探索
【康晓丽】2023.5.P36
-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路径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张佳慧】2023.5.P43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理哲理道理
【盛寿河,江晨颖】2023.6.P39
- 论人民政协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的制度逻辑——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瞿磊】2023.6.P49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 全过程人民民主内生性特征的三重逻辑
【何炜】2023.1.P42
-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价值功能与法治进路
【张祝圆】2023.2.P42
-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区治理:耦合、机理与路径
【范逢春,付源溟】2023.3.P55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指向
【李弘雯】2023.4.P35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历史探索及其实践要求
【辛岳】2023.5.P50
-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超越
【李承儒】2023.6.P56

·政党制度研究·

-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秦程程】2023.1.P50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属性论析
【杨绪强】2023.2.P48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践行“国之大事”的三重逻辑
【周兰兰,陈波】2023.2.P56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
【王远启】2023.3.P66
- 新时代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路径探析
【蒋晶】2023.4.P41
-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探究——以广西为例
【张淑璇】2023.5.P57
- 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及经验研究
【陈红】2023.6.P65

·民族研究·

- 中国共产党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经验”
【刘绍卫,徐家贵】2023.1.P58
- 社会共生论视角下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生命史——广西百色市平山屯的个案
【傅俊豪,黄家信】2023.1.P70
- 公共图书馆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以广西为例
【罗瑜】2023.1.P77
- 不同之和:壮瑶铜鼓文化研究
【李富强,林成】2023.2.P63
- 边疆民族地区传承中华民族历史记忆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及其对策研究
【吴阳,闫国疆】2023.2.P71
- 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民族理论视角研究之二
【刘秋妍,杨芳芳,何文钜,农晓芬】2023.3.P72
-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时代超越——兼论民族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关系
【韦兰明,陈洪流】2023.3.P79
-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体系的思考
【黄浩云】2023.3.P87
- 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下的家庭与民族:相互关联与历史过程
【李硕】2023.4.P46
- 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文化基因——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凌经球,凌菱】2023.4.P54
- 关于互嵌式社区建设的调查报告
【许奕锋,张丹】2023.4.P64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探究
【陈 力】2023.5.P62
 左江花山岩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一
【覃彩銮】2023.5.P7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
【阳菲菲】2023.5.P78
 铜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二
【覃彩銮】2023.6.P73
 回顾、评价与展望：广西民族互嵌研究
【马俊勇】2023.6.P80

·宗教研究·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思考
【王 珍,向建华,卢姿元】2023.1.P83
 三国时期佛教的流传与中国化
【赵洪波,姜 珊】2023.2.P79
 以高层次“双通”人才培养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陶 杰】2023.2.P84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体系思考
【董小琴】2023.4.P69
 高校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的价值探析
【林怀艺】2023.5.P83

·中华文化研究·

中华传统“心学”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表达
【王久燕,靳东超,吴文新】2023.1.P90
 释《舆地纪胜》之“歌合溪”
【雷冠中】2023.2.P89
 程朱孝道思想的理论内容与现代转化
【代 云】2023.3.P92
 中华文化符号的提炼、形塑及其海外传播刍议
【肖宇强】2023.4.P7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古代“先贤传”中的政德思想为考察对象
【李 贺】2023.4.P80
 试论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发展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实践——以思恩府为例
【赵乃蓉】2023.5.P91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马来西亚海丝文化记忆建构——“海丝文化”系列研

究成果之二
【覃玉荣,马晋芳】2023.1.P96
 广西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刘超伟,韦 妲】2023.2.P94
 新加坡会展业优势及其对中国澳门的启示
【谢成因,翟保林】2023.3.P99
 中国—东南亚铜鼓同源异流论
【李富强,林 成】2023.4.P87
 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发展及经验研究
【阳 阳,覃蕾璇】2023.5.P99
 中老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潘 岳,冯羽鑫,刘 蓬】2023.6.P87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角下中国—东盟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秦雅静】2023.6.P93

·观察与思考·

国家荣誉制度建构中国形象的出场逻辑
【曾 骊】2023.1.P101
 以礼变俗：传统礼学推进乡村德治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基于北山学派的礼学实践
【余 慧】2023.2.P100
 网络消费及其对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与应对
【张 荣】2023.3.P106
 清代以来南宁的街圩文化景观遗存与保护性开发
【胡小安,林弈孜】2023.4.P99
 需求溢出理论视角下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服务需求分析——以柳州市 L 区为例
【罗树杰,李 霖,王 杨】2023.6.P99

·法律与经济研究·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行政法规制
【禹竹蕊,吕 悦】2023.2.P104
 区块链证据真实性审查的法理困境与完善进路
【冯晓煊】2023.4.P105

·干部培训研究·

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运用行动学习的思考——以广西为例【任淮南】2023.1.P108
 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提升服务教学科研水平的途径——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为例
【农晓芬】2023.5.P107